

炎黄春秋



萧克：陈独秀诗集序 难得清醒

——一位老编辑对若干
政治运动的反思

辽沈战役中，我
所目睹的林彪
轰动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席位写真

6
94

总第27期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1911年4月27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广州市发动推翻清政府统治的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经潘达微冒险奔走收殮，72名烈士丛葬于黄花岗。图为少先队员在广州七十二烈士墓前悼念先烈。

难得清醒

一个老编辑对若干政治运动的反思

李庄,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是一位颇有知名度的资深新闻工作者。走过漫长的近半个多世纪的革命路程,回顾历次政治运动,他颇多感触。本文以朴实、流畅的语言,叙述了他的心曲。……

辽沈战役中,我所目睹的林彪

辽沈战役,是从根本上动摇蒋家王朝根基的一次战役。作者当时受领导派遣,担任林彪的秘书。整个战役中,他一直在林彪身边,他是这次战役前线总指挥部决策、行动措施的目击者、见证人。

轰动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1971年深秋,一个震撼世界的消息传来,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的合法席位的提案。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决定,派遣以乔冠华为首的、阵容强大的代表团飞抵纽约,开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战线的新历程,……本文作者是当时代表团的一个成员,后来又担任我国常驻联合国的副代表,他是这历史性时刻动人心弦的一幕幕的当事者、知情人……

西安事变前夕李

克农与张学良的秘密谈判

李克农,颇多传记色彩的将军,西安事变前夕,他肩负秘密使命,与张学良将军进行了一次重要谈判……许多内情秘闻尚属首次披露。

一位台湾老兵回乡探亲记

故事套着故事,情在大陆;悲歌连着悲歌,错当属谁?

清代四大奇案之一

——查赈大员李毓昌遇难记

1816年,李毓昌在淮安遇难。李毓昌一案在当时震惊朝野,嘉庆皇帝直接出面干预,案情之奇特,牵扯有关官员之多,破案时间之长久,都是罕见的。被称之为清代四大奇案之一。

编读往来

《炎黄春秋》编辑部:

自从《炎黄春秋》(今《炎黄春秋》)出版以后,我就作为一个读者喜爱这本读物。每期刊物送到,她像磁石一样深深地吸引着我,有许多文章不仅立意高,站在历史的高度观察问题,还做到史料翔实,使人闻所未闻,补上历史一课。文章生动活泼,可读性强。坚持高雅严肃的办刊风格,做到真实性与权威性并举,可读性与资料性兼能。真是不可多得的一本好杂志。

我经常向友人宣传《炎黄春秋》。有一次,我的一位晚辈因车祸住院,在探望时,她提出要借刊物看,我首先把几本《炎黄春秋》推荐出去,想不到1953年出生的她比我少15岁亦很喜爱看,并且爱不释手。为满足她的需要,我几乎把创刊号开始保存下来的所有刊物都陆续带进医院病房,让她了解刊物的历史和全部文章。后来为她治疗的医生看到《炎黄春秋》,又出人意料的喜爱,到她病房轮换转借。这样,我的《炎黄春秋》阅读频率大大提高。可想而知,刊物做到老少皆宜,实属不易。

新年来临,收到94年第1期刊物,鲜艳的封面,突出的主题,全新的面孔,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阅读《编者寄语》,为编辑部经营三年赢得众多读者喜爱,刊物订数相当令人振奋而高兴;应当说,社会文化市场上一些书摊出售的庸俗低级、不健康的刊物,与《炎黄春秋》相比,确是相形见绌。

看了新年《编者寄语》,我向编辑部提个建议,希望戒骄戒躁,尽管刊物赢得众多读者喜爱,但还存在不容忽视问题。主要有:

一是有的期刊照片不令人满意。如1993.11期(总20期)上的几幅照片、11页李德生同志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出版物题词、15页上毛泽东等欢迎周总理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从莫斯科归来、40页靳风霞与小诗人金今、81页张辉瑞像等照片,有的模糊不清,有的一片白色,有的人像脸半面成了白色。究其原因,可能与历史照片有关,有的则是印刷技术质量不高所致。

二是印刷上浓淡不一。如(94)1期第8页、9页、12页就比较淡,与其他页码相比大为逊色,阅读效果差。

三是错字多处出现。(94)1期50页中栏倒数第3行,“监察院长于右任”误为“于右仁”;51页右栏第3行“免死孤悲”误为“免死孤悲”;63页右栏“毛泽章”误为“毛泽潭”,64页左栏倒数17行“聪秀妹”误为“聪秀际”等等。

虽然存在这些问题是白璧之瑕,但作为一本上乘刊物,不仅内容与形式让人喜爱,它的印刷质量和文字水平也应该是第一流的。

我们期待着刊物更上一层楼。

中共台州地委党史研究室

郑 晋 顺

1994年2月6日

顾问:

伍修权 费孝通 谢冰心
杨静仁 冯文彬 王朝闻
赵朴初 胡絮青

特邀编委:

王俊义 冯 征 冯其庸
张 锬 李 庄 张国琦
李学勤 李 普 刘颖南
苏双碧 常 征 温济泽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韩劲草 魏久明 魏 巍

社长(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宋文茂(常务)
丁洪章

总编辑: 洪 炉

总经理: 徐 孔

副总编: 刘家驹 杜卫东

理 事 长: 杜导正

名誉理事(单位):

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

副理事长: 贝兆汉 李广尧

理 事: 白亚南 蔡道峰
林春露

秘 书 长: 徐 孔

版式设计: 石福生

责任校对: 尉颖颖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770

社 址: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北京图书馆分馆内

邮 码: 100802

印 刷: 丰润印刷厂印刷

总发行处: 北京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 82-507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出版日期: 每月20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079号

编辑部电话: 6016633-227

定 价: 3.20元

特 稿

④ ⑥ ⑦

轰动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萧克评说陈独秀诗
陈独秀诗集序

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席位写实

萧 克

靳树鹏 李岳山

吴妙发

英杰谱

⑬ ⑯

西安事变前夕,李克农与张学良的秘密谈判
陈老总和小藏胞的故事

王震学

刘润生

求实篇

⑰ ⑲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难得清醒
李立三是南昌起义的倡导者和重要领导者之一
辽沈战役中,我所目睹的林彪

谭云鹤

李思慎

李 庄

目 录

春秋笔	人海浪	赤子心	古镜台	同根结	文萃阁
④④ ④⑧ 计除活阎王——康泽 ——石友三之死	⑤① ⑤② ⑤⑥ 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的辛酸童年 ——一张经历非凡的朱德照片	⑤⑨ 香港实业界的奇女子梁国馨	⑥② ⑦① 清末爱国爱民三壮士 ——清末四大奇案之一—— 查赈大员李毓昌被害记	⑦③ 一位台湾老兵回乡探亲记	⑧① ⑧⑤ 艾黎和洪湖 陈独秀诗六首 郁达夫与曾朴谈赛金花 鄂、湘、黔即景
立之 杨玉文	毕定良 刘益涛 乔天富	齐夫	肖冰 辛建	张家林	俞小红 布赫

《炎黄春秋》1994年 第7期

要 目



- △胡耀邦与真理标准讨论
- △电视片《毛泽东》诞生记
- △宋庆龄、宋子文姐弟的分分合合
- △陈伯达利用《人民日报》煽风点火
见闻录
- △邹韬奋秘访新四军
- △忆周扬同志二三事
- △引起轩然大波的“迎春晚会”真相
- △中国是她感情寄托的所在
——记著名英籍作家韩素音
- △从奴隶到宰相

陈独秀诗集序

○萧 克

任建树、李岳山、靳树鹏诸同志编注陈独秀诗集，他们要我为此书作序并题写书名。我对诗懂得太少，但接到诗集是陈独秀的，立即引起我的兴趣。

陈独秀是本世纪初的风云人物。我在青少年时期，从《独秀文存》、《新青年》合订本和《向导》报读过他不少文章，似未见诗作，现在看到他的诗集，喜出望外。感到在我们这个诗歌的国度陈诗诚有编注出版之必要。

对于陈独秀是应该认真研究的。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后，与党分裂，我在政治上不信任他了，对他的印象，渐渐淡薄了，但还是很佩服他反封建、反迷信和提倡科学民主的文章及革命时期的功劳。对他的为人和在大革命失败后到去世时期的情况，总在注意。我在1981年8月18日，在中共成立6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曾有一个发言，现将与陈独秀有关的一段抄录于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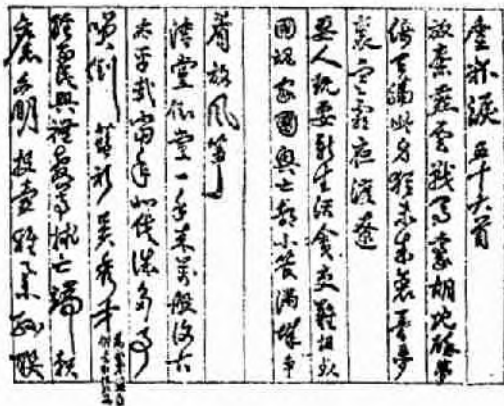
“陈独秀问题，过去是禁区，现在是半禁区，说是半禁区，是不少人在若干方面接触了，但不全面，也还不深入，大概还有顾虑。这个问题要不要全面研究呢？我看要。毛泽东同志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和李大钊等把当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青年‘集合起来，……创造了党，有功劳’。‘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周恩来同志也说：‘陈独秀创党有功’。我想，对于这样光辉时代的总司令和创造了党有功的人物，即使他后期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及开除出党后搞了托陈取消派，也应该全面的研究。毛泽东同志还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我认为很对。不认真研究陈独秀，将来写党史会有片面性。不久前看纪录片《先驱者之歌》，就看不

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和创党的最主要人物。在创党的镜头中，一出现就是李大钊。然而，‘南陈北李’，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定论。李大钊作为创党主要人物之一是对的，但陈独秀应属首位。这不能怪编导的同志，而是整个党史研究的问题。对陈独秀的研究，我认为不能仅限于他在党内及其以前时期，而且应包括搞托陈取消派时期。中国的托陈取消派和外国的托派有什么区别？他们的纲领如何？对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态度如何？对共产党的态度如何？对帝国主义尤其日本帝国主义的态度如何？在国民党监牢里的表现如何？出狱到去世时的政治态度如何？都应在研究之列。对陈独秀的评价，应遵从毛泽东同志的教导，也应该学习列宁对普列汉诺夫作评价时采用的观点、立场。列宁在1903年到十月革命时期，多次批评普列汉诺夫思想上政治上的错误，尤其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批评他是‘庸人’、‘社会沙文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叛徒’。但在他去世后，列宁在出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莫斯科市苏维埃、工会举行的联席会议上，和全体与会代表都起立为普氏默哀。后来列宁格勒为他开了追悼会，莫斯科党和政府派了卢那查尔斯基和季诺维也夫去参加。不久，列宁又指示要出他的全集，建普列汉诺夫学馆，号召大家学习普氏哲学，说‘不研究普列汉诺夫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觉悟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列宁对普氏各个时期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态度是作具体分析的。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列出俄国历史上二十个杰出人物，普列汉诺夫排在前面。他们并不因为批评他就使他丧失历史地位，也不为了表彰他而隐其恶，我不是说对陈独秀也要我们

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安庆)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右图为陈独秀的“金粉泪”诗手迹(写于南京狱中)。

下图为陈独秀。



照搬俄国党对普列汉诺夫的具体做法,只是提出用列宁的观点、立场来对待这个问题而已。”(见中共中央党史论丛、党史会议报告集39—69页)

我认为对陈独秀的研究,不仅限于他在政治方面,当然还应其他方面。任、李、靳诸同志编注陈独秀诗集,就为我们研究陈独秀提供了一个资料。陈诗作于半世纪之前,读者须知其诗作的时代、处境及其思想的发展过程。“诗言志”,陈独秀的诗也是如此,尤其在他晚年的诗如《金粉泪》长诗的倾向性更为明显。研究他的诗也利于对他的其他方面的研究和理解。

是为序。

1993年6月2日

萧克将军已是86岁高龄，仍步履稳健，精神矍铄。他在盛夏避暑中审阅了我们编注的《陈独秀诗集》书稿，写了序言并题写了书名，又约我们面谈。

相见伊始，他说：“你们做了一件大好事。多年来没有多少人对陈独秀的诗歌进行研究，你们下了很大功夫，辑录了他的诗，做了注释，还写了简析，精神感人。”接下来的两个多小时里，萧老对注释和简析逐页逐条地与我们商讨、有批评、有指正、也有补充修改，还有对陈独秀其人其诗的评说，时而插入有关的轶事逸闻，谈笑风生。

陈独秀1927年末写了一首政治讽刺诗《国民党四圣经》，已过了60多载岁月，萧老至今还大致记得：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
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以党治国，放屁胡说；
党化教育，专制余毒。
三民主义，胡说道地；
五权宪法，夹七夹八。
建国大纲，官样文章；
清党反共，革命送终。
军政时期，军阀得意；
训政时期，官僚运气；
宪政时期，遥遥无期。
忠实党员，只要洋钱；
恭读遗嘱，阿弥陀佛。

萧老谈到这首诗时，说：“大约在1928年4月，朱毛红军会师井冈山以后不久，我曾在墙壁上看到这首《国民党四圣经》，印象十分深刻。当时，我以为是哪位有才华的部队宣传员创作的呢，还情不自禁地续了几句。直到读到你们编的这部书稿，才知道是陈独秀的诗。萧老竟能清晰地将他当年的续句念了出来：‘蒋氏诸侯，英帝走狗，桂系豪杰，工农之敌。粤系军阀，非牛非马。主席汪氏，是烂婊子。政客谭公，老朽昏庸。呜呼国’

○新树鹏
李岳山

萧克评说陈独秀诗

党，伏惟尚享。”陈独秀的这首诗，在当时是有力抨击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的檄文，是一篇很好的宣传材料。当然这首诗也有粗糙的一面，如诗中说“三民主义、胡说道地”，就不该这样提，因为三民主义是比较完整的民主革命纲领。”

萧老对陈独秀1934年作于南京国民党监狱中的《金粉泪》56首七绝，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俨然如一位严格的编辑，对其中十余首诗的注释，字斟句酌地加以改写修订。如关于孙科、汪精卫、吴稚晖的注释，关于淞沪抗战及蒋光鼎、蔡廷锴的注释，

关于历史上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的表述等等。他的改写和修订非常切合实际，严谨科学。他说：“陈布雷的家庭很怪，他是蒋介石的一支笔，他女儿却是共产党。”他建议我们在行文时不要无根据地说陈布雷（或其他人）的坏话。他指出：“注诗要注意口气，重要的是把具体事情说出来，让读者自己去理解。”萧老为我们改写的注释，堪称这方面的典范。如《金粉泪》第47首：

皇皇大典枉论才，
官运高低靠后台。
封锁未成民已苦，
七分政治费疑猜。

这首诗头两句是说国民党政府煞有介事地举行高等文官考试，但其遴选标准并不依才干高低，而是看后台大小。我们对后两句的注释有“使人民陷入血火灾难……其实也是盗名欺世之谈”一些笼而统之的话。萧老将这两句话的注释改写为：“国民党在多次进攻红军失败之后，采取新的政策，即‘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对红军和苏区进行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本来是他们的老政策，没有成功，难道‘七分政治’就行吗？费疑猜呀！”萧老当时就在反围剿前线，有许多亲身感受，他改写的文字没有空泛之词，又多么有韵味啊。

当谈到陈独秀作于1939年的长诗《告少年》时，他指出，陈独秀在诗中对斯大林搞的肃反扩大化的批判是正确的。这时，他又想起了一段往事：“大概是在1939年1月，在晋察冀阜平聂荣臻同志的司令部里，我对聂荣臻同志说：‘康生在延安发表过一篇文章，说陈独秀是日寇奸托洛斯基匪徒，每个月从日本人那里领取300块大洋。’聂荣臻同志没有立即回答，大约过了一分钟才说：‘陈独秀是300块大洋能买得了的吗？’”

萧老指出了研究出版陈独秀诗是必要的。萧老评说陈独秀诗，完全本着他所主张的“只有忠于史实，才能忠于真理”的精神，令我们感动，也令我们肃然起敬。（责编：刘家驹）



轰动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席位写真

吴妙发

1971年10月25日的夜晚显得格外美好。当时北京虽已步入冬天,但并不寒风凛冽,仍有几分秋高气爽之感。天空群星闪烁,照得人脸上露出喜悦的神色,仿佛向我暗示一则令人激动的喜讯已经传遍中华大地,而我还蒙在鼓里哩!“中国要加入联合国了!”我融在骑车者的洪流里听到了这一令人振奋的消息,才明白人们欢悦和我心中涌动着难以言状的冲动感的缘由了。回到家后,我收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的重播的消息,才知道:在当天举行的联合国第二十六届大会上,通过了以坦桑尼亚等广大亚非拉国家的提案,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的合法席位……听着听着,热泪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中国更加扬眉吐气的日子终于来到了!中国要昂首挺胸地进入世界大家庭作出自己一份应有的贡献了!这种感觉在我心中翻滚着。

准备飞抵纽约

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的合法席位的消息激动了外交部每一个同志,人们脸上露出喜气洋洋的神色。在饭厅、走廊、办公室和其他场合,这成了人

们的热门话题。要不要派代表团?什么时候派出代表团?大家不由自主地谈论着,有关部门更是热烈地反复权衡、议论着。最后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决策和参与下,终于作出了英明的决定:要去,而且要快。毛主席从全局出发,从中国作为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一员的高屋建瓴的角度考虑,深思熟虑地指出:应当去,不去会脱离第三世界。于是,外交部就异乎寻常地忙碌了起来,决定代表团人选,撰写发言稿……。

同外交部每个同志一样,这件事情使我激动了好几天,可从来没有想过我同这件事情会有什么联系。一天,我在部图资室寻找一本外文图书,突然,我工作部门的负责人来电话找我去谈话。这位负责人说,要我赶快移交工作,准备参加代表团去联合国工作。我顿时呆住了,既感到组织的信任,非常激动;又怕一段时间以来外语和业务已有所荒废,担当不起这一工作。后来,符浩同志又亲自找我谈话,要我树立信心,做好新的工作。我工作单位的同志也给了我许多鼓励。

我开始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有件事使我十分感动的是,在红都服装店制装时,一些技艺精湛的老师傅为我们量体做衣,不厌其烦地为我反复试衣、修改。要知道,做衣服只有十来天,时间是多么紧张啊。老师傅反复跟我讲:你们去的是联合国,做的中山装一定要地道,这是代表我们中国,一点也马虎不得。

隔了一两天,代表团召开全体会议。符浩同志宣布了代表团的组成名单。代表团一共三十来人,来自外交部、外贸部、新华社等单位。代表团的领导阵容尤为坚强,有毛主席、周总理亲自点将的乔冠华(团长)、黄华(驻加拿大大使、调任副团长);还有长期担任外交使节,有丰富经验和阅历的外交家熊向晖、符浩、陈楚和唐明照同志;当时任部司领导的王海容、唐闻生、张永宽、邢松鹤、章含之同志也是代表团成员。在这次会议上,章文晋同志谈了代表团的方针,大意是,代表团面临的任务艰巨,要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符浩同志说,我们去的的地方是跟我们二十多年没有来往的美国,我们一言一行都代表着中国,所以既要谨慎,又要大胆地工作。国际司负责人凌青在会上介绍了联合国的情况。会上还决定,派高粱、林家森和徐烁喜三人作为先遣小组先赴纽约,为代表团全体人员到达作准备。代表团的下面同志也开始初步结识,大家为在今后能在一起相处、工作感到非常开心。

历史性的接见

代表团出发前夕,周总理亲自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那天晚上,大家脸上都洋溢着兴奋的神情。领导同志坐在前排,一般外交官和工作人员坐在稍后。接见的会议室灯光明亮,气氛既庄重又欢快,服务人员动作轻盈地来回走动着为大家斟水倒茶。不一会,周总理来了。我们每个人不由自主地交换了一下眼色,使大家本来欢悦的脸上又增添了幸福的色彩。周总理迈着稳健的步子,身着人们熟悉的银灰色中山装,他神采奕奕,心情特别愉快。他按照名单的次序,用亲切的口吻叫着每一个人的名字,特别对代表团的下面同志询问得更加具体,如来自什么部门担任什么职务,准备在代表团做什么工作等。在周总理了解到代表团有几个同志将担任撰写发言稿任务的时候,他说,在联合国要就各种问题表明中国的立场,起草发言稿的任务比较重,目前这方面的力量还不太够,是否增加一个人?他用商量的口气问符浩同志。符浩同志当即表示赞同,因此以后代表团的成员又多了一位。周总理在问到代表团领导同志邢松鹤时说,你这个字是怎么写的呀,邢作了回答。周总理说,喔,明白了,是有益的益,旁边加个鸟字,是益鸟啊,这个字很少见啊。周总理的风趣对答,使会场的气氛更加活跃。周总理询问完了每个人的情况后,讲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大意是,现在国内形势很好,林彪已经自我爆炸,他背叛党和人民,已经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罕。你

们可以大胆放心地工作,国内做你们的后盾嘛!”周总理又说,由于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大力坚持,特别是坦桑尼亚许多非洲国家多年来的不懈努力,这次终于挫败了美国仍想阻拦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阴谋,使决议得以通过。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是一个历史的胜利。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去是对他们表示感谢,也是对他们的支持。这是主席的指示。你们去了之后,要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支持他们的正义要求。在谈到服饰问题的时候,根据当时的情况,周总理加重语气说,在出席正式会议的时候,中国代表要穿中山装,不要穿西服。你们可是代表中国啊。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我们大家都这样做了。为了方便,大家还做了一套西装,那是为了上街时穿的。周总理的这番讲话,好象发生在昨天一样,至今还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好几个钟头,由于夜深,总理还请大家吃了夜宵。夜宵是绿豆稀饭和包子,大家吃得有滋有味。

不久,我们又接到一个更令人鼓舞的通知。毛主席可能要接见,要大家呆在家里待命。当晚我和衣而卧,全家都希望这一时刻早点到来。后来,毛主席接见了代表团的领导和主要翻译,他们及时向我们做了传达。

毛主席离开我们已经多年,然而他当年的谈话精神仍然指导着我们的多边外交。1971年,我国恢复在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的合法席位时,与我国建交的国家大约70多个,如今除了极少数国家外,我国几乎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1971年11月15日,乔冠华团长正式就坐于联合国大会的中国席位,8天后,即11月23日又在安理会上听到中国代表的声音,如今联合国几乎所有机构中都能见到中国代表的身影。23年的变化是多么巨大啊!

场面空前热烈

经过十来天的紧张准备,工作基本就绪,要出发了。1971年11月9日,外交部豫王坟宿舍显然格外热闹。一辆大轿车停在部幼儿园的门前,部分代表团工作人员身着整齐的中山装,带着家属先后登车去机场。我清楚地记得,幼儿园的教师再三叮嘱有关的孩子要听话,因为这将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欢送场面;有些教师说,这是一辈子难得的机会,可能要见到周总理……。一到机场,果然是一个令人终生难忘的盛况。周总理率领全体政治局委员来了。欢送的群众敲锣打鼓,场面热烈感人。代表团人员绕场一周,周总理同代表团成员以及家属一一握手,用亲切期待的眼光目视着我们逐一地登上飞机。不久,飞机向蓝天冲去,从机舱窗口望去,只见周总理等领导同志还在那儿不停地挥手。事后听说,这种盛大的欢送场面是毛主席亲自决定的。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一场面还历历在目。

我们乘的是中国民航,绕道巴黎去纽约。途经緬



1971年11月乔冠华团长在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甸、巴基斯坦、希腊、埃及等地，尔后飞渡大西洋到达目的地。在离开国境抵达仰光前，乔冠华团长召集全体人员在乌鲁木齐机场贵宾室开了一个短会。他动情地说，再过一会儿，我们就要离开祖国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肩负的使命，用一句话说，任重道远。还要说了一句，大家要严守纪律，注意保密。这番话无疑使我们再次感到自己的责任所在。

途经仰光和卡拉奇时，我们稍作休息。抵达仰光时，因已是傍晚，缅甸方除派出官员欢迎乔团长等人外，还为我们准备了一顿可口的夜宵。在一张铺着白桌布的长条桌上，服务人员为我们每人端来了馄饨面（同广东的云吞相似），大家饱餐一顿，继续赶路。巴基斯坦方面的欢迎也是异常友好的。

记者从天而降

在飞往巴黎的途中，我们的飞机上不知何时上来一批外国记者。他们不断地打开闪光灯，拍下了乔冠华团长等镜头，并连珠炮似地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记得有如何估价这次联大决议呀，中国代表团将如何在联大开展工作呀，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与中美关系的前景呀，等等。乔团长一一作了回答，也许是回答既雄辩又幽默，既服人又富有哲理性，记者当中不断传出笑声和赞扬声。

这批记者满以为出其不意的采访会使同行们大吃一惊，其实巴黎的记者决不会就此罢休。代表团到达巴黎奥里国际机场时，天气很冷，冻得人们有点难受。我们即刻登上我驻法使馆的大轿车，司机就以较快的速度驶向我驻法使馆。“好家伙，他们跟上来啦！”汽车内几个同志喊了起来，我回头一看，只见好几位戴着头盔的记者骑着摩托车顶着寒风飞速地追赶着我们。我们拐弯，他们也拐弯；我们穿过高速公路涵洞，他们也丝毫不含糊地紧追不舍，大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样子。第二天，法国不少报纸刊登了中国代表团抵达巴黎的报道，消息正方还附有一张中国大使的照片。

我们仔细一看，不是大使，而是代表团的厨师吉师傅。吉师傅身着笔挺的中山装，身材胖圆，气度不凡，确实有一副大使的派头。大家看后哈哈大笑，一面不断和小吉开玩笑，说他已荣任大使，一面也觉得记者们确实“慧眼独具”，拍下了这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

鲜花、旗帜迎亲人

在巴黎稍事休息后，我们就乘机向纽约飞去。浩瀚的大西洋波光鳞鳞，渔船变得像玩具似的在缓慢航行。再有近七个小时的飞行，我们就将在一块完全陌生的土地上工作了。飞机降落前，一幢幢火柴盒般的摩天大楼、手擎火炬的自由女神像、著名的哈得逊河在我们眼前一闪而过。我在上海复旦学了英语，学过美国历史和美国文学，记得高尔基曾讲过“纽约是一座钢铁森林”的名言，也记得美国大作家德莱塞名作《美国的悲剧》中所刻画的男女主角的形象。现在来到纽约的上空，想尽快了解纽约究竟是一座怎样的都市，它的总体外表，它的内涵。

飞机在肯尼迪国际机场停稳后，从机舱窗口望去，几百米外，许多侨胞等候在警戒线外的场地上挥舞着横幅和旗帜，黄华副团长和高梁等3位同志也赶来欢迎我们。侨胞们打的横幅上写着“欢迎中国代表团”、“欢迎中国亲人”的大字，两位侨胞女青年向代表团正副团长献上了鲜花，不少侨胞眼含热泪，向我们频频点头招手，场面令人终生难忘。我从侨胞脸上的表情上可以看到一股扬眉吐气的豪情，一股中华民族真正站立起来的浩然正气。他们当中也许不乏当年被生活所迫来到美国的后代，也不乏被侮称为“猪仔”的子孙，今天祖国亲人来到他们中间怎能不使他们欢喜呢？这种场面在11月15日乔团长在联大讲坛上发表讲话时再次出现，甚至更加令人激动。那天，会场出现了联合国大会多年来少有的盛况，不仅代表席、来宾席、甚至走廊上都挤得水泄不通。楼上旁听席上坐满了侨胞听众。他们扶老携幼，情绪激动，争着要看一看新中国的代表，听一听他们的声音。乔团长讲话之后，整个大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几十个国家的代表排起长队向中国代表表示祝贺。此后侨胞们的贺信像雪片似飞向代表团的临时驻地——罗斯福旅馆。事隔3年，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同志以副总理的身份，出席了第六届讨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特别联合国大会。小平同志讲话后，会场内又顿时排起长龙，许多国家的大使纷纷向小平同志表示热烈祝贺，我有幸在场，目睹了这一盛况空前的场面。

旅馆前升起了红旗

中美两国人民二十多年来没有正式交往，中国代表

团来到纽约，牵动着美国人的心。当我们踏进临时驻地罗斯福旅馆的大门时，有的记者早在那里等候多时，有的记者驾飞车赶到。闪光灯使我们睁不开眼睛，照相机的按钮声在我们耳边响个不停。当晚美国三大广播公司均以头条新闻在黄金时间向亿万美国观众播出中国代表团到达的消息。次日，《纽约时报》以显著位置对代表团的所有外交官作了简短介绍。不久，《生活》杂志还登载大幅照片，介绍代表团一位成员在旅馆楼顶上跑步锻炼的情况。一年后，《纽约时报》发表一篇专稿，大意说中国代表团熟悉联合国业务很快，对繁杂的程序已得心应手；说某某先生已是中东问题的专家；某某先生外交业务娴熟，交游广阔，赢得外交官们的赞赏；某某老先生外语流畅，堪称一流的经济专家，等等。

对美国人来说，中国代表团的到来，犹如外星人的突然出现；五星红旗在罗斯福旅馆升起，更是十分新鲜的事情。代表团中年轻人周末外出散步，或在中央公园观光，不少美国人一眼就认出了我们。有的主动上前提出一些善意的问题；有的和我们搭话道别时，总要说上“请多多保重”的告别话。我们所在旅馆的打扫女工称赞我们没有架子，宽容大度。洋厨师们想方设法做些中国菜使我们满意。有一次，他们听说中国人爱吃蛋炒饭，就特地用热牛油为我们炒了一大锅。当然这种蛋炒饭的味道可想而知，但盛情是感人的。一位美国大学生，曾当过游泳池救生员，主动找上门来要求当团领导的保镖。为乔团长开车的是一位年近七旬的老司机，他多次表示，他驾车多年，为许多要人开过车，从未见过中国代表团的负责人如此平等待人。他一定要在有生之年来中国旅游一次。听说这位老司机后来果然来华游览参观。

代表团到达纽约后不久，团领导要我暂管群众来信，这是一项很有趣味的工作。每天我至少要收到五六十封的来信。小学生来信中提出“祝你们好运”、“祝你们愉快”的话温暖着我的心；普通美国人表示“欢迎你们来美国”、“祝你们成功”的愿望使我兴奋不已；不少美国人来信中提出许许多多的问题为我们搞好中美人民友好工作提供了不少宝贵的启示。

当然，由于20多年的隔绝，那时美国人民对新中国还缺乏了解，因此我在代表团将近6年的工作期间，也收到过策反信件，发生过反华游行示威，但这只是历史长河中一段小小插曲而已。

在罗斯福旅馆的这段生活期间，也是颇值得回忆的。找到这所旅馆，罗马尼亚朋友帮了不少忙。我们在那儿作准备工作，夜晚轮流值班，会见美国朋友。洋饭吃腻了，有时干脆多吃冰淇淋充饥，冰淇淋多吃了，又不舒服，大家就动手包顿饺子。整整住了几个月才搬进新址。

联合国有了中国礼品

联合国总部位于纽约东河河畔，主楼是一座火柴

盒式的摩天大楼，周围有图书馆等辅助建筑物，还有面积不小的花园，可供代表们憩息。许许多多国家的常驻代表（即大使）在这里进进出出，忙于各种外交事务，参加各种会议和宴请，进行名目繁多的磋商和谈判。它一年到头基本上忙于开会；每年从9月到12月的联合国大会，那是最紧张的阶段，第二年1月开始的各种委员会会议；7、8月份的大型经社理事会会议，等等。安理会更是可以随时召开，出了大问题，只要代表提出要求，就得开会。记得有一次讨论西撒哈拉问题，从深夜二三点一直到次日早晨，接连几天连轴转。吃不上饭就在联合国自动食品柜塞上钱币，买点小吃和饮料应付过去。我在联合国代表团工作的几年里，参加过几届大会、二三届特别联大、安理会、经社理事会和非殖民化特委会等，内容牵涉方面很多，很丰富，对语言和能力锻炼那真是受益匪浅。特别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在陈楚大使领导下，得益于代表团其他主要成员和翻译的帮助，参加了与墨西哥的建交谈判。墨西哥常驻代表是一位令人可敬的长者，他学识渊博，谈吐文雅，阅历广阔，经验丰富。当时中墨两国建交谈判的核心问题是一个中国还是所谓两个中国。陈楚大使使用娴熟的外交技巧，雄辩的说理，终于经过几次细致入微的谈判，双方达成了共识，顺利地签署了两国建交公报。

联合国还是一个颇具特色的游览点。在联合国的代表厅、走廊和其他场所，都置放着会员国赠送的礼品，在礼品下方还有一块小铜牌，上面标明赠送礼品的国家和日期。这些礼品有日本式的亭子，前苏联“仙剑为犁”的雕塑，非洲独具特色的木雕，拉美色彩艳丽的挂毯等，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难怪乎每天都有许多参观游览者，在会操几种外语的导游小姐的带领下，津津有味地欣赏着这些各具特色的珍品。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恢复在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的合法席位后，自然也应该向联合国赠送一两件代表中国古老文明、独具特色的礼品。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经过反复斟酌，最后决定赠送两件，一件是巨型长城挂毯；另一件用整块象牙雕刻而成的成昆铁路缩影。在赠送礼品的那天，乔团长和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都亲自出席。那天上午在二楼宽敞的代表主厅中央临时摆起了一个铺上洁白桌布的讲台，台下簇拥着一批来自各国的高级外交官，中国代表团的许多同志也到会，我也有幸地参加了。赠送仪式开始后，乔团长简短致辞，瓦尔德海姆秘书长在答辞中，称赞中国的古老文明以及两件礼品的珍贵价值。他们两位讲话后，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新华社记者摄影记者钱嗣杰同志摄下了这一组珍贵的历史镜头。

这两件礼品，长城巨型挂毯已挂在二楼代表休息厅墙壁的正中央，几乎覆盖了这一巨大墙面的一半。画面上长城逶迤起伏，色彩典雅，具有雄伟的气势。后来听说这是一家地毯厂工艺师和工人们连续加班加点很长时间才完成的杰作。另一件成昆铁路象牙微雕也可称得上是惊世之作，它置放在三楼，这座微雕，无论人物和景色都雕得十分细腻逼真，颇有鬼斧神工之妙。

"无定向导弹"巴鲁迪

联合国常驻代表中,有不少饱学之士,有经验丰富的杰出外交家,也有一些失意的政治家。他们中有的发言来,一会儿引述圣经,一会儿又端出莎士比亚的诗句,藉以引起与会者的注意和加强发言的份量。这些代表当中,沙特阿拉伯王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巴鲁迪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资格很老,从40年代到80年代初,一直担任该国的常驻副代表,因为没有正代表,实际上行使着正代表的职权。除担任副代表的职务外,他还负责照管沙特王室在纽约的财产。巴鲁迪颇有学识,发言时常常引经据典,使听者感到颇有興味。有时他声色俱厉地批评前苏联的霸权主义,弄得苏联代表无言可对。有一次美国代表批评他发言不当,用词近乎“下流”。他听后大为恼火,说淫秽下流的不是别人,正是你们美国。他说,难道纽约的42街不淫秽下流吗?这番惊人的答辩,引起全场哄动。因为与会代表都知道纽约42街是美国有名的红灯区。有时,他正正经经地按次序发言,更多的情况下是即席发言。有时他不经主席允许,任意闯进某个委员会的会场,站在主席台下,听完别人发言后立即接着发表长篇大论,或重复过去的话语,或把与会代表当作晚辈不指名地训斥一顿,时间可长达一小时之久,与会者怕与之纠缠,也都耐着性子听他讲完。由于这种情况,有些代表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无定向导弹”,意指视他情绪高低,他愿意攻谁就攻谁。其实,这位代表还是有定向的。1971年,联合国大会讨论恢复中国合法席位问题,当时以美国为一方和以坦桑尼亚为另一方掌握的票数十分接近,因而斗争异常激烈。以美国为一方企图用微弱多数把这一问题拖过去。这时巴鲁迪事先未同美国代表团商量,突然提出一项动议,要求进行表决,这使美方措手不及,提议一经提出,支持恢复中国代表团席位的坦桑等发展中国家立即抓住时机,进行表决。该提案原意是阻挠恢复中国席位,但由于巴鲁迪考虑不周,在技术上、策略上有疏漏,致使表决结果动摇了美方的阵脚,使形势越加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连续几次表决,终于突破了美方等多年设置的障碍,使力主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发展中国家这一方面取得了最后胜利。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及一切机构中的合法席位后,巴鲁迪先生对中国代表团的的态度还不错,遇见我们时不断点头打招呼,称赞中国有灿烂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还认为中国代表团的发言有份量。80年代初,这位老资格的外交官因患癌症在任上去世。

“你们发言为何雄辩有力?”

中国代表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往往引起广大会员国的密切关注。他们总想听听一年来中国对国际形势有何分析,会提出什么建议。一次,与我尚未建交的阿曼代表团一秘请我吃饭。他除了钦慕中国的文明外,尤其欣赏中国代表的大会发言。他说,中国代表引用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谚语来批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真是绝妙透顶,语言既形象,又具有丰富的内涵。另一次,我在联合国餐厅用餐,一位年轻的小姐很有礼貌地问我能否同我探讨一个问题。她说,她是大学大众媒介(相当于我国大学的新闻系)专业的学生,每次联大开会,她都尽可能来旁听各国代表的发言,每次都被中国代表的发言所折服。她说,你们发言语言简洁,事实明确,雄辩力强。“你们能写出这样好的发言稿有何秘诀?”我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大的发言一直到目前仍然有很大的吸引力,他的发言基本上都安排在大会开始的第一个星期和第二个星期。中国代表在七十年代首次引用谚语“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批评两个超级大国,使会场引起强烈的共鸣。又有一次在安理会上,前苏联代表马立克无端攻击我国对外政策,中国代表当即反驳说,你手里没有真理,因此只能借助于无端漫骂。如果你有真理,那就请你统统摆出来。真理越辩越明嘛。漫骂决不是战斗(大意)。短短的答辩发言驳得马立克脸红脖子粗,张口结舌,不知所云。

这些例子确实值得我好好回味与学习。陈楚大使几次提醒我要下力气学点古文,掌握好用语言来进行战斗这一武器。乔团长当年也屡屡提出,联合国每年讨论的问题也就是一百多项,同上一年比较,有时基本类同,有时候会加几项。在发言内容上决不能炒冷饭,要有新意,要讲几句新话,那怕有几句使人听了动情的新话也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吃透一年来的形势,抓住要害和特点;其次要挖空心思想出几句新话来加以概括。还有句子要短,不要洋腔洋调拖泥带水,讲起来要朗朗上口。乔团长本人的发言确实体现这些精神,不但语言犀利、简短、明确,而且很有文采。确是一位大秀才啊!

陪同交涉港澳问题

中国代表团恢复在联合国及一切机构中的合法席位后不久,我被指定参加联合国常设机构非殖民化特委会的工作,充当我国张代表的助手。非殖民化特委会主要是听取尚未独立的殖民地人民代表的申诉,呼吁殖民当局加速这些殖民地的独立进程。参加该委员会的成员国一共有24家,如古巴、坦桑、圭亚那、前苏联、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伊拉克、塞拉利昂、突尼斯和中国等等,所以又叫24国特委会。特委会几乎一年到头开会。当过该委员会的主席有坦桑、圭亚那以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代表。坦桑大使萨里姆担任过好几届主席。他当过驻华大使,对我热情友好,与他谈及有关问题时,他总是用美好的语言提及他出任驻华大使的难忘岁月。他多次见过毛主席和周总理。当这两位伟人去世时,他特地召开特委会全体会议进行哀悼,私

下和我们谈起这两位伟人时，双眼挂着泪花，声音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萨里姆先生现在仍活跃在外交舞台上，他目前是非洲统一组织的秘书长。

非殖民化特委会当时主管的殖民地有西南非洲、南罗得西亚、西撒哈拉等等。在这个委员会作过申诉发言的有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人努乔马（现为纳米比亚总统）、南罗得西亚非洲民族联盟领导人穆加贝（现为津巴布韦总统），我有幸结识他们，并成为他们的朋友。这两位领导人的口才都很好，给人们以很深的印象。黄华大使先后宴请过他们，并派我去接他们来中国代表团驻地赴宴。到我们的驻地时，努乔马主席常戏谑地对我说，“我又到家了”；穆加贝在汽车上和我交谈时说，“黄大使是我的好朋友，他宴请我一定要去。”可见两位领导人对中国的感情之深。

现在特委会主管的殖民地绝大多数已成为独立国家，可当时不同，翻开非殖民化特委会的名单就有一大片，其中包括我国的香港和澳门。列入名单的地方意味着今后要独立，这对港澳根本不适用。港澳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怎能列入这一名单呢？为此黄华大使专门致函特委会萨里姆，要求把香港和澳门从非殖民化特委会所列的殖民地名单中删掉。张代表亲自做工作，向萨里姆大使说明造成港澳问题的历史原因，获得了萨里姆大使的充分理解和有力支持。他转而亲自向24国特委会的其他成员国做工作，排除一两个成员国设置的障碍，最后终于把香港和澳门从非殖民化特委会的名单中删除了。这是我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取得的一个胜利。

集会于非洲前哨阵地

不久，特委会在萨里姆主席倡导下，决定到非洲数国开会。到非洲前哨阵地讨论非洲某些地区非殖民化问题显得更有意义。为此联合国秘书处为这次会议配备了同声传译和记录等人员。几十位代表（其中包括中国张代表和我）以及秘书处人员乘机奔赴会议的第一站——几内亚。

几内亚当时的总结塞古·杜尔亲自组织成千群众列队欢迎。到达的第一天，在摩托车队的开导下，几十辆汽车秩序井然地开进首都科纳克里。车队行进中，许多几内亚妇女跳起节奏明快的舞蹈表示欢迎，欢迎队伍中还有不少可爱的儿童，他们也随着马路两旁扩音器里传出的非洲民族音乐的节奏，有力地摆动着臀部，看起来十分可爱。除开会讨论外，杜尔总统亲自接见，并在一个宽敞的空地上设盛宴招待。当时流亡几内亚的南非著名歌手莫开巴母女两人在宴会过程中轮流引吭高歌整整两小时。莫开巴的歌声优美，素有“南非金嗓子”的美称，在欧美等国也享有盛名。我们参观了与几内亚东南部接壤的几内亚比绍的解放战士的军事营地，还到几内亚全国各地参观了解情况。我们住在当地的非洲人茅屋里，吃着非洲的饭食，觉得格外新



出席联合国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团

鲜和亲切。

到达埃塞俄比亚的头天晚上，我辗转床侧，觉得胸上好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憋不过气来，无论如何也不能入睡。第二天才明白是海拔高度较高的缘故。埃全国平均高度为海拔2500至3000米，素有“非洲屋脊”之称。尽管它地处非洲，由于海拔高，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平均温度为13℃，天气还是凉爽的。俞沛文大使告诉我们，由于海拔高，埃方经常组织外交人员到地势低

的阿斯马拉去住几天，以调节身体。我们受到了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陛下的接见。接见在皇宫内举行。皇宫门前站立着两位身材魁伟的埃塞俄比亚勇士，他们手中各牵一头凶猛的金钱豹，显得无比威武。宫内两旁站立着驻埃使节，当礼宾官介绍张代表等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皇帝陛下紧握他的手久久不放。海尔·塞拉西一世是埃国的民族英雄。在意大利侵略埃国时，他英勇不屈，团结并亲自领导埃人民把侵埃（当时称阿比西比亚）意军赶出了国土。他身材不高，干瘦却精力过人，脸上蓄着一撮威严的小胡子，颇有一副君临天下的气概。1974年9月，他被埃军事政变领导人所废黜，之后离开人世，但遗骨不知去向。不久前据说，他的遗骸在皇宫地下室被发现，埃现政府已为他重新进行了安葬。

我们还在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开了几天会，当然也受到了隆重的接待。

会议结束了。全体人员离开非洲返回纽约。飞机起飞时正值清晨，只见太阳冉冉升起，霞光万道，各种兽类和禽鸟飞奔，枝杈无比硕大的树木散落在非洲广袤的土地上，圆顶茅草屋一排排展开，构成了一幅非洲特有魅力的风情画。

（责编雪舟子）

陈老总和小藏胞的故事

王震学

陈毅同志访问日喀则小学 1956年5月拍



每每望着30多年前我抓拍下陈毅元帅和小藏胞在一起的珍贵照片，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了陈老总对藏族儿童无比关怀的感人情景。

那是1956年4月，我作为一名驻陕公安某部的警卫战士兼随军宣传员，有幸和战友们担负护送以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元帅为首的中央代表团进藏参加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的警卫任务，亲见他和夫人张茜喜爱小藏胞的许多动人故事。

“帅府”帐前敢撒尿

“今后，再要碰上这种事，一是对藏胞要友好热情，态度要和蔼可亲，二是讲话声音要轻些……”这是中央代表团踏上青藏公路以后，在一个宿营地陈老总对哨兵们说

的。

雪白的“帐篷城市”在荒凉无垠的草原上拔地而起，随团的民族歌舞团演奏员们弹起了心爱的冬不拉。于是，藏、蒙、哈萨克等族牧民纷纷扶老携幼，骑马、骑牛、骑毛驴或骑骆驼，象赶“巴扎”（集市）似地涌来。

有位中年藏族妇女，抱着一个两岁多的小男孩喜不自禁地边走边看。可小家伙不安分，离开了阿妈的怀抱，满地乱闯。不料，竟闯到刚刚搭起的“帅府”帐篷前，还站在那里撒起尿来。

“哎，小孩，不要在这里撒尿，快走开！”

那知小家伙听不懂汉语，照尿不误。

带哨的四班长一看喊叫无用，便上前示意让他走开。那调皮的小家伙，只是嘴里哇里哇喇地讲着藏语，边笑边象捉迷藏似地跑着。

他跑着笑着，三转两拐地竟向陈老总的“帅府”闯去。

“小孩！小孩！不能进去……”哨兵急了，连喊带挡。

帐篷的门开了，走出了陈老总和夫人张茜。那小家伙竟撞到陈老总身上，人群向这边围拢了过来。

“出了啥子事情啦？”陈老总忙问。

哨兵向老总报告了刚才的情况，陈老总听后，哈哈大笑，说：“哎呀，我还以为出了啥子大事情啦，把小藏胞吓坏了怎么办？胡来！”说着，忙安慰小藏胞说：“莫怕！莫怕！”

这时张茜同志已把小家伙抱在怀里，仔细地打量着他，红扑扑的小脸，花丽可身的小皮藏袍、小藏靴，毛茸茸的皮帽。她情不自禁地对陈老总说：“瞧！小家伙多可爱！”陈老总边用手抚摸着小家伙的脸蛋，边说：“太可爱了！”转身对工作人员讲：“请给小藏胞拿点水果糖来。”

张茜接过工作人员送来的一把五颜六色的水果糖，想往小藏胞衣服兜里装，可怎么也找不见衣服口袋在哪里。

“藏胞的衣服上没有口袋。”陈老总看后笑着说，指了指系在孩子腰间的彩色腰带：“这是万宝囊，有啥东西都可以往里装。”张茜忙把糖往里装，小家伙也不认生，抓起一颗糖剥开纸就往嘴里填，高兴得连喊带笑。

这时，四处寻找宝贝儿子的阿妈赶来了，望着陌生的陈老总和张茜如此疼爱自己的小宝贝，弯腰打躬连声说：“‘土吉其’（谢谢）‘本布拉’（干部），祝你们‘扎西德勒’（吉祥如意）！”陈老总也向她道了声：“‘土吉其’‘乔德姆’（你好）；祝贺你生了这么个可爱的小‘诺儿’（宝贝）。”

当阿妈抱过小家伙离去时，小家伙还不停地拍打着他小“秋巴（藏袍）里的水果糖呢！”

望着藏胞母子远去的身影，陈老总对哨兵语重心长地说：“……他一个小小娃儿懂个啥子？别说在我帐篷外撒尿，即便是到了‘明镜高悬’的老爷大堂上，也敢就地撒尿呢！”

一条洁白的哈达

一天下午，代表团来到接近藏北草原的一个雪山兵站宿营地。下车后，我和三班长等担负了外围哨的巡逻任务。

巡逻归来，遇见连长江智合。他关心地问道：“有没有发现异常情况？”三班长反映说：“在前边不远的雪山下，从一个藏胞的帐篷里，传出一阵阵孩子的啼哭声，我们走近一看，帐篷前燃烧着树枝，还有一堆小石头，帐篷上插满了五颜六色的经幡纸条，我们不知这是藏胞的什么讲究，也不敢贸然进去，只在帐篷外喊了几声‘请问家里有人吗？’但没有回答。”

三班长嗓门大，是我们警卫连有名的“赛喇叭”。加上我们帐篷的隔壁是陈老总的“帅府”，惊动了正在帐篷内收拾行李的张茜同志。她关心地问：“你说的那啼哭不

止的藏胞小孩，该不是生病了吧？帐篷前堆起的小石头，藏胞叫‘玛尼石’，是他们的风俗，表示家里有病人；燃烧的可能是松枝，那插满帐篷的经幡，是为了避邪求吉祥。你喊了几句，帐内无人答应，我估计不是小孩病重出不来，就是听不懂咱汉话。这样吧，赶快派医生去看看，治病要紧。”

“我这就派卫生员去看看。”江连长说。

张茜同志不放心地说：“如果你们警卫连的不方便，可以让团里医疗大队的医生也去，越快越好。”

江连长刚转身要走，正逢陈老总看望高原官兵归来。他关心地问：“出了啥子问题啦？”

当陈老总了解事情原委后，关切地说：“时间如果来不及，可叫救护车去。时间就是生命哟！”

临行前，张茜又教了我们几句藏语对话。

“阔里！”（喂），“依阿朱阿有哟？”（家里有人吗？）我们很快随救护车来到那个帐篷前，用张茜教给的藏语问道。不一会功夫，帐篷里走出一位面容憔悴、惊恐万状的中年女藏胞，强打精神向我们施了一个藏族极为崇高的低头吐舌大礼，又用汉藏语掺半地问道：“金珠玛咪（解放军）有什么事情吗？”三班长说明来意，女藏胞转忧为喜地说：“我们家里的小‘西毛’（女孩）病得好厉害，求佛爷保佑多日，还是无效”。

“我们带来了‘门巴’（医生）给小‘西毛’看看可以吗？”

她感激地说：“达，达（可以，可以），太‘土吉其’了！”

幸亏抢救及时，加上医术高明，不多时，小藏胞的啼哭声嘎然而止，渐渐地睁开了双眼，苍白的小脸蛋也出现了苹果似的红晕。

临别的那天清晨，小藏胞的父母早早地赶到代表团驻地，要把带来的青稞酒、酥油茶、粘粑和一条洁白的哈达献给大“本布拉”（大干部）陈老总和张茜同志。

张茜同志笑着说：“我可不敢无功受禄啊！要献还是献给医护人员和警卫连战士吧。”医护人员和战士也不敢收，一条洁白的哈达推来让去，最后，还是陈老总出面调解，他笑呵呵地说：“张茜和我只不过起了点‘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作用，是‘无功不能受禄’的”。最后，那条洁白的哈达还是献给了夺回小藏胞生命的医护人员，其它礼品退回藏胞。

陈老总的拜托

代表团到达藏北黑河重镇的驻地。下午，我和战友刘存念买了一本《古代故事选》返回驻地时，正遇陈老总和张茜送客出门。

“你买了本啥子好书？”爱书入迷的陈老总高兴地问我们。

“故事书。”我忙双手递过去。

张茜先接过书看了看，说：“《古代故事选》，不错，我读过。”将书递给陈老总。

陈老总接过后,先看了看古朴的封面,又翻看了目录,关心地笑着说:“好,要知天下事,必读古人书。这里书店开门吗?”

“开门,书店不大。”

“图书种类多吗?买书的人多不多?”

“种类不多,可买书的人还不少,多数是藏族青年和少年男女,因藏文书少,只见他们兴致勃勃地翻阅汉文书,但只是看看封面和插图便放下了。口里还不住地讲着什么,谁也没有买。”

陈老总说:“买不到他们喜爱的藏文书,他们感到遗憾,心情可以理解。”

张茜随声说:“这主要是翻译工作跟不上的原因。”

“关心藏胞青少年的文化生活,也要象关心藏胞的酥油、粘粑一样,逐步地满足他们精神食粮的需要。”陈老总说到这里,又深有感慨地说:“听说过吗?勤劳、勇敢、热情好客的藏胞,只要不是哑巴,都会唱歌。同样,只要不是文盲也爱看书。”

张茜同志说:“要满足他们精神上的酥油、粘粑,首先要抓翻译队伍,遗憾的是现在翻译藏文的人太少了。”

“是啊,要抓队伍建设,否则,我们的藏族读者会失望的。特别是青少年,他们的求知欲很强,不仅需要了解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艺术,而且还需要迫切了解伟大祖国灿烂的历史、文化和艺术。”陈老总说到这里,把书还给了我。又关心地说:“你们爱看书很好,古往今来,许多有成就的人无不是经历了‘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的奋斗过程。同样,我也希望我们的藏胞下一代,要爱国爱党爱民族,先从了解国家、了解民族做起。从读好书做起。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腹有诗书气自华’,你们说对吗?”

“对!对!”我们为陈老总如此关怀藏族青少年的学习而感动。

陈老总又用商量的口气说:“这样吧,如果到了拉萨,你们再逛书店时,请注意观察一下,那里的藏胞青少年读者的阅读情况,听一听他们的反映,如果不懂藏语,可问一下书店的汉族干部,例如:青少年读者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对图书出版发行还有些啥子迫切要求,顺便作个小调查,有机会告诉我,行吗?”

“行!”

“那好,我就拜托你二位啦!谢谢。”陈老总说完笑着转身回去了。

吉祥的名字

在拉萨,陈毅元帅日以继夜地完成了筹备委员会成立任务后,于5月10日和代表团一道冒着“西藏五月尚飞雪”的寒冷,来到西藏第二大历史文化名城——日喀则进行慰问。

这是风和日丽、春风送暖的一天。

陈老总兴致勃勃地来到新建的日喀则人民医院。

陈老总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向欢迎人群频频招手致意,兴奋地说:“好啊,藏胞终于有了有史以来的人民医院。”

当他满怀喜悦地参观了一栋栋新房和刚从北京运来的各种崭新的医疗设备后,连声夸:“好!好得很!”

他健步来到住院部的妇产科,挨门挨户地看望了正在住院的产妇。

这时,一位藏族青年女护士告诉陈老总:“有一位藏族青年牧民产妇等你好多天了。”

陈老总忙问:“有啥子事情要我办吗?”

“她生下孩子已十多天了,就等你来给孩子起个吉祥的名字。”

“好!要得!”说着,便来到这位产妇的床前,用藏语说:“‘乔德姆’(你好);我代表中央代表团来看望你,祝贺你喜得‘诺尔’(宝贝)。”说着,便亲切地俯身看婴儿。只见婴儿那乌黑的扎扎(头发)、红朴朴的脸蛋、深邃而又明亮的大眼,十分惹人喜爱。连声夸道:“好漂亮啊!”

产妇连声“土吉其”大元帅的夸奖,又问陈老总:“梭不汤不都克(你的身体还好吗)?”

陈老总笑呵呵地说:“咕得!咕得!(好!好!好!)”

产妇见他平易近人,态度亲切和蔼,没有一点大“本布拉”的架子,她激动地说:“我叫桑巴,我生下的小西毛一直没起名字,听说北京的金山上要派陈大元帅来西藏慰问,我们全家人都希望陈大元帅给孩子起个‘扎西德勒’(吉祥如意)的名字,作为汉藏亲如一家的永久纪念。今天,终于把你盼来了,我是多么的‘嘎瓦啦’(高兴)啊!”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我以此为荣哟!”说着,他又一次地凝望着婴儿说:“孩子是祖国的未来,你可要精心照顾好她哟!”

陈老总略思片刻,说:“要我给孩子起名字,好!我就叫白玛曲贞(意为孩子是从莲花里生出来的),你看好吗?”

桑巴一听,忙激动地拍手说:“雅咕哪!雅咕哪!(太好了!太好了!)我的‘诺尔’(宝贝)太‘吉得’(幸福)了!”

说着,全家人忙向陈老总敬献“礼巾”(哈达)和酥油茶。

“我也向你及全家人祝贺‘目都德娃扎秀’(祝你们永远幸福)!”说着,忙让随行人员向产妇赠送了红糖、红布和一些儿童玩具。并再次嘱咐她月子里保养好身体。

陈老总离开产房后,同房和邻房的藏胞纷纷前来向桑巴祝贺:“你真是心想事成,你真‘吉得’呀!”

桑巴谢过众人的祝贺后,又一次激动地抱起小宝贝连连亲吻,自言自语地说:“白玛曲贞啊!你长大了可一定要记住你这‘吉得’的吉祥名字,是北京的陈毅大元帅波拉(爷爷)起的啊!”

(责任编辑 陈貽林)

西安事变前夕 李克农与张学良的秘密谈判

○刘润生



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之日，正是中华民族处在危亡之时。

对如何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毛泽东作出了带战略性的决策：我们的方针是保存东北军、西北军，在抗日的旗帜下，以壮大抗日力量。在他们不觉悟的时候，还是要打他们一下，直罗镇战役就是这样。但是“打”不是目的，目的在于促使他们觉悟，使他们认识到“剿共”是没有出路的。要尽一切可能争取与张、杨搞好关系，以实现“西北大联合”，力争全国抗日局面的早日到来。

李克农将军受命在瓦窑堡举办训练班。除了党的活动分子训练班之外，还有一个特殊的训练班，就是将红军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次战役中被俘的120名东北军中下级军官集中起来，举办“解放军军官学习班”。当地老百姓则把他们称作“白军军官连”。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不打红军！”、“停止内战，枪口对外！”、“东北军出路是抗日，打回老家去！”当东北军军官一进入训练班的礼堂时，120双眼睛几乎同时凝聚在这异常醒目而又牵动情愫的标语上，一下子把这些东北军官与红军之

间的距离缩短了许多。由十几名红军男女战士演唱的《打回老家去》的歌声突然响彻在礼堂。歌声把他们带到了正在遭受日寇蹂躏的松花江畔，歌声刺痛了这些因执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而丢掉东三省的东北军军官们那颗倍感屈辱的心。他们被唱得垂下了头，被唱得泪水满面……

这都出自李克农的精心布置。

在这些东北军官中有一位特殊人物，就是高福源。高福源是张学良的亲信，曾担任过张学良卫队营的营长，深得张学良的器重，后被提拔为东北军“尖子团”的团长。被俘后经李克农多次做工作，使他的觉悟有了明显提高，由原来沮丧、不言语，甚至有抵触情绪，转变到悔恨自己，愿意与共产党合作。他向李克农坦率直言：“为了东北军的前途，为了抗日救国，我自愿回去做张副司令和他人的工作。”

中央领导同志对高福源的处理意见李克农当然是清楚的，但此时李克农并没有立即答复。

高福源见李克农未作声，便进一步问道：“是不是怕我回去就跑了。”

李克农摇摇头解释说：“高团长，我们同意派你回去，只是考虑这样做对你会不会有危险，我有些担心。”

高福源不加思考地回答说：“你放心，我有把握，再说为了抗日救国，就是死了也值得。”并进一步说：“我回去时，你们可以派一人与我一起回去。”

临行前，李克农又向高作了交代：“你不要说共产党派你回去的，先用个人身份试探一下张学良将军的态度再深说。如果他有意，红军愿意派正式代表前去谈判。”

高福源回去见了军长王以哲，王以哲将高回来之事及时报告了张学良，然后由王以哲带高福源去见张学良。张学良对高福源先来了个下马威，拍案怒斥：你还有脸回来见我，还敢让我“通匪”。声称要将高拉出去枪毙。

高福源毫不畏惧，冲着张学良嚷道：“你算什么英雄好汉，你还有脸去打抗日的红军，把自己的家乡让给日寇，却在这里打内战！”

张学良闻声大喜，忙上前握住高福源的手说：“你果然有胆量，刚才我不过是试试你。……”

迫切想与共产党接上关系的张学良和高福源整整谈了一个通宵。

高福源带着张学良的意见，重返瓦窑堡，立即向李克农作了详细的报告。

中央决定委派李克农为中共正式代表与东北军谈判。

李克农一行于1936年2月21日从瓦窑堡出发,冒着大雪,向洛川行进。

出发前,周恩来曾嘱咐李克农:“这次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大,不成功的可能性小,但有一定的危险,你们要有思想准备,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你们无论如何不能谈崩,一定要谈好。”

东北军内混有不少蒋氏奸细,为防止泄露,李克农等人是在午夜入城,并被秘密安排在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十分僻静的院内,而且有王以哲的贴身警卫把守。李克农到达洛川的当晚就电告中央:“李等四人已安抵洛川。”

王以哲也于当晚电告张学良,禀报李克农一行抵洛川的情况。张学良在回电中称,因有事去南京,要王先同李克农商谈六十七军(即王以哲军)和红军之间的局部合作问题。其余重大问题等他回来再谈。

会谈于2月26日开始,李克农首先陈述了我党提出的大敌当前,应停止内战,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等主张。接着双方就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交谈。会谈比较顺利,经过李克农与王以哲两三天会谈,达成如下口头协定:

一、为巩固红军与六十七军共同抗日,确定互不侵犯,各守原防地之原则(包括六十七军在陕甘边区及关中地区之防地)。

二、红军同意恢复六十七军在富县、甘泉、延安之线的公路运输及经济通商。

三、延安、甘泉两城现驻六十七军部队所需粮秣、柴草、蔬菜等物,可转告并发动苏区群众运粮、柴等物进城出售,以恢复正常通商关系。

四、红军同意在甘泉被围半年之久的东北军两个营换防。

五、恢复通商:红军采办货物前

往洛川、富县等地,六十七军有保护之责;六十七军入苏区办货,红军有保护之责。为临时保密起见,红军去白区办货,东北军去苏区办货,均须穿便衣出入。

谈判初战告捷,但真正的对手还在后面。

3月3日,张学良乘飞机从南京回到西安,次日,未等恢复疲劳他便自己驾机秘密飞往洛川与李克农会晤。张学良抵洛川时,全城实行昼夜警卫。

李克农与这位少帅是初次相见。一见面,张学良开口道:“李先生辛苦了。”

李克农见张学良穿一套银灰色长袍,黑丝绒马褂,头戴礼帽,架一副墨镜,手持文明棍,酷似富商,便风趣又不失礼地问道:“张将军,你解甲从商啦?”

张学良被问得先是一愣,又很快反应过来,边笑边回答说:“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搞的是整销,不是零售。”言下之意他与王以哲所谈六十七军之事不同。

头脑敏捷的政治家李克农是不难理解此话的含意的,随即也会心地发出一阵豪放的笑声。

张学良不愧是军人,快人快语:“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李克农亮出此时的公开身份。

张学良又问:“组织部长是对敌人的吗?”

“不是。”张学良话音未落,李克农已简练地作了回答。

“你到这儿来,毛先生知道吗?”

“我正是奉他的命令来的。”

张学良站起离开座椅,边踱着方步边说道:“那就请解答几个问题:一、你们红军是不是真抗日?你们说的抗日是一个幌子呢还是真?二、红军内部是不是团结?三、你们说抗日,为什么一定要反对蒋介石?……”

李克农坦然地说道:“红军当然是抗日,要不为了抗日,何必走二万五千里到陕北?”

“你们到了宁夏还准备开到前方去抗日,是否?”

“是的。”稍顷,李克农又继续答道:“张先生,你是一个军事家,抗日这件事,要有后方,不要说要有总部后方,至少有运输后方。至于第二个问题,红军是团结的,的确有些争论,这你晓得,张国焘跟我们已经分了家,这是我们党内的斗争,张先生你不是共产党员,不可能体会到。”

张学良点点头,表示赞同。

“抗日为什么要反对蒋介石呢?就是因为他不抗日嘛!凡是抗日的,我们就团结,这是我们的方针。”

李克农解释得天衣无缝,张学良无话可言。

一直谈到中午,李克农看看表说:“张先生,你休息休息,等你休息好了,我们再谈。”

王以哲忙挥挥手:“等一等,少帅请你吃饭。”

张学良也接着说:“李先生请吃饭,抗日时期,我这里饭菜不好。”

午饭果然很简单,一个炒肉片,一个鸡蛋汤。

饭筷刚落,张学良又先问:“我不知道李先生能不能负责?要能负责再谈下去。”

“当然能负责,既然派我来,我就是代表。”

李克农回答很果断。

张学良又用试探性的口气问道:“那么,我要问一句:你们红军能不能放下武器,接受政府的改编?”

李克农断然回答:“张先生,你误会了,我不是投降代表,是谈判代表,这一点你可不要弄错了。”

说毕他起身就要往外走。

张学良连忙说:“不,不要走,不要走,谈下去。”

表情严肃的李克农缓缓转身坐下,竭力控制了一下自己的情绪,以

平和的语气讲道：“张先生也许还没有吃过亏的，请你回想一下，你的部队东进时，一共是多少？现在是多少？一部分叫蒋介石缴过去了，又有一部分跟我们抗日的部分互相抵消了……”

“好了，不谈这些了，再说另外一件事。”张学良故意把话题引开，他指了一下地图说：“能不能把瓦窑堡让给我。”

“如果副司令要此地，为什么不多要一些地方？我们共同抗日，收复失地岂不更好吗？”

在后来达成的协议中就有了此内容，1936年6月红军让出瓦窑堡，中央机关搬迁到延安。

我们做出一点让步，是为了帮张学良个忙，他可以用所谓剿共的“战果”去堵蒋介石的嘴，减轻蒋介石对张学良施加的压力。

会谈持续到次日清晨。

在第二天的会谈中，张学良提出说，经过考虑，他要自己驾飞机到延安与周副主席见面。此话说出，他又担心会引起李克农的误解，便忙解释说：“这样做，并不是不相信李先生，我早听说还有一位周先生，而且很有学问，我是很钦佩他的，是不是可以见见面？”

“怎么见面？”李克农问他。

张学良说：“在延安见面，我还带了一个你们愿意见面的朋友，你们一见面就知道了。”

会谈一结束，李克农就将这次会议中达成的协议内容立即起草电文报告了党中央。

3月6日上午，中央复电嘉奖，对会谈结果和口头协议表示完全同意，并要李克农到山西石楼汇报。

3月7日，李克农一行悄悄离开洛川，经过几天昼夜兼行，3月16日到达石楼。石楼是坐落在山西西部边陲的古县城，红军抗日东征军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下，于1936年3月驻扎此地。

李克农向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洛川会议的详细经过和张学良提出的条件。毛泽东听完汇报，颇为满意，当即评价说：“李克农单枪匹马，干得很好。”

经中央会议研究决定，由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偕李克农去延安同张学良继续进行会谈。

4月6日，毛泽东、彭德怀给张学良发出电报：

“敝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于八日赴肤施（延安），与张学良先生会商抗日救国大计。七日启程，八日下午六时前到达肤施城东北二十里之川口，以待张学良先生派人到川口来引导入城，并请张学良先生妥为布置入城后之安全。”

关于双方会商之问题，我方拟定为：

- 1、全国军队不分红白，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救国；
- 2、为抵抗日帝侵略，全国红军集中河北；
- 3、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约问题；
- 4、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
- 5、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

双方需要商谈的其他问题。

张学良先生有何提议，即祈预告为盼。

从这封密电中，张学良摸清了李

克农在中共方面的地位及与中共首脑人物的关系非同一般。以致他在后来的自述中十分感慨地说：“使我惊讶的是，李回去后不久，中共即通知周将来谈”。在他看来，李克农是中共方面一位有权威性的使者，只要有他的穿针引线，事情就有成功的把握。自此，李克农在张学良心目中的份量愈加举足轻重了。

4月7日，周恩来和李克农带着电台和一个警卫班从瓦窑堡出发，奔赴延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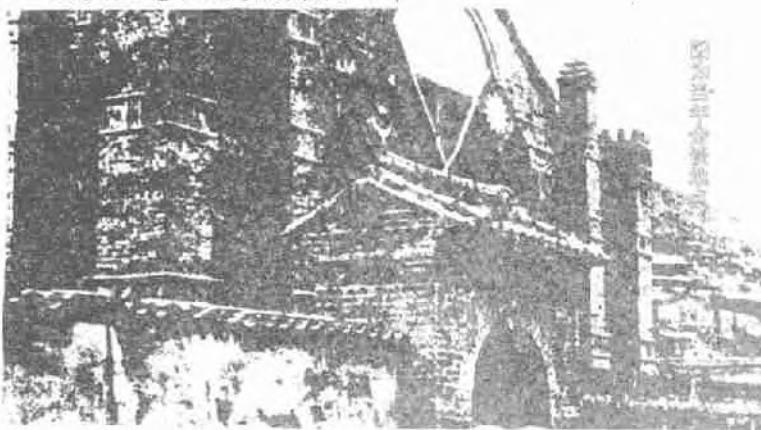
4月9日下午4时，张学良乘飞机到了延安。随张学良一起下飞机的除王以哲外，还有刘鼎，他就是张学良所提及的“我还要带一个你们愿意见面的朋友。”刘鼎是从上海到西安的，张学良知道他是共产党人，原先张学良一度认为中共首脑机关还在上海，因此，视刘鼎为上宾，目的是想与中共接上关系。现在他已知中共首脑抵陕甘，便请刘随他一并前往延安。这次会谈结束后，刘鼎就作为红军方面的联络代表常住西安。

这次张学良一改便装打扮，穿一身整洁的东北军军服，头戴东北军军帽，脚蹬马靴，军容肃整。

会谈是在延安一座教堂内秘密举行的，教堂周围有卫队营营长孙铭九率兵守卫。

9日晚8时会谈正式开始。

与延安会谈相隔八个月之后，便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辽沈战役期间，我正在给林彪当秘书。关于这次战役的基本历史史实，已有文献、书籍出版。我在这里所记载的，是我作为秘书，对在这次战役中朝夕相处的林彪的一些细节，作一个补充介绍。这些情况，基本是鲜为人知的，甚至有的只有我和林彪知道的，或者是已出版的文献资料有所记载，但我认为同事实不尽一致的。

——作者



当林彪秘书时的谭云鹏



1948年初，东北国民党的部队已被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的据点和地区之内。除了攻击这三个点的敌人外，已无仗可打。这三个点中，打沈阳是当时不可能考虑的。因为连杂牌部队在内，有近三十多万人据守，并且有好几个美械装备的军，还在城周和市区内构筑

○谭云鹏

了相当坚固的工事，又是国民党“东北剿总”所在地，敌人势必死守。这样，就只有长春和锦州可供选择了。

在究竟是先打长春还是先打锦州的问题上，林彪可以说绞尽了脑汁，有过多次的摇摆，经历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如果从1948年4月18日第一次正式向中央军委建议打长春算起，那就有五个多月的时间。以后，在中央军委、毛主席的坚持，甚至在严厉的批评下，才最后定下了打锦州的决心。

从打长春到攻打锦州

1948年东北秋季攻势的主要目标，4月18日，曾正式向中央军委请示，拟攻取长春，并已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因为长春久已孤处于我军包围之中，长春沈阳两敌之间，相距甚远，沈阳之敌鞭长莫及，并且敌人十分惧怕我军围城打援的战术，沈阳之敌也不一定敢出来。

1948年5月下旬，东北野战军曾组织过两个纵队的兵力，对长春作过试探性的攻击，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从5月下旬以后，就把攻占长春改为长期围困了。

7月20日，在林彪担任第一书记的东北局会议上，对秋季攻势的主攻方向重新进行了研究。认为要攻占有两个正规军（其中包括一个美械装备的第七军）和一些杂牌部队据守的长春，要想一举歼灭长春守敌，仍然没有把握。故向中央军委建议改为先南下攻击北宁线。7月22日，主席也已复电同意。

收到主席的复电后，具体考虑如何攻击北宁线及锦州时，林彪思想上又犹豫了起来。

林彪的心病

林彪思想深处的顾虑是：长春郑洞国所部有十余万人；沈阳的卫立煌有近三十万人；锦州的范汉杰连同锦西、葫芦岛、义县之敌还有十几万人；特别是华北的傅作义所部还有五六十万人。如果攻打锦州不能顺利得手，上述四处之敌协同动作，像1947年6月对四平攻坚战那样，我用两倍于敌的兵力，苦战半个多月，我军以重大的伤亡为代价，最后四平只剩下东北一隅了，但由于沈阳敌人的援兵逼近，我军不得不撤退的沉痛教训，如果攻击比四平还强大的锦州，有让东北敌人抄我后路和遭到东北和华北之敌夹击的危险。

所以，收到主席回电的7月22日当天，林彪忧心忡忡地叫我去起草给中央军委的电报，要求中央军委令华北

我军围攻大同，以吸引傅作义主力向西援救大同，然后林彪再向锦州下手。

7月23日，中央军委已电示华北杨成武率第三兵团向绥远方向发起攻击，相机夺取归绥（即现在的呼和浩特市），然后向包头、五原、临河地区攻击，吸引傅作义部西援，配合东北我军作战。军委这个电报，在发给杨成武兵团的同时，已抄发给东北野战军，我们都看到了。

但林彪想来想去，仍不放心。8月6日，林彪到我办公室来，又口授了一份给中央军委的电报，进一步明确提出：“东北部队不宜先向北宁线出动，而应由华北第三兵团先行动。”8月7日，林彪还觉得言犹未尽，又向中央军委发电，再一次强调了先决条件：“东北部队行动的时间，须视杨成武兵团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

军委、主席的严肃批评

8月9日，中央军委回电，严肃地批评了林彪。虽然是以军委的名义发的，但我们一看就是主席的口气，电报直截了当地批评说：“所谓你们的行动取决于杨成武的行动，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

由于中央军委的批评，林彪不好再正面坚持杨成武部必须先行动了，但他的思想顾虑并未从根本上解除。所以，8月11日，林彪经过再三考虑后，又致电中央军委，提出了另外的理由，以延迟东北部队出动的时间：“今年雨水大”，“大军南下，粮食无法解决”，“全军皆无雨具”，“只待郑家屯南北运粮道路修通，雨势稍减，即可随时出动，决不以杨成武部行动迟早为准。”

8月12日，毛主席回电，就毫不客气地明确指出：“你们所以不能决定出动日期，是放在敌情上，放在杨成武能否提前出动上……当我们向你们指出，不应把南面敌情看得过于严重，尤其不应以杨成武行动为准之后，你们又归结到粮食问题上。对于你们，敌情、粮食必须考虑周到；而对杨成武部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你们出动遥遥无期，让杨成武孤军早出，傅作义东面顾虑甚少，大力援绥，把杨成武赶走，回头对付你们，对战局究竟有何利益？”并且批评：“你们大军南下必须准备粮食一事，两个月前即已指出你们努力准备，现据来电，此项准备全未进行。”

在这种情况下，林彪虽然同意了把进攻重点放在北宁线上，但只调了五个纵队前出锦州至唐山一线，仍把十二个纵队中的七个纵队，置于长春、沈阳至锦州的西侧，重点是防止沈阳敌人西援和防止长春之敌突围逃跑上。

直到9月8日，主席制订了“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明

确指出：“你们应当使用主力于锦州、山海关、唐山一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专顾锦、榆（山海关）、唐山一头为宜。”这之后，林彪才进一步把重点明确了起来。

被迫离开双城

从这以后，虽然林彪同意了南下北宁线作战，并且指挥主力往北宁线开进，但那时，我们的前线指挥部仍在距哈尔滨市南面六十里地的双城县。

有意思的是，有一次主席来电，询问现在我们的指挥部在哪里？并且指出：“你们既已同意南下北宁线作战攻占锦州，部队主力也已先后向北宁线开进，你们的指挥部应尽早移至锦州附近，便于就近指挥，务必打好锦州这一仗。乍看起来，好像这只是一个具体问题，实质上，这是一个是不是真正下决心、集中精力打锦州的问题。”

在主席的督促下，我们才于9月21日乘专列火车，从哈尔滨绕经齐齐哈尔、白城子等地，往锦州前线开拔。

离开双城之前，有一天晚上，罗荣桓同志到林彪处来，我正在办公室整理文电。他们两个讨论起南下作战的问题时，罗荣桓同志站在办公室门口身子倚在门柱上，说：“中央军委坚持要我们先打锦州，是怎么考虑的？”林彪不满地说：“还不是任大胡子（指任弼时同志）搞的！”罗荣桓同志听了只笑了一下，没有说什么。

虽然林彪已同意了先打锦州，部队大多已到达指定位置，就连我们的指挥所，也在主席督促下，向锦州开进，但事情并没有完。

再一次动摇

10月1日，当我们乘坐的专列到达彰武车站时，收到了一份中央军委的“敌情通报”，里面谈到傅作义所部第五军第九十四师共四个师经海运从葫芦岛登陆。这样，加上原来的部队，总共已达八九个师之多。这当然对我军攻击锦州构成了较大的威胁。起先，林彪顾虑较大的是从沈阳西面之敌廖耀湘兵团（共五个军，十二个师），所以在沈阳以西、以北的彰武、新立屯、黑山、大虎山一线摆了三个战斗力比较强的纵队（六纵、五纵、十纵），而在锦州、锦西之间只摆了一个当时战斗力不算很强的第十一纵队。而锦州、锦西两敌之间前沿阵地，相距不过五六十里地。如果葫芦岛敌增援之后，两敌相向拼死进攻，难保其不能汇合。

等我把中央军委这份“敌情通报”送给林彪看了以

后，他就有些紧张，拿着电报，沉思良久。

我回来后不久，林彪就把我找了去。说要给中央军委发电，大意是：由于傅作义部增援锦西、葫芦岛，在这种情况下，是继续打锦州，还是回师去打长春，“以上两个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并请中央军委同时考虑并指示。”一句话，打锦州的决心又动摇了起来。

我当时也有些纳闷。整个决定攻锦的过程，经过那么长的时间，多次反复，好不容易定下来了。整个部署业已就绪，好比箭在弦上，怎么又动摇起来了呢？但这么大的问题，当秘书的不好说什么。林彪口授，我整理后由林彪阅过，照例速送罗荣桓、刘亚楼同志圈阅后，即以特级绝密电发出了。

从这次动摇到真正决心 打锦州的真相

听说，有的同志反映，林彪发的这份电报是以林彪个人名义发的；还有的同志认为是林彪背着罗荣桓、刘亚楼同志，却以“林、罗、刘”三个人的名义发的。

经我反复回忆，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

那时，军事指挥方面的电报，不论是对上的还是对下的，一切都是出自林彪。操作程序是：林彪口授，我记录整理，林彪认可后，由我回去加上电稿封页，并由我代林彪写上“请罗、刘核后发”的字样，连后面林彪的落款也是由我代写的，林彪从来不管这类具体事务。然后，由我派警卫员给罗、刘送去。并且打起仗来，由于军情变化紧急，电报稿送去之后都是立等退还，不论早晚。罗、刘阅后退回来，当然我得看看他们是不是有什么修改、补充的地方。如有，不论大小、多少，我都得再去请示林彪定夺；如没有，就由我视电文的内容，批上“机密”、“绝密”、“加急”、“特急”之类的字样，派人直接送机要处发出。

有的同志以为按照一般人的常规，电报大概是最后由林彪亲自签发的，实际上不是这样。林彪是从来不过问这类具体事务的，这也可以说是林彪作风上的一个特点吧。

这次对攻锦作战发生又一次动摇的电报也是照例按照上述程序办的。不仅从我的记忆来说是这样，而且从林、罗、刘他们三个的关系上来说，林彪当时大概也不会这么干。别的不说，就我给林彪当秘书这一段来说，据我的观察，他们三个可以说是团结的，互相尊重的。罗、刘对林彪在军事指挥上是十分尊重的，对林彪在军事指挥上的电报，还没有发生过一次提出过不同意见。因此，也

没有发生过电报稿送罗、刘看后，因为有不同意见，需要我再去请示林彪定夺的事情。如果有，那我的印象会是很深的。而林彪那时对罗、刘的工作也是十分放手的，从来不去干预他们职权范围内的事情。

如果林彪在这么重大的军事决策上，用个人名义给中央军委、主席发电报，首先就会在中央军委和主席面前，暴露了林彪同罗、刘的意见是不一致的，这只是林彪个人的意见。其次，不论中央同意与否，必然会在回电的抬头上写：“林并告罗、刘”，并且写明“林XX日电悉”之类的字样。这样，林如果背着罗、刘发电，终究瞒不了罗、刘。而且，如果是林彪背着罗、刘以个人名义发电的话，那中央的批复中多次批评“你们”、“你们”，没有一处只写“你”。那不是把完全无辜的罗、刘，同错误的林彪捆在一起批评了吗？主席是不会这么糊涂的。

如果林彪是背着“罗、刘”，却用三个人的名义发电给中央，如前所述，到头来不可能瞒过“罗、刘”的，那林彪以后同“罗、刘”如何共事呢？

既然如此，那“罗、刘”在这件事上是不是同林彪没有区别、完全一致呢？据我所知，不是的。在我们离开双城之前，他们三个之间虽然也有区别，但基本上还是一致的。但在中央军委、毛主席的多次批评教育下，应当说，罗、刘是坚决执行中央指示，一心一意的打锦州了。而林彪虽然勉强同意了打锦州，但思想上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一看傅作义所部增援葫芦岛，马上就动摇了。

那罗荣桓、刘亚楼同志为什么又在林彪起草的电稿上划了圈呢？我以为，罗、刘在思想上并不是真正同意林彪的意见的，但由于时间紧急，送去之后立等阅后退回，来不及仔细加以考虑，又出于对林彪军事指挥的尊重和保持他们之间的团结的愿望，他们两个大概是有些勉强地在电稿上划了圈。但事后不久，他们两个感到确实不妥当了，才两个一道跑到林彪处来，比较婉婉地提出了不同意见。当时我正在场。

罗荣桓同志说了以后，林彪一听，也后悔了。马上让我到机要处亲自查一下，看电报发走了没有，如果尚未发出，就扣下不发；如已发出，是否向中央机要局申明此电作废。

我急急忙忙地跑到机要处去，一查，因为是特急电报，机要处早已随到随译随发了。并且，这是特急电，按照一般常规，已经过了好几个钟头，中央机要局早已译印送到中央首长手头，也不可能申明作废了。

这回才真下决心了

我从机要处匆匆忙忙地回来，他们三个正焦虑地等我查的结果。当我把查的情况向他们三个汇报以后，林彪半闭着两眼，一句话也说不出。

为了补救，这时罗荣桓同志提议说，是否重新给中央军委发个电报，还是继续打锦州。好在上次电报也没有说死，只是说由于傅作义部增援葫芦岛，正考虑是继续打锦州还是回师打长春，并且请中央军委考虑这两个方案并指示。

林彪解释了一下，他之所以起草那份电报，是因为“准备了一桌菜，却来了两桌客人”，才犹豫了一下，并且表示同意再给中央发个电报，还是坚决打锦州。

接着，林彪对罗荣桓说：“是不是请你执笔？”罗荣桓客气了一下，就说：“好吧，大家凑。”他们三个由罗荣桓起头，边议边写，你一句，我一句，很快就起草完了。最后，由罗荣桓从头到尾又念了一遍，没什么意见了，就交给我于10月3日上午9时送机要处发出了。

这份电报，同时对攻锦部署作了一些调整。原来只派第十一纵队对付锦西、葫芦岛之敌，考虑到敌情变化，又增派第四纵队和热河两个独立师共8个师对付锦西之敌。

但在10月3日17时和19时，毛主席大概还没有看到由罗荣桓执笔的决心继续攻打锦州的电报，所以就打锦州还是打长春的问题，接连发了两份电报，对林彪等作了直截了当的、不客气的批评。毛主席指出：“我们坚持认为你们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丢了锦州不打，去打长春。”并且指出：“四五月间，长春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七月份，长春同样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攻锦部署已经完毕，锦西、滦河之第八、第九两军亦已调走，你们却因新五军从山海关、九十五师从天津调至葫芦岛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我们认为是很不妥当的。”

10月4日，收到了毛主席对10月3日上午林、罗、刘决心继续攻打锦州的回电。毛主席在回电中说：“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对林、罗、刘调整攻锦部署一事，主席表示：这种部署“是完全正确的，这样作，才算真正把重点放在锦州、锦西了，纠正了平分兵力的错误。”并指出：“回头打长春更是绝大的错误想法，因为你们很快就放弃了此项想法，故在事实上并未受影响。”毛主席还鼓励说：“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希望你们大胆放手和坚决实施。”

从此以后，林彪才真正下定了攻打锦州的决心，一心一意地按照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意图，直奔锦州以北的亡牛屯，具体指挥攻打锦州，再未发生过动摇。

林彪用个人名义发过的电报

那么,林彪是否一次也没有用个人名义发过电报呢?我当秘书那一段,有过一次。那是东北野战军奉令入关作战,我们从沈阳出发,坐汽车经过朝阳附近时,林彪把我找了去,点明了要用他个人名义给党中央发个电报。林彪口授的大意是:我已奉命入关作战,不可能再兼做东北局的工作了,希望中央对东北局第一书记的人选问题,及早作出决定,以免影响东北地区的工作。林彪建议东北局第一书记由陈云同志担任,如中央对陈云同志另有任用(当时在极小范围内已有议论,估计中央可能要调陈云主持全国的财经工作),则建议由高岗任东北局第一书记。就是现在看,这种性质的电报,当然也只能用林彪个人的名义发,而且是不便于让别人知道的。

朱瑞同志牺牲在义县解放之后

10月1日,在主席的督促下(主席曾在一份电报中,批评东北野战军南下作战动作太慢,并且点明了锦州外围的义县“至今”尚未解放),为了扫清锦州外围,我军攻克了义县,歼灭了敌暂二十二师。这一仗本来并不算大,却牺牲了东北野战军的炮兵纵队司令员朱瑞同志。

10月5日,我们往亡牛屯去的途中,经过义县时,曾在义县城门外朱瑞同志牺牲的地方,下车看了一下,林彪并亲自询问了驻守当地的我军有关朱瑞同志牺牲的具体情况。

原来,朱瑞同志并不是我军攻打义县时牺牲的,而是在攻克了义县之后。当时,我军炮兵部队为了更好地配合步兵的攻城作战,采用了一种新的战术,叫做“抵近射击。”即把大炮抵进到尽可能距城墙和工事近的地方,大炮变成了平射炮,对于有力地、准确地打开缺口,便于我步兵突入极为有利。实际上,这也可以说是攻打锦州的一次预习。攻打义县,是我炮兵部队第一次比较集中地采用这种战术。所以,义县解放之后,朱瑞同志要亲自到几个突破口去观察“抵近射击”的实际效果,却不幸踏中了敌人布下的地雷而牺牲。

解放锦州比预料的快得多

攻打锦州,是我东北野战军头一次大规模的攻坚战。主席曾指出过,“力争十天内外攻取锦州”,并在开始攻击锦州后,“望你们每两日或三日将情况告我们一次。”我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也打了八天之久。所以,大家估计,攻克锦州,大概至少也得三五天。

为了迷惑敌人,尽可能少受干扰,以利我集中力量攻打锦州,林彪令包围长春的我军,白天大摇大摆地向长春开拔,晚上隐蔽地回来。第二天照样如此。目的是企图制造一个假象,好像我正调集兵力,马上就要攻打长春的样子,使我攻锦部队都尽可能隐蔽地进入攻击锦州的前沿阵地。

为了确保攻锦迅速取得胜利,正式攻打锦州前,林彪他们几个曾亲赴锦州市以北的北山上,观察了地形,最后确定了入锦的具体部署。决定第二、第三两个主力纵队由北向南、第七和第九两个纵队由南向北对攻,第八纵队由东向西攻击,作为辅攻方向。第一纵队作为总预备队,置于高桥方向,以便需要时就近支援攻锦作战或用于狙击锦西方面可能援助锦州之敌。

当时,我东北正规野战军编制都很足,一般的一个师约一万四、五千人,少数主力师甚至每个师达到一万八千人以上。加上炮纵,直接攻锦的部队达二十五万之众。这次攻锦,还用上了坦克车,共十五辆,都是日伪时期的旧坦克。这是我军第一次把坦克用于战场。

10月14日上午11时,正式开始攻打锦州。由于准备比较充分,几个小时之内我南北两个主攻方向,均已先后突破敌人防线,攻入市区。当天午夜,我南北两路攻击部队就已在锦州市内会师,将锦州之敌一分为二,并继续分割围歼。南北两路我军的四个纵队,捷报频频传来。林彪原来把敌人估计过高,甚至不敢打,以后真正开始打起来,心里也没有把握,估计至少得打个四五天。等到15日上午,罗荣桓、刘亚楼同志到林彪处来,大家已是喜气洋洋,谈笑风生,一扫过去那种相当紧张的心情。

唯独从锦州东面辅攻的第八纵队,在我南北两个方向在锦州城内会师以后,仍然站在锦州城东门之外,组织多次攻击,均告无效。林彪、罗荣桓、刘亚楼都颇为生气,锦州攻克不久,第八纵队的司令员就换人了。

活捉范汉杰

经过三十一小时的激战,即15日下午5时,锦州攻克,全歼守敌。敌第六兵团司令卢俊泉等全部被俘,唯独国民党的“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前线指挥所主任、冀热辽边区司令”的范汉杰,却不知下落。锦州解放几小时之



后，我们就收到了电报，说范汉杰化装成农民，穿一身旧棉袄，戴一顶旧帽子，腰上还扎了一条草绳，但让我外围搜索部队在锦州市以南约三十里的地方查获，即将其押送东北野战军前线指挥部。有的同志可能有个疑问，范汉杰既已逃出锦州三十里以外，又化了装，我军下面的同志根本没有见过范汉杰，不认识他，怎么能查得出来呢？原来，在总攻发动之前，我前线指挥部早已把范汉杰等几个敌军主要将领的照片及其主要特征（如范汉杰是广东人，五十岁左右，身材比较高，块头比较大等等）印发各部队，令其严加监查。以后，俘获部队将范汉杰押送到东北前线指挥部时，我还去看了一下，范汉杰果然穿着一套农民的旧棉袄，腰上还扎着一根草绳，但他那个大个子，一口广东口音，再对照印发的照片，不难把他查获。

不流血的“浴血抵抗”

长春守敌“东北剿总副司令”的郑洞国所部第七军（军长李涛、美械装备）及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云南部队）及一些杂牌部队共十万余人，经我军围困长达五个月之久，部队补给已陷入无法维持的困境。攻打锦州之前，由于长春近郊的大房身机场，已在我军的控制之下，仅有的一点可怜的空投也断了。死守不能，突围逃跑也肯定会遭到围歼，反正是死路一条了。

在我攻锦已取得决定性胜利，我南北两路大军已在城内会师之际，蒋介石再次窜到沈阳，他还专门向郑洞国空投了一纸手令，严令郑洞国“立即突围”，并且威胁说：“如再有延误，有失机宜，陷全盘战局于不利，该副总司令、军长等，即以违抗命令论罪，应受到严厉之军纪制裁。……”

蒋介石的这个手令，更加促使早已同我军开始接触，并准备起义的曾泽生所部的六十军，痛下起义决心，于10月17日（即锦州解放的第三天）午夜宣布起义。曾泽生起义后，原来由六十军布防的长春市东半部地区，当即由我军接防。

在这种情况下，第七军只有放下武器或等着被歼了。过去，六十军尚在，虽蒋介石多次令其突围，尚且不敢，如今六十军已起义，锦州业已解放，我军可以全力对付从长春突围逃跑之敌和沈阳可能北援之敌。

为了争取郑洞国起义，10月18日，周恩来同志因为同郑洞国有师生之谊（郑洞国是黄埔一期生），由我攻城指挥所通过关系，把周恩来同志写给郑洞国的信交给了郑洞国。信中大意是：全国胜负之局已定，逃脱也不可能，劝其毅然起义。但经过接触，郑洞国既不同意起义，也不表示愿意放下武器。因为当时他还存在某些幻想，这个幻想被下面的情况证实了。

10月18日晚，郑洞国派代表出来谈判，达成从19日起全部放武器的协议。但谈判时，对方代表却提出，希望允

许郑洞国和其警卫营晚两天放下武器。当时,我看到电报还有些纳闷:这是什么意思?你们部队起义的起义了,放下武器的放下武器了,你郑洞国带个警卫营躲在长春市伪满中央银行的地下室时又碍什么事?所以,我方谈判代表也就同意了。

谁知,10月20日晚,我机要处截获并破译了郑洞国躲在地下室里,给蒋介石、卫立煌发的一份莫名其妙的电报。电文的大意是:共军已攻入市区,曾(泽生)叛、李(涛)降,”他正“率余部浴血抵抗中”。我当时看了觉得很可笑,我送给林彪看后说:“解放长春根本没有打仗,哪里来的浴血抵抗?”

我这才了解到,当时郑洞国之所以一方面同意李涛所部放下武器,一方面他却要求我方允许其晚两天放下武器,好躲在地下室里给蒋介石发一份尽职尽责的电报。大概是当时郑洞国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吧。当然,以后由于形势发展之快,为郑洞国始料所不及,郑洞国看到蒋介石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也就再没有提出返回国民党区的事情。虽然觉悟晚了一点,也不失明智之举。

眼睛盯住廖耀湘了

锦州、长春相继解放之后,西出沈阳的廖耀湘兵团,共五个军十二个师之众,仍然滞留在黑山、大虎山、新立屯、彰武一带,既没有积极援锦,也没有及时缩回沈阳,像是举棋不定的样子。

当9月底、10月上旬,我大军开始云集锦州地区之时,廖耀湘兵团即西出沈阳,逐步推进至新民以西以北地区并占领彰武。国民党还大吹大擂了一番,说是切断共军攻击辽西部队的后勤补给线,取得了多么重大的胜利。直至我正式开始攻击锦州,甚至到10月15日,我攻锦战斗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照国民党当时的说法,锦州已“情况不明”时,廖耀湘兵团还是不紧不慢、似进非进,不像个真正急于要救援锦州的样子,游弋于黑山、大虎山、北镇一带,10月15日廖耀湘兵团才占领了新立屯。新受蒋介石之命,刚从徐州战场调到东北任“剿总副司令”的杜聿明,还在廖耀湘的陪同下,亲赴新立屯“视察”。

攻锦战役尚未正式开始以前,林彪还未完全摸透国民党援救锦州主要靠沈阳方面(即廖耀湘兵团)呢,还是锦西方面,并且有些倾向于沈阳方面。故放四个纵队对付廖兵团,仅以一个纵队对付锦西之敌。以后,由于傅作义部队四个师从葫芦岛登陆,才在锦西方向增加了一个纵队和两个独立师。并且,锦西之敌四、五个师实实在在地轮着猛攻塔山,一个阵地竟一天九易其手,可见战斗的

激烈程度。这就是有名的塔山阻击战。我看到四纵、十一纵的电报,两军阵地之间双方伤亡的战士,因战斗激烈异常,不能及时拖回来,又因天气还较热,有的都腐烂了,臭气薰人。对比之下,林彪已看透了廖耀湘在敌人援锦中只是一个策应性质,不必过份认真地对待它。

攻锦战斗尚未结束,但已基本见分晓时,林彪信心大增,眼睛就盯着廖耀湘兵团了。盯住他,不是怕他援锦,而是怕它跑了。

别让廖耀湘跑了

经中央军委批准,锦州一解放,东北我军决心乘胜围歼廖耀湘兵团。第一着棋,就是要死死抓住廖耀湘,坚决不让他逃走。

要堵住廖耀湘兵团东逃沈阳,任务就不得不首先落在处于廖兵团侧后的第六纵队身上。

林彪首先命令第六纵队以强行军从彰武方向迅速插到新民以西地区,坚决堵死廖兵团东逃的企图;命令原在正面堵截的第五、第十纵队紧紧抓住廖兵团,实施正面攻击;命令参加攻锦的部队,不顾伤亡和疲劳,星夜兼程,回师合力围歼廖耀湘兵团。

为了麻痹敌人,还通过新华社发了一篇长的报导,详细介绍我攻锦部队业已转入休整,总结攻锦作战经验,评选战斗英雄,补充兵员弹药等等,好像真有其事的样子。实际上,我攻锦部队,已如离弦之箭,返身直扑廖耀湘兵团。

一切布置就绪,只等合围部队是否已经抓住廖耀湘兵团的消息了。

非枪毙黄永胜不可

但消息就是不来。

特别是第六纵队,经过一天一夜的强行军,不仅他们是否堵住了廖耀湘兵团不得而知,连六纵队进到什么地方了也不知道,完全同前线指挥部失去了联系。

林彪、刘亚楼不停地问我:“有消息没有?”他们着急的心情可想而知。他们两个说着说着就火了起来,林彪平素是很能沉得住气的,这时也生气了,吊下了脸,说:“这个黄永胜(黄当时是第六纵队司令员),简直是乱弹琴嘛,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呢?要让廖耀湘跑了,一定要严肃处理!”刘亚楼同志火气更大,他瞪着眼,加大了嗓门说:“要让廖耀湘跑了,非枪毙不可!”我还是第一次见他

们发这么大的火。

林彪泄气了

这时,在林彪的心目中,廖耀湘已经跑掉了。

当天晚上,我非常紧张,不敢上床休息。快午夜时,机要处突然送一份电报来。我一看,是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的卫立煌发给廖耀湘兵团的,被我机要处截获并破译了出来。这份电报,具体规定了廖耀湘兵团各军各师当晚的宿营地。

我兴奋极了,拿着手电,一边看电报,一边查看地图,一看廖兵团今天晚上基本仍滞留在黑山、大虎山、北镇一带,还没有跑。

我特别在口袋里多装了几张发电稿纸,就往林彪的房间里跑。

林彪听见了我的脚步声,就问:“是谭秘书吗?”可见,那天晚上林彪虽然提前上了床,实际上他根本没有入睡,肯定是认为廖耀湘已逃走了而窝火。平常他都常失眠,出现了这种情况,当然更睡不着了。

等我走到他床边,林彪就问:“有什么事?”我掩藏不住内心的喜悦,大声地说:“廖耀湘还没有跑掉,廖耀湘还没有跑掉!”林彪问:“怎么回事?”我就把机要处截获了卫立煌发给廖兵团各军、各师今晚的宿营地,并且我已对照了地图的情况说了一下,接着,我就把那份电报念给他听。我满以为,他听了一定也很兴奋,并且一定要发一系列电报,把部队指挥上去。谁知我念完以后,他无动于衷,一声也不吭,躺在床上动也不动。

我非常着急,但我作为秘书,又不好正面说什么,只好说:“刚才我是不是念得太快了,所以你可能没听清楚,是不是我慢点再念一遍?”我看他虽然没有表示同意,但也没有表示反对,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放慢速度又念了起来。但我第二次念完以后,林彪仍不吱声。我焦急万分,要是耽误了时间,真让廖耀湘跑了,怎么得了?但我已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再也无计可施,只好大失所望地回我的房间里去。

刘亚楼非要我再去不可

刚走到我门口,我听见电话铃响。我赶快三步并作两步,把电话抓了起来。一听口音,我就知道是刘亚楼参谋长亲自打来的。

刘亚楼同志非常急促地问我:“刚才卫立煌那份电报

你看到了吗?给一〇一(当时林彪的代号,罗荣桓是一〇二,刘亚楼是一〇三,谭政是一〇四)看了没有?一〇一怎么说的?”一连串的问题向我提了出来,可以听出,他是非非常着急的。

我就把刚才收到电报以后的情况向他汇报了。刘亚楼同志严肃地对我说:“你再去给他讲一下。这可是军机大事,耽误不得的呀!”我说:“我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我当秘书的实在不好办。是否请参谋长亲自来一下?”刘亚楼同志说:“参谋长去更不好,你是当秘书的,没有什么关系。你还是再去一趟吧。”我想也是如此,要是刘亚楼一去,可能有伤林彪的自尊心。所以,我也顾不得多想,放下电话又去了。

一进林彪的房间,林彪就问:“是谭秘书吗?又有什么事?”我一路走,一路想,实在也找不出其他新的理由了,更不能说这一次是刘亚楼同志让我来的,我只好说:“刚才那份电报,可能是我没有说清楚。我回去以后,又仔细看了一眼,又重新查对了一下地图,我看廖耀湘确实还没有跑。我怕耽误了大事,所以我想再给你念一遍。”我看林彪并没有反对,就抓紧机会连说带念地又给他念了一遍。但林彪听了,仍不置一词。这时我真急坏了,因为刘亚楼同志的指示,所以,我就大着胆子对林彪说:“看来廖耀湘真还没有跑,是否得赶快发几份电报?”

我猜此时林彪虽然还是不大相信廖耀湘没有跑掉,但他也得盘算,万一真的还没有跑呢?如果真的还没有跑,让林彪错失时机给放跑了,他不是要负责吗?退一步说,就是已经跑了,把部队调上去,也不会造成多大的损失。所以,这一回倒很好,林彪沉思了一会儿,就说:“你记一下吧!”这一下我可高兴死了,问题解决了。接着他就一气口授了好几份电报,有的电报是同时发几个纵队的。因为敌我形势,林彪都很熟悉,所以,他仍旧躺在床上,根本没有起来看地图。

这几份电报,我赶快整理了一下,念给林彪听。他认可以后,我迅速按老规矩,让警卫员立即送罗荣桓、刘亚楼同志核后交机要处发出了。我可以想像得到,当刘亚楼同志看到了这几份电报稿后,也是极为兴奋的,当然也用不着他再打电话催促我了。

东北国民党军难免全军覆没

前几年,我曾陆续看到过原东北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范汉杰、廖耀湘等人写的回忆录,才进一步明白了廖耀湘兵团西出沈阳之后,既不坚决西进援锦、又不及早撤回沈阳、也没有下决心从营口逃跑、迟疑不决的原因。

原来,在攻锦战斗之前蒋介石曾多次严令廖耀湘兵团西撤锦州,只以周福成所部的五十四军和一些杂牌部队守沈阳;卫立煌则唯恐我采取攻锦打援的办法,使廖耀湘兵团遭到歼灭,而坚持要等到锦西、葫芦岛的国民党军先向锦州发起攻击,打通锦西、锦州通道,西锦部队汇合后,合力向东攻击,这时廖耀湘兵团再全力西进,两下对攻,妄图那时再同我主力决战。因为意见不一致,拖延数月之久,方针始终定不下来。为此,蒋介石曾多次电令卫立煌、杜聿明、廖耀湘赴南京面商,并多次派大员到东北,逼卫立煌就范,甚至蒋介石曾两次专程到沈阳,也未能得到统一。

在这种情况下,卫立煌也不敢公然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只好拖延应付,派廖耀湘兵团西出新民,甚至到达彰武、新立屯、黑山、大虎山一带,但要他走得更远,他也不干。10月15日,锦州已经解放,廖耀湘一看形势不妙,曾向卫立煌建议走营口,从海上逃跑,但卫立煌复电,仍令其撤退到沈阳。甚至10月26日,我军歼廖兵团的部队已完全包围了廖兵团,廖兵团已溃不成军,连兵团司令部都被我军冲散,廖耀湘带几个人仓皇逃到新二十二师师部,给卫立煌发电请示后,仍指令其撤回沈阳。

原来如此

林彪终于根据卫立煌规定廖耀湘兵团当晚各军各师的宿营地的信息,发了几份调动部队包围廖兵团的电报以后,10月24日凌晨,终于收到了黄永胜的电报,说该纵第十六师已经先期占领了新民以西的厉家窝铺车站,正构筑工事,廖耀湘兵团所部蜂拥而来,拼命向沈阳方向逃窜。战斗十分激烈,十六师伤亡颇大,但六纵十七师也已先后进入阵地。他们将不惜任何牺牲,坚决堵死廖兵团东逃之路,以待兄弟部队到达后围歼。并且说明:他们之所以一天一夜没有同总部联系,是怕把廖耀湘放跑了,部队全部强行军,走了一段,为了减轻战士负担,加快行军速度,干脆把行李和干粮袋都扔了,战士只携带枪支、弹药,有的战士都跑得吐血,二十多个钟头,根本没有休息,也没有埋锅造饭,也就没有时间架设电台等等。

林彪看到了黄永胜这个电报,才高兴了起来。这回事算是一块石头落地,廖耀湘兵团确实是被抓住了。当天上午,刘亚楼同志到林彪处来,两个人说说笑笑,兴奋的心情溢于言表,并且谈论起廖兵团歼灭之后,何时进入沈阳的问题。当然他们两个再也不提起要枪毙黄永胜这个事了。

廖兵团的土崩瓦解

廖耀湘兵团辖五个军、十二个师十几万人之众,又主要是蒋介石的王牌部队,如新一军、新六军、新七军,全是一色的美械装备。

1946年到1947年期间,他们真个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有时一个不大的据点,一个营守卫,我军去两个团还打不下来,敌人援军一到,我们就只得撤出战斗。但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十几万敌军据守的锦州,仅仅用了31个钟头就解放了,守敌全部被歼,敌酋范汉杰、卢俊泉等均被活捉;长春守敌,曾泽生的六十军已光荣起义,郑洞国及李涛所属的第七军也已放下了武器,长春业已解放;廖耀湘东逃沈阳的企图,被我六纵队坚决顶住,不使越过雷池一步,逃跑绝望;同时,屁股后面,我五纵、十纵等阻击部队,又返过身来紧紧追击,不能摆脱;以后又发现我攻锦部队也上去了,就知道大祸临头,完全处于听任被我分割围歼的绝境。

在围歼廖兵团的过程中,廖兵团很快就上下失去联系,像是无头的苍蝇,纷纷各自逃命。真是兵败如山倒,整个围歼廖兵团,可以说没有经过严重的战斗。

我看到一些部队的报告,十分清楚地证明:敌人已完全乱套了。有的敌人,稍作抵抗,就缴械投降了;有的敌人,一碰上我军部队,马上放下武器,毫不抵抗;甚至我军炊事班,未带武器,拿个扁担也抓了几十个俘虏。并且,只要抓住一批俘虏,一经盘查,竟然哪个军、哪个师的都有,不成其为队伍了。

虎师撞到了大虎山

据我的记忆,好像敌新二十二师倒还抵抗了一阵子。

新二十二师,这个在抗日战争中立过功勋的缅甸远征军,曾被蒋介石授过锦旗,并被命名为“虎师”。解放战争初期,也曾耀武扬威,骄气十足。

10月26日,廖耀湘在他的兵团司令部被我军冲散之后,曾带了几个随从,跑到了新二十二师师部,直到被俘。

事有凑巧,这个新二十二师的“虎师”,恰巧在大虎山被歼。所以,当地老百姓说:虎师犯了忌讳,在打(大)虎山被消灭了。

“一个不小的失着”

早在10月19日,军委就明确指出:“应派必要兵力控制营口,防止敌人从营口方向逃跑。”但当时林彪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10月20日只调了一个地方独立师向营口方向前进。但10月24日,林彪又令该独立师北上,参加围歼廖耀湘兵团的大会战,以至营口完全空虚。该独立师刚刚奉命北上,就被敌五十二军所属二师、二十五师侵占,并构筑工事,企图掩护沈阳之敌从海上逃跑。

林彪接到这个消息后,才又急电九纵,以急行军奔袭营口之敌。接着,又令七纵、八纵及辽南独立二师开往营口,但已经来不及了。

由于穿越辽河水网地带,交通不便,路途又较远,接到命令最早的九纵,经过五、六天的急行军,才于10月30日、31日先后到达营口附近。虽经九纵奋力抓住,歼敌一万多人,但敌五十二军军部,二十五师大部及一个特务团,共一万多人,还是从海上逃跑了。

以后,中央军委曾来电批评说:“这是一个不小的失着。”但因辽沈战役取得了这么辉煌的胜利,中央军委以后也就再没有提过这个问题。

廖耀湘兵团覆灭之后,沈阳的解放自不待言。可以说,我大军开到之日,即沈阳解放之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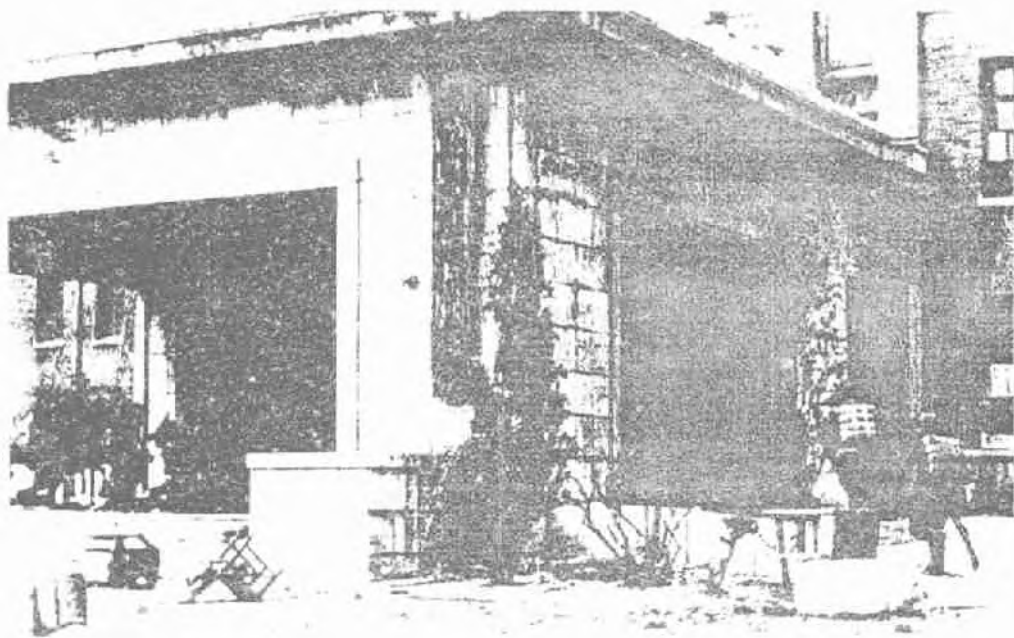
当我东北野战军的主力围歼廖耀湘兵团时,我担任牵制和包围沈阳之敌的,主要是几个地方独立师。廖耀湘兵团被歼灭之后,各地方独立师受到了鼓舞,立即向沈阳市外围积极展开了攻击,取得了一些胜利。及至我围歼廖兵团的主力部队,乘胜东向沈阳时,基本没有经过多少像样的战斗。我军于10月2日完全解放沈阳。至此,东北全境宣告解放。

当时,我东北野战军前线指挥部所在地的亡牛屯,上上下下,喜气洋洋,欢欣鼓舞,都在等着一声令下,就奔向沈阳了。10月3日就下令准备动身,10月4日,我们就从亡牛屯出发,第二天晚上就进入了沈阳。

我们的住地,早已由后勤部门安排好了。可是,当我们进入那栋日本式的小楼时,看到室内一派狼藉,满屋都是扔着乱七八糟的东西。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有几个箱子都开着,放了一些衣物,看样子是还没有收拾好;桌子上放着几盒美制肉罐头,已经打开了,旁边还放了几把刀叉,可是罐头一动也没有动过。可见其最后逃跑的是多么的狼狈。

(责编雪舟子)

敌人的狼狈相



图为人民解放军冲入“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大楼。大楼内外一片狼藉。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中国人民从此有了自己的军队，中国共产党由此走上了独立地领导武装斗争、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对我党、我军历史上这一伟大壮举究竟是怎么发生的？长期以来，一些有关现代革命史的书籍、革命史展览中，在介绍“南昌起义”这段史实时，只有周恩来、贺龙等，很少或根本就没有提到过作为八一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李立三的活动。一般党史读物在谈到南昌起义的领导人时，从不提及李立三。其实，李立三不仅是“南昌起义”的重要领导人，而且还是这次起义的倡导者。从当时中国共产党内部来说，李立三与周恩来都是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五名常务委员之一，在领导“南昌起义”的活动中，李立三的地位和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1927年4月上旬，在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前夕，中共中央在武汉三次开会专门研究了江、浙及上海方面的工作。中央认为江浙及上海方面的工作已经到了严重时期，过去上海有“右”的错误，今后要认真准备和进行反蒋的斗争。为此，作出了《关于沪区工作的决议案》并决定派李立三、陈延年、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去上海，由李立三、陈延年、维金斯基、赵世炎、周恩来等组成一个特务委员会，贯彻执行中央决定，负责组织领导上海方面的反蒋斗争。李立三一行3人4月12日到达南京时，蒋介石在上海就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员和广大工人群众进行疯狂的搜捕和屠杀。到4月15日，上海工人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

5000多人。即使在这种白色恐怖下，李立三等4月13日还是赶到了上海，通过郑超麟，很快找到了赵世炎、周恩来。在李立三领导下，特委和上海区委于4月16日召开了联席会议。到会的有李立三、陈延年、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尹宽。李立三在会上说：“中央派我、陈延年及维金斯基(基)来上海，并加上赵世炎及周恩来五人组成特务委员会。”李立三传达了来上海的任务，讨论了上海的形势，针对武汉国民政府内部对“是东征讨蒋还是北伐讨奉”举棋不定的情况，决定以与会者名义，向党中央写一个请求东征讨蒋的意见书。这个意见书由周恩来起草，李立三、赵世炎、陈延年、罗亦农、尹宽、周恩来6人签名，用电报《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发给了在武汉的党中央。电报指出：“蒋氏之叛迹如此，苟再犹豫，图谋和缓或预备长期斗争，则蒋之东南政权将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

4月18日，特委会举行第2次会议，李立三传达了中央对沪区工作的决议案，然后进行讨论。大家认为，在对待蒋介石的态度上，“中央政策动摇，指导无方”，批评“中央对争领导权没有决心。”“此次活动(共产国际)东方局也要负责。”提出，这些问题应该提到将要召开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去进行讨论。

会后，根据中央的通知，周恩来留在上海，李立三、罗亦农等回武汉参加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开幕，李立三被选为大会政治委员会成员，5月9日李立三被选为中央委员。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维汉、蔡和森、李立三、瞿秋白、谭平山7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陈延年、周恩来4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4人为常委，陈独秀继续被选为总书记。

“五大”闭幕后，5月13日原驻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第14独立师师长夏斗寅发出通电，联蒋反共，攻击武汉政府。李立三同蔡和森在政治局会上提出“派叶挺部队及中央军政学校出动，兜剿夏斗寅，占领粤汉路，以湖南为根据地，准备应付武汉反动局面。同时扩大工农纠察队武装，发动群众起来作殊死战”，“以武力对付武力，以暴动对付暴动。”中共中央采纳了他们的提议，调武汉卫戍司令叶挺率部奋起反击，迅速打败了夏斗寅的叛军。但是，拒绝了他们关于建立湖南根据地的建议，也没有决心“以武力应付武汉反动局面”，失去了一次重要

的革命时机。

紧接着 5月21日，又发生了“马日事变”，即在蒋介石、汪精卫唆使下，湖南的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在短短20多天里，就在长沙及附近各县屠杀了一万多人。革命危机日趋严重，一些不坚定分子消极逃散，有的甚至公开叛党。

5月30日，中央常委会任命李立三为中央工人部长，成立了以李立三为首的7人中央工人运动委员会，兼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干事会书记。

为拯救革命，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改组，成立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陈独秀被停职，从此离开党的领导岗位。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 5人组成。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宣布“本党党员退出国民政府”，号召“国民党党员群众及一般民众起来反对背叛革命的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

7月14日晚，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了秘密会议，确定了分党计划。7月15日又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了《取缔共产党案》，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公开背叛革命。随之，汪精卫集团就同蒋介石集团一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面对汪精卫正在进行的反革命大屠杀，为了使革命走向复兴并取得胜利，新组成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一方面部署党组织迅速转入地下和把党中央机关经九江撤退到上海；一方面在军事上在决定发动湖南、湖北、广东、江西四省的秋收暴动时，又决定组织中共在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力量，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把我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叶挺的第11军和贺龙的第20军，开回广东，“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以图再举。为此，党中央特派中央常委李立三与秘书长邓中夏去党的力量较强的第4军、第11军驻地——九江，做部队移师广东的准备工作。

关于在南昌举行起义问题，李立三在1927年10月写的《“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一文中指出：“我们动身（去九江）时，中央并未给我们准备此项工作任务。

7月19日李立三和邓中夏奉中央命令抵达九江后，谭平山也到了九江。7月20日，在李立三主持下，三人开会分析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在政治上，武汉政府已完全反动，唐生智正在积极屠杀我党，压迫工农运动。汪精卫已完全投降于唐（生智）。张发奎态度虽然仍

表示反唐，却已深受汪（精卫）之影响，高唱拥汪，并表示对我们不满，有‘在第二方面军之高级军官中的CP（即共产党）分子如叶挺等须退出军队或脱离CP’之表示。”“在军事上，4军、11军已向南昌移动，驻扎于马四岭、涂家埠一带，20军已渐次集中九江。朱培德之3军移驻樟树，9军移驻临川。程潜之6军经江西之萍乡分道向南昌集中，有包围我军之形势。……军事上已到了极严重之时期，而张（发奎）尚徘徊于武汉，则张之不可靠，更可证明。”他们一致认为，由于“张发奎态度之犹豫与右倾，那么依靠张为领袖之回粤运动，很少成功之可能，甚至为3、6、9军所包围而完全消灭。纵然回粤成功，我们亦必在张、汪协谋之中而牺牲，将与我们回粤去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之目的完全相反。所以我们应该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因此，决定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20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3、6、9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在这次会议中，没有不同意见，遂将这项意见报告中央。”

此时，前中央常委瞿秋白正在庐山。李立三他们研究以后，3人分工：谭平山留在九江，李立三、邓中夏“即赴庐山和（瞿）秋白商议，秋白亦完全赞同这项意见。当时闻中央有召集紧急会议之讯，即请秋白代表在浔（即九江）负责同志之意，并请中央即速可决。”

当时，林伯渠的堂叔在庐山英国人开设的饭店——仙岩客寓当大师傅，李立三又在他的厨房里召集了一次会议。他们用围裙遮起窗户，点起蜡烛，讨论有关武装起义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林伯渠等十来个人。大家都表示赞同。

正当李立三与邓中夏在庐山与瞿秋白商谈时，谭平山在九江得知汪精卫、张发奎、朱培德、黄琪翔等将在庐山开会，解决在第二方面军中的共产党员。

7月23日，恽代英、贺龙到达九江，“黄琪翔、朱培德即邀其赴庐山开会，并百般拉拢。”“同时（谭）平山已将在南昌举行暴动之计划，探贺龙之意见，贺表示甚为热烈。”“又得叶挺出来说硬话，于是贺之主张更为坚决。”由于形势危急，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发电报通知仍留在庐山的李立三回到九江开会。

7月23日晚和24日，李立三、谭平山、邓中夏、恽代英在九江开第2次会议，又具体研究了南昌暴动的计划、政纲、宣言、以及组织与宁、汉国民党中央党部相对抗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问题。决定：叶、贺“军队于28日以前集中南昌，28日晚举行暴动，并急电中央征求可

否?”“在政治上,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集中政权党权军权之最高机关,以反对宁汉政府中央党部,继承国民党正统,没收大地主土地……实行劳动保护为暴动之目的。在这项纲领之下,发表宣言(用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名义)。”

第2次九江会议,“对暴动计划完全一致。”但在讨论要不要把没收大地主土地列入政纲时,发生了“很大的争论。”“立三、代英主张须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政纲为暴动的目的,因为南昌暴动的主要意义,就是要继续没收土地的斗争,实行土地革命。中夏、平山反对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政纲,谓恐因此惹起反动势力更加联合的攻击,和军队内部分化。争论极烈,当日会议无从决定(两方人数一样),只决定报告中央征求可否?”

与李立三等在九江召开第2次会议的同时,瞿秋白从庐山赶到武汉。7月24日临时中央常委会开会,“秋白把(在)南昌(举行起义)的决定(建议)由得带到汉口,中央已决定对张发奎的态度,如张不与汪精卫联络,则到东江之后始解决之,否则在得便解决他。故赞成(在)南昌(起义)的决定。”中央“决定以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组成前敌委员会,组织和领导南昌起义。”

临时中央常委同意在九江的同志关于在南昌举行起义的建议后,报告了共产国际。国际回电说:“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把在(国民革命军)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

中央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奉命于7月25日到了九江,立即召集在九江的李立三等人开会。会上,周恩来“报告(传达了)中央意见,认为形势既已如是,对在得同志的意见完全同意。”会后,周恩来等“积极进行军事之准备,并由中夏同志将详细计划回汉报告中央。”

会后,周恩来、李立三等“于7月27日齐赴南昌,正式照中央命令成立前敌委员会。”“前敌委员会指挥前敌一切事宜。以恩来、立三、代英、彭湃四人组织之。”周恩来任前委书记。后来,张国焘、谭平山也参加了前委会议,但不是前委委员。至此,南昌起义由酝酿、决定、转入实施阶段。前委27日研究决定:“因军事的准备来不及,遂改定于30日晚举行暴动。”

7月26日下午4时,在武汉的临时中央常委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又举行会议,参加的人还有前常委瞿秋白和共产国际代表、少共国际代表、加伦、范克诸同志,翻译若克、家展两同志,讨论共产国际在复电中关于南昌起义有无胜利机会的问题。“大家认为即(使)在汉口亦可见着必有胜利机会,故派(张)国焘同志去前敌,以坚决前敌之

发动。”但张国焘“对于张发奎有动摇倾向,而表示怀疑举行暴动的言动。”

7月27日晨,张国焘抵达九江后,即召集在九江的“贺昌、(高)语罕、(恽)代英、(廖)乾吾、夏曦诸同志会议”,传达共产国际复电内容,提出“我来的任务是看看情形,与你们讨论这回在得发动的事件。”当即遭到大家的反对,“贺、高、廖都说再无讨论之余地。代英更说:还有什么讨论(的),已经决定了。”

正当起义准备工作在南昌紧张进行的时候,周恩来、李立三于“29日中午,连接特立(即张国焘)同志自得发之两密电,谓‘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候他(即张国焘)到再决定。’当时前委决定:暴动决不能停止,仍继续进行一切(准备)。30日早特立同志到南昌,当(即)开前委会,特立报告(传达)中央意见:宜慎重。国际电报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将在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所以,目前形势,应极力拉拢张发奎,得到张之同意,否则不可动。”张国焘讲完后,李立三最先站起来发言,明确而坚定地反对张国焘的错误意见。“立三同志即简单说:什么都预备好了,哈哈!那里现在还讨论。”(张国焘语)周恩来、彭湃、恽代英、谭平山、叶挺等与会人员都站在李立三一边,反对张国焘的意见。“谓暴动断不能迁移(延),更不能停止,张(发奎)已受汪(精卫)之包围,决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在客观上应当是我们党站在领导的地位,再不能依赖张(发奎)。争论数小时,因特立代表中央意见,不能以多数决定,故未解决。到31日晨,再开会议,又辩论数小时。”此时,得知第4军参谋长叶剑英从庐山到达九江,通报了他29日参加汪精卫、孙科、张发奎在庐山召开“清共”会议的情况:①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②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并逮捕其负责人;③第2方面军实行“清共”,通缉恽代英、廖乾吾、高语罕等人。据高语罕1927年10月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称:“张发奎、汪精卫、孙科等在庐山开秘密会议,叶剑英也被邀。第二天叶剑英回来,带了一封信给(廖)乾吾,说他不该抵毁所谓本党(他们的国民党)领袖。叶剑英并说:‘老张(发奎)靠不住了……’。叶又说他们已决定解决叶(挺)贺(龙)。我们赶紧把这个消息报告负责同志,负责同志遂决定我和廖乾吾同志离开第4军及第2方面军赴南昌。……我们于7月30日就搭了29团的军车赴南昌。……我到南昌便一再告诉希夷(即叶挺)。”

此时,又接张发奎来电,称其“准一日到南昌”。同时得知汪精卫、孙科都一同来南昌。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张国焘才表示服从多数意见,遂定于31日晚4时(即8月1日

凌晨4时)起义。

正当起义准备工作在顺利进行的时候,31日晚21军1师1团3营副营长赵福生叛逃泄密,不得不临时改变,提前两小时举行起义。实际上,当晚12点半即打响了起义的枪声。起义军2万多人,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歼敌3000多人,缴获枪支5000支,子弹70万发,大炮数门,占领了南昌城。起义取得了胜利。

8月1日上午在原江西省政府所在地西华厅,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选举产生了革命政权机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据李立三在报告中指出:“在革命委员会之下设立政治保卫处,专为镇压反动派的机关,并决定对土豪劣绅等反动派采用严厉镇压的政策。”

同日,南昌《民国日报》发表了由22名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签署的《中央委员宣言》。

当晚7时,参谋团为实现“回粤去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之目的,讨论了起义部队南进广东的路线问题,决定由赣东经寻邬直取东江。

革命委员会于8月2日下午1时在贡院侧举行了就职典礼。李立三担任司仪,按照就职式位,各委员、各代表、各民众团体分别就位。全体肃立。向党旗、国旗、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各委员授印毕,即宣誓就职。誓词云:“余等誓以至诚恪守总理遗训,根据本党主义及政策及各次大会决议,履行革命职责。为全国大多数民众利益奋斗到底,绝不妥协,以完成国民革命工作。如违背誓言,愿受本党最严厉之处罚。此誓。”到会者“除全体委员及各团体代表等数十人外,有民众团体200余,到会群众有农工商学兵各界共数万人,旌旗蔽日,欢声振天,诚南昌前此未有之盛况,亦中国革命开一新纪元之佳兆也。”

联欢会结束以后,起义军按照临时中央常委在起义前关于回广东去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定和参谋团关于由赣东经寻邬直取东江的路线,从8月3日开始撤离南昌,取道临川、宜黄、广昌,南下广东,以期恢复广东根据地并占领出海口,取得国际援助,重新举行北伐。

李立三作为革委会政治保卫处处长,最后于“五号从南昌出发,经三日赶到临川,天气极热,沿途多系山路,每日行六十里,实际多至百里。兵士负担极重,每人背二百五十发至三百发子弹,机关枪大炮,都系自扛(因无夫子)。沿途全无农民运动,加以反动派的宣传(杨如轩事先通电各县,说我们是北军实行公妻共产),所以沿途农民闻风而逃。食物与饮料全买不到。甚至终日难得一粥。渴则饮田沟污水,故兵士病死极多,沿途倒毙者络绎

不绝。同时军队中多无军医处、卫生处等的组织,无法救治。加以宣传工作极坏,兵士全不明此次暴动的意义,因此,军心大为动摇,逃走极多,仅行军三日,实力损失已在三分之一以上,遗弃子弹将近半数,迫击炮完全丢尽,大炮亦丢了几尊,逃跑及病死的兵士将近四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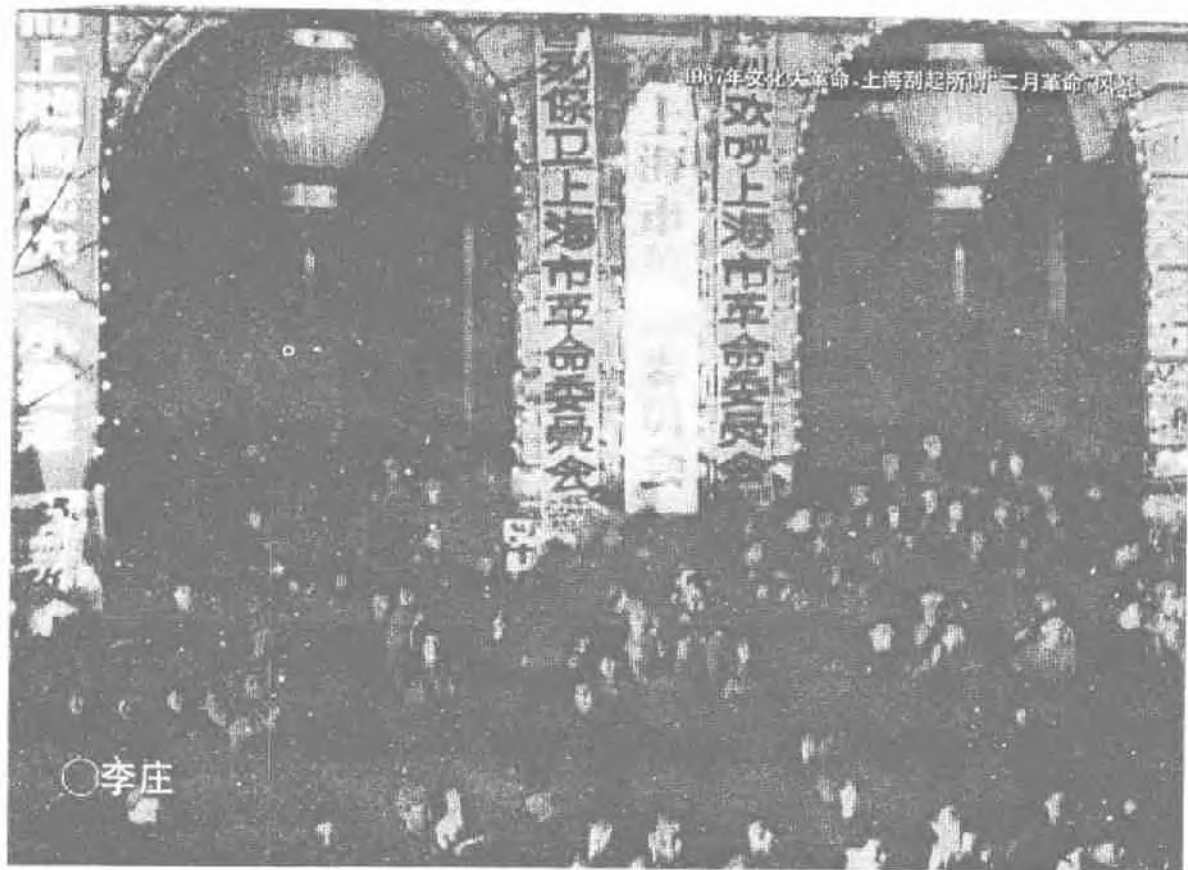
9月24日,起义部队占领汕头。这时,张太雷受中共中央委派到达汕头,传达了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精神和中央关于抛弃国民党旗帜,建立苏维埃的决定,开始着手建立中共南方局并与前委一起研究和计划起义部队今后的行动。

10月2日,周恩来、李立三、林伯渠、吴玉章、郭沫若等由汕头撤抵普宁县流沙镇的一座教堂。随后,恽代英、张太雷、彭湃也到达。次日,周恩来召集前委、革委、各军及地方党负责干部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恽代英、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郭沫若、彭湃、吴玉章、林伯渠、廖乾吾、贺昌、张曙时、吴明、杨石槐、张国焘等。会议“决定(讨论)敌军追我军势急,我军如退海陆丰实力恐难保存,拟由云落北甯作流寇行,以帮助农民斗争。革委则去掉国民党头衔,分散各省活动,将领中不愿随行者听之。此议虽决,而部队仍由流沙经钟潭向海陆丰道上之云落前进,故命令未得下达。贺龙军刚过钟潭,而叶挺军未过钟潭之时,被普宁方面之敌截为两段。”当天午后,起义部队就在乌石地区遭敌人11师、13师截击,指挥机关和24师被打散。“革委人员因亦解体,陆续逃往香港。”

据1927年10月9日张国焘从香港写给中共中央在上海的一位领导同志的信中称:“弟与立三、代英、伯承、伯渠、玉章、贺龙、彭湃、平山等均于7号来陆丰等处,陆续逃至香港,太雷、倚(绮)园诸兄,先弟一日起程返港,但至今未到,不知是否遇险;恩来(、)希夷诸兄,尚在军中。”

在李立三到香港以前,身为南方局书记的张太雷,于行军途中,1927年9月29日在汕头给党中央写信报告:“南方局昨天开第一次会议,决定加入立三及代英,以绮园做秘书,请批准。”因此,李立三到香港不久,10月15日左右即参加了南方局和广东省委的联席会议,并就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作了长篇发言。

大量史料充分说明:李立三不仅是南昌起义的重要领导人,而且是这次起义的倡导者。这就是历史的本来面目。



难得清醒

——一个老编辑对若干政治运动的反思

从事新闻工作56年，虽然已经退居二线，但生活秩序未变，工作节奏未减，我仍然自认为是新闻战线一个个老兵。

人们常说新闻记者敏感，但我似乎并不那么敏感，主要因为头脑长期不够清醒。或者说，对某些问题清醒，对某些问题不很清醒，对某些问题很不清醒。

反抗日本侵略，参加共产党闹革命，打倒蒋介石，

进行土地改革，我很清醒。对社会主义，长期把某些外加的、非社会主义的东西看成社会主义，就不够清醒。对党内某些原则问题，只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痛苦教育，才慢慢清醒过来，所以我常说：“难得清醒。”

我一生的黄金年华是在太行山度过的。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太行山的战争岁月，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战斗频繁，生活艰苦，实在磨练人、造就人。仅1942年5月反



作者近影

“扫荡”，我所在的《新华日报》(华北版)就牺牲了三十多位好同志，转移中无一人表现怯懦。面对生死考验，终抗日战争8年，太行山新闻界，未出一个叛徒或逃兵。党改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政策确实英明。

太行山又是一个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在多数情况下，饭可吃饱，衣能御寒，生活完全不要个人操心。山高谷险，群众条件好，回旋余地大，党报位于腹心隐蔽地区，有部队和群众掩护，在战斗间隙相对安定，工作、生活能建立正常秩序。工作人员过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一般无子女之累，无家务分心，又无电影可看，无马路可逛，无商品可买，无名位可求，清心寡欲，与人无争，睁开眼睛就是工作、学习，学习、工作。多数人原为小学毕业、中学肄业，后来能在各种新闻工作岗位上作出成绩，全靠在一生的黄金时代，党育成材，自学成材。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太行山参加的两次政治运动，它们奠定了我以后几十年立身做人的思想基础。正面效益极大，负面效应很小，同新中国建立后进行的一些政治运动大不相同。

这两次政治运动，一是整风——整顿学风以纠正主观主义，整顿党风以纠正宗派主义，整顿文风以纠正“党八股”，同时审查每个人的政治历史。一是“三查”——查阶级、查立场、查作风，也称整党。许多同志参加了这两次运动后形象地比喻：“脱胎换骨”。

太行区整风比延安晚一年多。我参加的整风班从

1943年年底开始，1945年夏初结束。一年多时间，脱离工作，集体生活，学习文件，审查历史，提高思想觉悟。延安整风曾经插进一个“抢救运动”，这是由康生主持搞的，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外来干部大批地挨了整，许多人被扣上“叛徒、特务、汉奸”的帽子，打击面之大，不亚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伤害了不少好同志的感情！当然很快都平反了，毛泽东曾为此在一次大会上脱帽鞠躬，赔礼道歉。太行区接受了延安的教训，也审查了干部的历史，但比较平和。我参加的整风班由各文化单位的人员组成，领导坚强，注意政策，比有的整风班文明得多。审查历史能和风细雨，阅读文件能安心钻研，交流思想能保留意见，应该说我们是很幸运的。

解放战争开始时的土地改革，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这场革命是很必要的，它对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很好的保证作用。但有些地区也曾发生过“左”的错误，例如晋绥解放区就因打击面过大而受到中央领导的批评。党报编辑部工作人员多数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但一因政治觉悟较高，二因家不在解放区，不会发生包庇家庭情事，三因未领导土改运动，谈不到多占斗争果实，报社领导执行政策又很稳妥，所以机关内部开展的“三查”运动相当文明，主要是思想教育，提高政治觉悟，个别立场不稳的进行应有的检查。有些翻身农民到某些机关索回本已参加革命工作的地主家庭出身的干部进行批斗，我们机关从未经受这种惊扰。

我的家庭出身不好，在统一战线环境中工作过一个短时期，“自由记者”思想时有流露，入党后一帆风顺，尾巴夹得不紧，理应接受审查和教育、锻炼。由于有“彻底洗澡”的思想准备，主动配合审查，积极暴露思想，自己没有紧张之感，也没有受到不愉快的对待。

我们整风班设在涉县温村一座大庙里，门口有岗哨。开班没有几天，轮到我值日，到庙门口一水井汲水。岗兵无论如何不让我接过井口，又吞吞吐吐不说理由。我心里暗笑：“井水很凉，我才不下去洗澡呢！”岗哨不久就撤了，我们整风班仍然有相当宽松的气氛。

事情也怪，气氛越是宽松，人们越是自觉，越是对自己的错误思想开火。我事后得知，附近确有一些整风班，出现过“顶牛”现象。有些人在这段时间内，主要不是暴露、批判自己的错误和问题，而是对付组织的审查和一些同学的“帮助”。当然不能全怪这些同志本人。在运动中人为地伤害感情，有时能影响一个人的后半生，这

里边有不少经验教训。

这两次运动宗旨相同，解决的问题却各有重点。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基本上解决了个人与党、个人与革命、个人与群众的关系问题，树立了作党的驯服工具、作革命的螺丝钉、作人民的勤务员的思想。这在当时，被看作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思想，或说思想修养的关键。

上述几个关系，整风、整党前不能说完全没有认识。经过整风、整党近两年的学习，应该说是明确、完整多了。几十年以后看，当时获得的思想并不能说十分全面。在正常情况下，坚决执行是完全对的；在特殊情况下，例如“大跃进”时期，实践证明许多政策并不正确，广大干部和群众认为决不可行，决策者不顾客观实际情况和群众的反对意见硬要坚持，“驯服工具”就难办了。

在这两次运动培育的思想基础上，结合十几年工作经验，我个人，以及不少经历、情况相仿的同志，对党的新闻工作路线有了进一步的领悟。不久又学习了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闻思想逐步定型。为人民服务的办报宗旨，新闻工作党性原则，新闻真实性原则，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密切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尖锐、泼辣、生动的文风，建立又红又专的新闻队伍，等等。这些原则、方针是我们的“传家宝”，指引我们在大风大浪中坚持正确的方向。不足之处是我长期不认识某些经验、作法的历史局限，当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未能及时充实、发展其内容，改变某些过时的操作方法，以致造成许多不应有的损失，付出不少代价。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给已经和即将“进城”的广大干部指明今后的奋斗方向，是极为重要的思想武装。我个人以及同时“进城”的同志曾经细心学习、领会。印象最深的是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本色，千万不要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中。“糖弹”，当时我的理解比较狭仄，主要是金钱、美女和剥削阶级的“人情”，因此在思想上构筑了“三道防线”。党的教育、警告确实十分及时，在两三年后的“三反”运动中，没有发现报社编辑部有人犯贪污错误，有腐化行为的也极少。我的家庭是地主——资本家，虽已趋没落，在我们那个平原小县还撑着“架子”。我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同家庭并无联系，1949年初“胜利进京”，用原姓名写点文章，很快就有人趋奉求事。我深知这个界线必须划清，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干部犯错误，“丧失立场”，份量重极；我

犯同样错误，“阶级本性”要罪加一等。因此，来人一概不见，来信一概不看。“文革”期间，专案组同志到家乡调查我有无丧失立场错误，得到的材料是“李某人六亲不认，托他办事概不帮忙”。这话出自旧时“门当户对”的人们之口，在当时就帮了我的大忙。“三反”运动后得知，“进城”后因“衣锦还乡”丧失立场照顾旧谊而犯错误的干部不是一个两个，所幸我并未“衣锦”，更未还乡，我很清白，在运动中没有挨整。

毛泽东上述名言，我听进去了，尽管有“矫枉过正”处，总是避免了在家庭问题上犯错误。毛泽东稍后又有一句名言：“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作，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这名言我也曾反复学习，但是未同自己的工作结合起来，实际没有听进去。《人民日报》有此情况的不只我一人，给以后的工作留下消极影响。

在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党的新闻事业是在又肥沃又瘠薄的土壤发育、壮大的。以我长期工作的太行根据地——解放区为例：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长期驻节，政治空气浓厚，军民斗志旺盛，共产党和民主政府威信极高，军民团结，干部群众关系融洽，杀敌英雄、劳动模范大批涌现，如此等等，给新闻报道提供了大量素材。党报影响很大，党报的言论被读者认为就是党和政府的号召。另一方面，根据地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根据地生产力低，文化落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报纸容量小，办报人经验不多，注意突出主旋律，常常忽视“多方面”，习惯于直接代党和政府发言，多是提出“作什么”，不注意说清楚“为什么”。信息，出于战时保密考虑，报上少；批评，出于同样考虑，报上登载不多。现在读者广泛关注的知识性、趣味性、娱乐性，当时根本提不上议程。现代工商业、高等教育、高级知识分子，等等，宣传报道概未涉及。新闻工作十分讲究时间性，当时也说，说说而已。

刚进北平，我在《人民日报》领导记者工作。记者分两批，一批是在解放区生长起来的，不熟悉城市；一批是刚参加工作、原在城市从事地下斗争的新闻记者和学生，不熟悉农村。我用长避短，安排全体记者在他们比较熟悉的地区、部门工作，这是对的。但我注意了适应，忽视了充实和学习。我个人响应领导的号召，针对自己的弱项，有意识地进行一些调查研究，像对同仁堂、瑞蚨祥、稻香村等老字号的调查研究，同一些缝鞋匠、送煤工、小摊贩的固定联系、交谈，长了不少见识。同时进

城的同志，有的十几年前参加革命时是高小学生，这时负责《人民日报》的文教宣传，访问名牌大学，向文史老师求教，慢慢积累知识逐步成为内行。但是，这些同志的努力，自发成分居多，并非有计划的安排。特别遗憾的是当时没有抓住从农村到城市、从革命割据到全国政权这个历史转变，从上而下有组织地从业务方针、办报路数、工作方法等等方面，进行一次冷静的、全面的研究，存我之长，避我之短，理出几条新形势下办党报应兴应革之道，使党报在各方面继续走在新闻队伍前面。当时大家忙于很不熟悉的城市新闻工作，见不及此或无暇顾此，应该说是一大失误。

五十年代初期开展的“三反”运动（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对于防止腐败，保持共产党人、革命干部清正廉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净化社会风气，起了巨大作用。对我个人既是一次深刻的教育，也给予我相当深重的消极影响。

人民日报社本来是个“清水机关”，但在普遍清廉的

中直机关却被认为是“深山密林”，因为有相当数量的银钱出入。当时广告极少，收入几乎全靠报费。其实报费多由银行转帐，报社看不到多少现金。但既是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势又很凶猛，有些同志的头脑就很不清醒，不少人先即认定报社是“深山密林”，“逻辑”推断“必有大虎”，又因运动事先都规定打击和清查的具体指标，完不成指标要犯“右倾错误”，因而设想如果报费被贪污百分之几，就应查出几只“大老虎”（当时标准贪污一亿元是“大老虎”，一亿元合人民币一万元）。经过这样估似，报社的空气，特别是经理部门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

报社成立了节约检查委员会，为“三反”运动领导机构，邓拓同志为主任（范长江同志是人民日报社长，当时他参与领导人民日报的“三反”运动，未任人民日报节委会主任），我为编辑部分会主任。五十年代没有“有偿新闻”这种事，也没有发“红包”的记者招待会，编辑、记者可说“一尘不染”，对“三反运动”的首要目标反贪污可

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的墙报。





在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干部认真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历史经验。

说无可交代。但上面的号召总得响应，于是就用甲写家信用了公家的信封，乙写稿浪费了稿纸等类检讨凑数。经理部门管钱管物，矛头很快集中到秘书长王友唐的身上。这是一位老同志，参加革命后一直从事行政、经理工作，为人正派，两袖清风，我十分尊重他。没有任何材料，竟把他内定为“大老虎”，说出口的“理由”是“常在河边站，哪能不湿鞋”。他平素生活俭朴，也被说成是“巧妙的伪装”。我几次向领导进言，以党籍保他清白，毫无作用。以后措施升级，竟把这位同志非法禁闭（当时叫隔离反省）近五个月。我实在看不过，对看管他的同志说：“某某是清白无辜的，我敢以党籍担保。等他出来，我先同他杀两盘（象棋）。”这在当时自然是丧失立场、同运动唱反调的“谬论”。有人劝我说话小心，有人肯定我在放毒。

很快，领导找我谈心：“‘三反’运动期间，运动、工作要两不误。你的编辑工作很忙，又顶夜班，领导照顾你，不必担任分会主任，运动也可以少参加一些。”我连忙感谢领导的关怀，说我本想提出这个请求，只是不好出口，这个正确决定是对我的照顾。

我终生不会忘记解放以前的整风、整党对我的教育，这两运动领导人的水平、魄力令我敬佩。特别是整风，一个根据地、一山之隔的两个兄弟单位，运动的领导水平、发展情况以及对参加者的长远影响，竟有那么大的差别。当然，我们当时也是洗热水澡，开始水温也相当高，好处是把许多污垢洗掉了，同时也把皮肤烫得很红。我当时曾想，在这种政治运动中，不少人思想很怪，为什么明明有两种或多种可能，偏偏只想一种坏的可能呢？为什么实事求是这么难呢？我对这种现象很烦，

竭力从思想方法找原因，希望随着人们觉悟不断提高，经验日益丰富，这种现象会自然消失。人民日报“三反”运动中虽然有人对我跃跃欲试，终于没有出手。但我从对秘书长的“隔离审查”，从对一些相关人、事的处理，明显看到某种非运动主旨的因素在起作用，有些论断失当主要并非由于思想方法片面作怪。政治运动本来应该公正地集中地解决某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增强同志的团结，提高工作水平，一旦混进某种非党性因素，它就走样了，甚至给一些不幸者造成长期的不幸。人民日报“三反”运动结果还好，秘书长王友唐同志最后被宣布完全清白，领导也曾为措施不当赔礼道歉。但这位同志到底还是离开报社，到一个文化领导机关工作。其他受审查的同志也得到正确的结论。运动还未结束，范长江同志就离开报社，到国家科委工作。他是不愿和该走的。

整风，整党，特别是“三反”给予我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以后几十年的工作和为人。我深感觉自己不是在政治运动中冲锋陷阵的材料，就相当明确地想在新闻业务工作方面求长进。工作兢兢业业、勤奋谨慎，力求不出纰漏；学习抓得也紧，业务知识、文史知识之外，努力在理论学习方面补课；生活力求克己，夹着尾巴作人，不嫌工作时间长，不怕休息娱乐少。在这些方面自认为够六十分。政治运动甘居中游，不想当也当不成积极分子。我反对无中生有的指摘，反对对问题无限上纲，我当然不会这样对待别的同志。在我领导工作的范围内，没有出现过互不信任、彼此戒备的气氛。我认为在党内，在革命队伍中，大家和和睦睦、亲密无间、努力工作是最大的幸福。为时不久，我头上就添了“重业务，轻政治”，“右倾保守，斗争性不强”的帽子。有些同志开会时这样轻轻地批评，点到为止；我也轻轻地检讨，纯属应付，多数同志也能谅解。心里说：“我没有发现写文章、看问题有哪些地方轻政治；政治运动，该参加的都参加了，该说的都说了，只是不像有些人喜欢把半斤说成九两就是了，错在哪里？”

我在人民日报总编室工作时间不短。人们戏称“总编室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矛盾集中点。总编室可说是报社的“总装车间”，对稿件取舍、安排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矛盾，主要表现在稿子上。稿子就像是记者、作者甚至编者的孩子，稿子处理好了，别的事情比较好办。我对政治运动进而对党内的人事关系，一般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但处理稿子敢负责任，也相当细心。这就是我常说的“愿意同稿子打交道，不

愿意同人打交道”。稿子是人写、人编的，同稿子打交道，其实就是同人打交道。我注意同稿子打交道，无意中也就注意了同人打交道。精采的稿子好办，早用、重用就是了。关键是去留两可的稿子，我是千方百计把它“救活”。只要能用，作者是愿意补充、修改的。实在不能用的稿子，也耐心说明原因，对作者指出今后注意之处，绝对不泼冷水。须知稿子不用，作者已经够难过了，何能再伤别人的心？如果说我在报社同志关系还不错，处理稿子比较细心大概是个重要原因。但是，作为一个负有相当责任的领导干部，我对报社经常的思想政治工作重视不够，对报社的行政、经理工作几乎不闻不问，是很错误的。

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实际是乘“双百”方针的东风进行一次步子不小的改革，从编辑方针到编辑业务都有发展，短时间出现了一些清新气象。现在看，这是对“进城”后未能就新形势下的办报路数进行系统研究、改进的失误的一次补课，也是对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的结果的反思。我对这次改革精神振奋，积极参与，提了不少建议。为时不久，反右派运动开始，这次改革立即理所当然地偃旗息鼓了。

对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我的心情一度很复杂。首先，我认为右派分子确实有，当时盛传的一些谬论使我气愤。“轮流坐庄”——你共产党不行，我们做一庄看看；“今不如昔”——社会主义不如“三座大山”时代，潜台词是应该“变天”。这些胡扯同我受的教育水平不容，我认为荒谬透顶。我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多少战友在我眼前倒下了。怎么，万千烈士的鲜血铸成的红色江山“今不如昔”？伟大革命的领导者共产党要下台？不行，绝对不行。反击右派的第一篇新闻——北京石景山工人声讨右派，是我满怀激情写的。以后我又积极参加了专门撰写反右派评论的“机动评论组”工作。可是看看报社划的右派分子，特别是我熟悉的编辑记者，实在不像。十多岁参加革命，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在机关勤奋工作，党龄一二十年，这样的同志怎么会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呢？不像，实在不像。但是，狂风骤雨之际，这种怀疑只能藏在心里，特别是有的同志仅仅说了几句“同情”“右派”的话他自己也被定为右派分子。像这样的同志当时被划为右派的何止千百个！而且定了右派即被当作敌我矛盾，虽然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一般都处理得很重，又牵连到他们的亲属，伤害了多少好人呵！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人民日报的右派分子全都平反。我悄悄

对一个同志说：“既有今日，何必当初。伤了多少好同志的感情！”

“大跃进”和1959年的反右倾我没有赶上。1959年11月我被派到苏联，担任苏方办的《苏中友好》杂志顾问兼专家组组长。当时中苏关系尚好，我的工作不如在国内忙，有时间细读人民日报，几乎从一版第一个字读到末版最后一个字。当时我认为不能参加“大跃进”宣传报道是极大的损失，因此细读人民日报免得落后太多，因为我还是人民日报的干部，是暂时被派出工作的。先是兴奋，继而困惑，终至怀疑。对苏联朋友只能说正面的话，对专家组的青年同志只能谈鼓气的话，有些心里话憋不住，悄悄到大使馆向刘晓大使请释疑难。多谢刘大使的理解和关怀，他一再对我说，你是人民日报的老同志，要细读人民日报，相信人民日报，全面观察问题，有话在这里说，到此为止，千万不能乱说。言外之意我明白了。“大跃进”时不在国内，我没有从事虚夸宣传的“帐”。当时如在国内，一则不了解宏观情况，二则习惯于坚决完成任务，搞虚夸宣传，我想是不会后人的。

1960年春回到国内，继续回人民日报工作。一位相知很深的同志说：“你没有赶上反右倾，很幸运。当心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我认为此言过重，但进一步提高了警惕，决心谨言慎行，跟上日新月异的形势。当时正值反右倾后新一轮鼓动高潮中期，经济困难虽已相当严重，宣传主调仍是保卫三面红旗，高举三面红旗。劲要继续鼓，宣传却相当难。有同志告诉我，“现在宣传要同实际保持一定距离。”并且郑重地说，这个精神来自上边。我起初大吃一惊，很快就豁然开朗，许多纷乱矛盾的现象一下子贯串起来了。我在国外看到国内报纸登载的许多天方夜谭式的材料以及某些强词夺理的说法，曾经以为那不过是记者、通讯员和编辑人员缺乏经验或考虑不周造成的，原来有这么一个指导思想在这。同党的新闻工作优良传统——密切联系实际完全相悖。是非明摆着，叫人怎么执行呢？

报纸还是要出的，找典型，找确实存在的、即使是孤零零没有代表性的典型，不仅突出报道，还“就实论虚”写评论加以宣扬。农村公共食堂是当时的宣传重点之一，它被誉为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阵地。有个典型报道和相应的社论出自我手，还被插了红旗（当时人民日报内部搞宣传竞赛，好稿插红旗）。这是一种阿Q式的自我安慰法。我们国家这么大，情况这么复杂，发展这么不平衡，在好的地方找坏的例子不难，在差的地方找好的例子也不难，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例子即使存在，

也缺乏代表性，甚至可能给读者造成某种错觉。报道似真实假、小真大假的“典型”，是党的新闻工作大忌，我们当时竟然出此下策，实在惭愧。

这个时期我的工作仍然很积极，上级交付的任务坚决完成，但不能说很主动，缺乏过去有的那种锐气。“大跃进”期间在编辑部日夜拚搏的同志这时照常工作，但精神显得有些疲惫。据我在国外读报的印象，“大跃进”期间，《人民日报》上典型多，言论多，新事多，栏目多，一句话，花色品种多；气魄大，嗓门大，标题大，照片大，一句话，鼓劲作用大。看得出报社全体同志动脑筋，想办法，在编辑业务方面确有许多创造。一旦发现自己热心宣传的不少东西原来不是那么回事，难免产生一种失落感。这种情绪对我这个没有赶上“大跃进”宣传的人也有影响，加重了我对这个运动的思想迷惘。这种迷惘终于变成一种催化剂，成为我思考一些问题进而解放思想的远因。

这时人民日报编辑部成员的主体，还是新中国建立时的“进城”干部和当时参加工作的地下党员、革命青年，受党教育多年，想方设法完成任务的观念十分强烈。尽管有上面提到的失落感和迷惘情绪，工作责任心还是有的。面对经济日益困难、政策亟需调整的严重形势，尽力想法维持正面宣传基调。经济滑坡，物质匮乏，群众的物质生活可宣传的东西不多，就在文化生活方面多作文章；纠正人民公社的共产风不好宣传，就宣传“三级所有”的好典型；反对“浮夸风”迹近批评，就宣传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纠正强迫命令不能报道，就宣传基层干部的民主作风；纠正干部特殊化可能引起人反感，就宣传艰苦朴素、坚持“四同”的好干部，等等。事后觉得，这些宣传不能说没有发生一点积极作用，明眼人也从中看出宣传的困难和我们的苦心。

1962年，我同报社、新华社几个同志一起到北京郊区房山县羊头岗生产大队调查研究。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仅有的一次脱离工作到农村调查研究。在此前后，我没有进过党校，没有参加过“脱产培训”，也没有搞过调查研究，原因是“（业务）工作离不开”。领导不安排，我也不开口。我总觉得一个党员干部应该一切听从党安排，为个人问题向组织提任何要求都不适宜，以致不少机会错过了。现在领导主动提出，我把它看作进一步了解“大跃进”的好机会。

这次调查很“幸运”，时间、题目都碰得好。领导在坚持“左”的路线前提下，进一步纠正实际工作中的某些错误，这时调查就有可能说些不超过允许范围的真话。

中央修改后内部公布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取消了原有的关于公共食堂和供给制两项重要内容,而这正是我们要调查的主要题目。

一个多月时间,同基层干部、社员群众相处甚好,无话不谈。初到生产大队,公开说明我们是报社派的调查组,了解农村生产和社员生活状况,收集干部、社员对农村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向上面反映,我们不是县里派的工作组,不处理工作问题。干部、社员可能因此更愿意说实话。到农村看看实际情况,听听干部、社员的肺腑之言,真正体会到“大跃进”以来我们的某些政策、措施是多么主观主义,多么不得人心,农村的实际情况同我们看到的一些第二手第三手材料相距多远。

我们写了一个态度尚属鲜明的调查报告,说羊头岗生产大队的实际情况和干部、社员的意见,都确切说明公共食堂势难再办,体现“共产风”精神的供给制应该取消。这个调查报告居然博得一些同志的好评,说我们能替群众讲话。其实,我们是得风气之先,为中央在这两个方面的决定提供了一个“完全正确”的例证。我们还亲眼看到这一带村庄社员自留地里的小麦长势极好,远远超过集体大田的小麦。社员都说,自留地一亩足可收获三几百斤,换成玉米,就是一家人几个月的口粮。集体大田的小麦,一亩地二百斤也收不到。“这困难,那困难,扩大了自留地就不困难。”社员说,自留地要占到全部耕地二分之一,“收公粮不用催第二遍。”当时不必说“联产承包”,说扩大自留地都犯法。这个极为重要的情况,这些来自社员内心的呼声,我没有写进调查报告,本来是胆小,当时却自我解嘲,说这本来不是我们的调查题目。

这就是我当时的精神状态。原因可以举出很多,最重要的还是缺乏不惜牺牲一切坚持真理的精神。1958年,毛泽东同志要吴冷西同志到人民日报担任总编辑时说,要有五不怕精神:不怕撤职,不怕开除,不怕坐牢,不怕离婚,不怕杀头。这实在不易作到。我当时还多一怕,怕在政治运动中受批判。有些批判同“残酷斗争”没有多大差别,我虽然没有受过,但是多次看过,当时心里就问:“有些人对自己的同志,为什么这么狠呢?”

一个受党教育多年,有一定思想觉悟的共产党员不应该如此软弱。我在战场上曾经把生死置之度外,在党内生活中,我却缺乏那种精神。这种反差使我痛心,也成为我不断反思的动力。说来惭愧,这个觉悟过程迟至“文革”后期方才完成。

“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国家、民族和我们党造成极大的不幸。《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了精辟的总结,表达了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的心意。人民日报社林彪、江青等恶人窥伺已久,被陈伯达于1966年5月31日夜间夺了权。开始,本社造反派横行之外,社会“红卫兵”、“社外监督小组”也涌进来,乱糟糟,闹哄哄,同王府井大街上此起彼伏的吼声、呼喊连成一片(当时人民日报社在王府井大街)。几个同志受迫害非正常死亡,一个“文革”开始后调进报社号称来执行正确路线的“革命领导”也从高楼上跳下去了,这在其他单位并不多见。但经过一段大混乱,运动变得比较“文明”了,“文斗”水平不低,“武斗”水平不高,私设公堂、打人致死等恶行不曾有过。

人民日报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少有现象呢?我看是多种原因造成的:

——当时在北京的不少报纸的招牌摘掉了,人员全部发配干校,一面修理地球,一面审查、批斗,任务专一,力度极大。人民日报的造反派原来也想这么办,四处寻找“老家伙”的劳改场所,最后选中相传宋辽交兵的“金沙滩”。那是一个苦寒贫瘠的少毛之地,据说越苦越利于思想改造。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毛泽东同志发了个“最高指示”:“人民日报不要另起炉灶,但要夺权。”当时人们的理解是队伍不必“一锅端”,但要换领导。结果,领导换了,队伍得以保存下来。“文革”中期,造反派“落实政策”,一部分原当权派被“结合”,一部分继续“靠边站”。前者又分两种情况,一部分被结合到“核心组”、“宣传组”,在组内坚持正义斗争,发挥共产党员应该发挥、可能发挥的作用。少数人卖身投靠,成为“造反派”的军师。

——“文革”起来,首都新闻界大受摧残:不少报纸被封闭,人员“一锅端”;有的报纸招牌依旧,人员全部“更新”;有的报纸保留招牌,人员也未全换,但只能登载新华社播发的电讯,不能刊登自己的任何文稿。只有人民日报,牌子未改,人员基本未动(领导干部除外)。坏人要控制这张报纸用它放毒;好人想通过这张报纸尽可能透露一些有利于革命的声音。两种力量的斗争持续很久,直到1975年“四人帮”完全排斥了周恩来同志对人民日报的领导,这张报纸完全变成“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工具。在斗争期间,保持了一定的“秩序”。

——人民日报的人员是个老队伍,各级领导干部多数在抗日战争开始,在党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的审查和锻炼。许多人从小在根据地参加革

命，没有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经历，没有被俘被捕的曲折，惯于拿着置人于死地的“叛徒”“特务”帽子害人的坏人他们也难下手。不少编辑、记者行政级别相当高，但无行政职务，当权派——走资派的帽子很难扣上。只好对他们“监督劳动”。

——“文革”期间，人民日报篇幅最大，编辑需要相当多的人手。开始陈伯达率中央工作组夺了权。工作组人员不多，全力炮制搞乱全国的社论和评论员文章，无暇顾及编报业务。后来“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报社，阵营庞大（最多时有三几百人），在中央工作组领导下主持报社各项工作。宣传队人员虽多，但无人能够编报，只能站在“监工”位置，让原来的编辑、记者继续工作。这就留下一些空隙，使得不少编辑、记者能够利用“监工”的根本不懂或防范不严，转弯抹角甚至明目张胆地推出一些有利于革命的东西。像理论部，基本是“文革”前原班人马继续工作，竟在“文革”后期推出一个整版，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无异在“四人帮”背后狠捅一刀。这在当时尚能勉强出版的一些报纸是很难做到的。

我在“文革”前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当权派”，当然“在劫难逃”。受过三四次批判，进过三期干校（人民日报干校办过三期，我都是学员），但未住“牛棚”，未受体罚。我相当习惯从积极方面看问题，从个人来说，“文革”十年，被冲击但烈度不大，受审查得一身清白，多年劳动有益健康，长期靠边便于读书。还有更大收获：静下心来，结合当时运动实践，认真想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自己这几十年是怎样走过来的？到底有些什么心得和阙失？

我在太行山参加共产党，1940年，日本侵略军基本停止了对国民党军队的战略进攻，大举增兵华北，党领导的敌后抗战进入极端困难时期。我要求入党时，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决心，有为党的利益牺牲一切的思想准备。我长期把党的领袖毛泽东主席奉若神明，认为他的一切号召绝对正确，无条件地坚决执行，唯有那个“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的教导没有听进去。儿时在家，“没有不对的父母，凡事听父母的。”入党之后，“没有不对的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就是胜利。”对别的事情我或许还想一想，要问一个“为什么”，对毛主席的号召，

那能够问“为什么”？坚决执行就是了。我这种想法确有根据。据我入党后的经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凡是群众心有疑难，等待指示，党中央、毛主席必然出来说话，指明前途，宣示对策，事实证明效

应如神。那时在我心中，对毛主席的指示问“为什么”简直就是大不敬。有我这种想法的党员、干部、群众很多很多，在那艰苦斗争岁月里，成为我们不断取得胜利的伟大力量。以后慢慢懂得做事情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即使是毛主席的号召，也要经过个人的体会、消化，理解才能深透，执行才能自觉，才有可能发挥某种创造性，所以还是应该问个“为什么”。但这需要相当高的水平和素养，需要相当了解宏观情况，我认为我不够格。到五十年代中后期，我年龄渐大，也积累了一些问个“为什么”的经验，随着“左”的东西日显明显，言论与实践日益脱节，也有了问个“为什么”的需要，我却不敢问“为什么”了，甚至不敢想问“为什么”了。1962年“七千人大会”毛泽东主席讲话，开宗明义“总路线是正确的”，“三面红旗要高高举起”。我起初怀疑是否耳朵出了毛病，马上自我告诫不能再想。这是长期养成的习惯：自己想的如果跟毛主席讲的不一样，必是自己不对，要赶快改正、“跟上”，并检查自己为什么“跟不上”。思想上若有怀疑，必须立即停止，否则小组会的关不好过，不交代是不忠，交代了至少挨批，何必招此麻烦？所有这些都是自觉为之，所以十分凝固。这就是说，相当长的时间，我是半个脑袋想事，一条半腿走路的。人之愚昧，以至于此！

我这种精神状态有相当代表性，还有比我更迷信的。1967年，毛泽东新语录很多，每次出来，人们总要敲锣打鼓，游行欢呼。当时我正受审查，造反派同志为使我受到教育，破例让我参加一次游行，但事先警告不许呼口号。天安门广场红旗招展，呼声震天！狂热情绪达到沸点。一个中年男子，在寒风中打着赤膊，一个碗口大的毛泽东像章，用金属链子嵌在胸前肉里，流出的血像一条黑紫的粗带，已经凝固。中年人大概不感觉痛，喊着跳着，傲然自得。其虔诚，令人钦敬；其愚昧，令人叹息。我呆呆看着，忽然生出一种凄怆的思绪。我绝不会在万目睽睽之下赤膊狂舞，但从思想实质来说，很长时间内，我不是同他一样么？

没有“文化大革命”这样猛烈、极端的破坏，我的思想解放不可能产生这样的飞跃。我常说，在“文革”中，受冲击最大的是参加革命较早的老干部，从某种意义上说，受益最大的也是老干部，就是指此而言。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全国人民公认的伟大领袖，过去如此，永远如此。但是，他是历史伟人，不是天上神佛。只有他的崇高威信、巨大影响和罕见魄力，才能发动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只有

“文化大革命”这样集中、强烈地暴露他也会犯如此严重的错误，才能促使亿万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面地、正确地评价这位伟大人物，确认“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就我个人来说，这个变化的意义，这次政治思想的觉悟，仅次于几十年前背叛剥削阶级，投奔共产党。

接受历史经验教训，党和政府决定今后不再搞政治运动，大得人心。我个人更是竭诚欢迎，似乎精神上又获得某种解放。

“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劫我者说，我的精神状态较前为好，我自己也感觉增添了新的力量。党的驯服工具，革命的螺丝钉，人民的勤务员，这几个奋斗目标没有变，也不能变，但认识比过去全面，执行比过去清醒多了。这本是一个入党多年的干部早该做到的，但对我说来却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在真理标准讨论、拨乱反正的宣传报道中，我是积极主动的。但碰到个别思想保守不容讲道理的主管上司，有时就有起伏，说明彻底甩掉积累多年的思想包袱很不容易。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一版刊登一封读者来信，写信人反对河南洛阳地区正在推行的深受群众欢迎的“包产到组”，而这种作法是《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肯定了的。信前加了一篇口气颇大的“编者按”，提出“坚决纠正（包产到组）错误作法”。这封读者来信特别是“编者按”，引起轩然大波，起了极坏的作用。我本来主张“包产到组”进而“包产到户”，又有中央的“决定”作根据，原应据理力争，拒不发表。但这位分管农业的领导人给报社写了封实为上述“编者按”蓝本的信，指定报社据此写一评论发表。我明明知道他的意见不对，又知道此人不好商量，就屈从他的权力，办了这件错事，又一次暴露了我的软弱病。

此事使我十分内疚，也促我力求奋起。为什么我就不能像一个够格的共产党员那样，尽党教育多年的党报工作者的天职？1980年1月18日，人民日报一版刊登短评《思路更广些更活些》，公开提倡农村“包产到户”，立即引起轰动。当时北京正举行一个全国性农业会议，多数人赞成这篇短评，说提倡的方法必能增产，广大农民早已这样要求，不少地区正在悄悄试行；有的领导人大惊失色，说中央对此尚未说话，报社擅写此文，谁负责任？不只提出批评，而且指定专人准备文章批判。“文革”前如果听到这种消息，我肯定诚惶诚恐；这时候，

可能由于思想早有准备，淡然坦然，准备接受批判，当然也准备说理。可能由于风向已经不同，批判文章没有出现，我也失掉一次考验机会。

我于1983年下半年到1986年上半年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又赶上好时候。大环境好，是大幸运。小环境也好，报社工作正常，人人谨慎勤奋；有时出点小纰漏，幸不伤筋动骨。但要处理的关系比过去多了，而这是我最为厌烦最为棘手的。我长期奉行一句话：“大事清楚，小事糊涂。”这时更注意实践一位领导同志的教导：“原则问题必须抓紧，非原则问题不必认真。”有一天，报社一位部主任到我办公室，他刚刚受了一场不该有的窝囊气，大概是想跟我评理。我请他看我办公桌上摆的一个宝贝——那尊大肚弥勒佛正对他咧着嘴笑。这位好同志大概受了感染，哈哈一笑，满意而去。同志关系如此，难得的幸运呀！

一位备受尊敬的老同志说过：共产党员不能只“唯上”、“唯书”，要“唯实”。解放思想不易，“唯实”似乎更难，两者都做到了，才能说进入化境。这是大事之最，我毕生奋斗的目标。

（本文作者李庄，是《人民日报》前总编辑。）

全文载即将出版的《我与新闻工作》第二卷，本刊选发表时，经作者同意作了修改）





杨玉文

率部起义的高树勋将军
(中)在同老百姓交谈。

计除“活阎王”

——石友三之死

1940年12月1日上午，冀南柳下屯村的村口，行进着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他们在长官的口令下，分两行整齐地站在道路的两旁。军乐队中有几个女兵用竹竿挑起了几条红布黑字的横幅大标语，上面写着“欢迎孙总指挥、石总司令视察我部”“反对投降卖国、坚决抗日到底”等字样。这是国民党军新编第八军的部队。

一会儿，村口土路的远方尘头大起，一支足有200多匹的马队飞驰而来，其中有两位身穿黄呢军服，领章上镶着两颗将星的将军，一位是国民党冀察战区游击总指挥孙良诚，另一位是国民党第39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

两人刚一甩蹬下马，就听见村口新八军仪仗队的队伍中传来洪亮的立正的口令声。只见从村口缓缓走出一群将校军官，领头的军官是一位中将，他就是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将军。

高将军穿过仪仗队，他们来到孙良诚、石友三跟前，互相敬礼握手致意后，携着手，穿过仪仗队，向村子里走去。

他们来到新八军军部的会议室里，勤务兵殷勤地为他们点烟、泡茶，大家都随便闲扯起来，高树勋将军也是连说带笑，出入会议室里外照应着。一会儿，一名士兵进入会议室向高树勋将军报告说：“军座！太太有请。”高树勋将军站起身微笑着对孙、石两人说：“失陪！失陪！我去就来。”

不一会，会议室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队手持短枪的新八军士兵冲进了会议室，立即将石友三的手枪下掉了。孙良诚一看大吃一惊，他忙对领队的军官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快把你们军长叫来，我有话说，你们怎么能随便逮捕上司呢？”

领队的军官立正回答道：“孙总指挥，这事与您无关，高军长现在非常忙，不能前来见您。石友三勾结日伪，准备投降日军，我们已经掌握了可靠的证据。这次逮捕石友三是重庆中央的命令，不是我们新八军决定的。”说着他转过身对士兵们喝道：“把石友三押走！”

当天晚上，石友三就被新八军的士兵处决了。

石友三1891年出生于吉林长春县。后因家境贫困而外出当兵谋生，投入北洋陆军。因为他作战勇敢，很能带兵，颇得冯玉祥的赏识。那时，他在冯玉祥手下任第三团二营营长。他年轻好胜，身体强壮，在军事学科、术科上都有一套，所有训练都亲自参加，无论杠架、木马、天桥、浪桥、攀绳、爬城、劈刺、射击样样精通，使士兵们极其佩服。并且，石友三特别注意奖惩严明。他经常在自己的二营内进行多种军体比赛，用营里的办公费买来许多小奖品，个人或各单位获胜的，当场奖给袜子、毛巾、肥皂等，一个连或一个排获胜的，立即赏给现大洋改善伙食。对成绩不好的人，不分官兵，一律当场罚站，让你丢人现眼。这样，就养成了部队在军事训练上争强好胜的作风。当时，石友三带的二营是冯玉祥的“王牌”部队，不仅冯玉祥常来检阅，而且大总统黎元洪及日本驻华公使、美国牧师也常来参观。有一次，冯玉祥在阅兵时发现二营有个士兵咳嗽，生气地说了一句：“你们二营咳嗽吧！”结果，石友三回去就罚全营官兵立正，整整站了两个多小时。后来他当团长时曾在陆军检阅使署高级教导团受训，在这期间，他每天都要听取团部军需、副官、书记等人汇报各营情况，稍有不如意之处，就星夜赶回部队，亲自处理。

石友三在前线经常是手执马鞭，在各连阵地上督战，而且不哈腰，不弯背，显示自己不怕死的勇气，激励士兵勇敢作战。

1920年，冯玉祥率部在陕西省兴平县濮阳村与陕西督军陈树藩的部队作战，各团屡攻不下。于是，冯玉祥就调石友三的二营上阵。石友三当即由各连挑选40人，亲自给每个奋勇队员的荷包里放进3块大洋，然后率领他们冲锋，一鼓作气地攻克了陈军的阵地。

石友三对待他的老兵、部队的骨干颇有一套拉拢的办法。他记忆力很强，凡跟他接触过的士兵、下级干部，他对他们的籍贯、家庭情况都有所了解，一见面就嘘寒问暖，使人感到他对你是另眼看待，看到谁家境困难就给谁几元钱，要不就说：“好好干！有什么事来找我。”石友三的部下虽然怕他打杀，但却都不愿意离开他。

石友三是个嗜杀的屠夫。他信奉“乱世用重典”的信条。他任第八混成旅旅长驻扎包头时，听信当地土绅、地

主、大商人的诬告，不经调查就拘捕、枪毙了许多不愿忍受地主等人剥削凌辱而有反抗行为的佃户、长工、苦力夫役，在包头不到半年就杀了500多人。当时，石友三曾收编了土匪苏玉声、刘喇嘛、赵玉如等三个营驻在包头郊外，不准他们进城。但又密令守城部队，只要是苏、刘、赵等部的官兵入城，一律逮捕，格杀勿论，一口气就杀了100多名受编的土匪，吓得苏、刘、赵等全都逃跑了。为此，当地人都唤石友三为“活阎王”。石友三先后取了5个老婆，除了小脚的大老婆外，二姨太是在许昌强娶的京戏园子里的花旦黄凤芝，三姨太是在北平逼娶的京戏园子里的女角程XX，四姨太是趁其在北平驻防时诱骗到手的东北军某团长的妻子，五姨太是强娶前北京《字报》主笔林白水先生的女儿林慰君。

石友三还喜欢养马、练马。他当团长时，就养了几匹走马，称为“大白龙”、“黑风”、“菊花青”、“歪蹄”等。马匹要求每天都要洗刷一次，夏天要给马穿马衣，只露出眼和牙，以防蚊虫叮咬，马匹身上稍有污臭，就会将马夫痛打一顿。在其当旅长时，养的马匹就更多了，直到他升军长有了专车后，还是养着几匹好马。

石友三在当旅长后就开始吸大烟毒品。1929年他投靠蒋介石任第十三路军总指挥后，更是公开吸毒，有时还用人参水熬大烟。1931年石友三反奉被张学良击败，躲在天津日租界里，每天注射当时价格为每针8块现大洋的“安乐根”吗啡针。

石友三爱好算命、看相、卜课、扶乩等，他经常顾问的有北平画师周伯庐等。凡是打仗，娶姨太太，出行等事，都要卜课、算命、扶乩。

石友三在旧军队中随着官职的升迁，实力的膨胀，逐渐独树一帜，成为其军事集团的首领。在长期的军阀混战中，他认准了“有奶就是娘”这个道理，为了自己的利益，什么都可以干。他是个臭名昭著的倒戈将军。他是冯玉祥一手提拔起来的高级将领，但他曾三次叛变冯玉祥将军。他曾对蒋介石表示过无限忠诚，但很快就率兵与蒋介石开仗。他亲近过张学良，但又拥兵反张。在抗日战争时期，石友三又勾结日寇，卖国求荣。

1926年，直奉系军阀联合进攻国民军。阎锡山也在张作霖的诱使下出兵雁北，企图断绝国民军退往绥远的后路。冯玉祥命令石友三、韩复榘两军进攻雁北，保障京绥铁路的通畅和安全。石、韩两人初期作战比较积极，但在后来暗中与晋军定了协议互不侵犯，借以保存自己的实力。后经当时在晋军服役的商震将军的联系，石友三率部投降了阎锡山。直到冯玉祥自苏联回国后，派张允荣、萧楚材到石友三这里劝说，石友三这才又听从冯玉祥

的指挥。

石友三率部脱离晋军又加入西北军行列后,随军参加援陕战役。冯玉祥为保证部队军纪,加强对石友三部队的控制,撤换了石友三部的参谋长和一些师、旅长,这引起了石友三的不满,这时石敬亭就任国民联军总参谋长,石友三畏惧其报复自己曾杀其外甥之仇,心中总有些害怕。不久石友三又偷偷活埋了冯玉祥派往石部工作的参谋长李秉璇,1929年5月在西北军反蒋战争中,他再次与韩复榘叛冯。

石友三投靠蒋介石后,被任命为第13路军总指挥,后又担任了安徽省主席。1929年10月,蒋介石令石友三率军南下,进攻李宗仁、陈济棠的反蒋军,并以广东省主席相许。石友三怕到南方人地两疏吃亏,正在进退两难之际,唐生智派其顾问袁华选来拉拢石友三共同反蒋,广东方面也派邓其园来说石友三反蒋,邓对石友三说:“蒋介石很可能利用你部全在船上南下的机会,中途各个消灭。”于是石友三于1929年12月9日在浦口车站召开紧急会议仓促决定反蒋,以数十门大炮排列在浦口江岸向南京轰击,并派便衣队潜入南京捣乱。由于蒋介石事先没有防备,南京闹得乱成一团,国民政府各院、部纷纷迁逃。石友三在炮轰南京后顺津浦路退入河南,并将沿途的其他驻军全部缴械,把沿线的车皮全部带走。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前,冯玉祥、阎锡山派人劝说石友三参加反蒋。石友三深知炮轰南京后已得罪了蒋介石,又见反蒋军方面军力强大,就率部再次归附冯玉祥,参加反蒋战争。但中原大战打响后,局势逐渐对反蒋军方面不利,石友三一看形势不好,就又叛变冯玉祥,响应张学良的拥蒋通电,并率部擅自放弃阵地,北撤新乡、安阳一线,打乱了冯玉祥的军事部署,动摇了反蒋军方面的军心,给蒋介石的部队造成了进攻取胜的时机。

此后,石友三又利用自己是东北人的有利条件投靠张学良。1931年1月他亲赴沈阳谒见张学良,张将石部编为4师20个团,每月发饷70万元。两人在会晤时,张学良让石友三将其所扣的津浦、平汉路的车皮全部交还给铁道部,并将石友三来东北时乘的一列铁甲车也扣留了。由此石友三又怀恨在心,加上张学良留石在东北玩了20多天,石友三怀疑张学良不怀好意,回部队后就开始密谋反张。

1931年5月,汪精卫、陈济棠在广州组织国民政府,派李汉魂游说石友三参加反蒋,并许以国府委员和第五集团军总司令的职衔,还汇来了大洋50万元。石友三想乘此南方反蒋时机将张学良驱逐出关,占领华北,于是派人与孙楚、韩复榘、孙殿英联系共同反张,并活埋了张学良

派给他的秘书长张云责。当时石部的许多将领不同意这种冒险作法,但慑于石友三的淫威,不敢反对。1931年7月,石友三就任广州政府所委任的第五集团军总司令职,起兵反张。不料原定同时出兵的孙楚等人并未随其反张,加上石友三指挥无方,士兵不明白作战的目的,仅两周时间,其数万大军都被张学良和蒋介石的部队全部消灭。

1935年后,宋哲元率第29军人主平津及华北。宋害怕石友三与日军勾结起来与他为难捣乱,就委任石友三为冀北保安司令,想以此拴住他。石友三终于又重掌军权。

1937抗日战争爆发后,石友三乘机扩充实力,被任命为陆军第118师师长。后其部又扩编为陆军第69军,石升任军长。1939年,石友三升任国民党冀察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并兼任第39集团军总司令。但石友三在对日作战中,有便宜可捞的仗就打,见到硬仗就躲。

1938年夏,石友三率其69军赴山东“敌后抗战”。这时石友三采纳其心腹的意见,介绍共产党员张友渔教授等人训练平津流亡青年学生任各连、营、团的政工干部,启发官兵爱国主义思想和加强团结抗战的精神,与共产党、八路军友好相处,从而得到了各县人民的支持,解决了粮秣兵源问题,站稳了脚跟。

1938年冬,蒋介石又命石友三率部赴冀南“敌后抗战”。石友三深知冀南八路军实力雄厚,不可得罪。1939年1月石友三到达南宫一线后,立即接受八路军介绍的张克威为其第69军政治部主任,负责石部与八路军徐向前副师长之间的联络;又以抗大学生百余人担任各级政工干部;还给自己的四姨太从政治部请来一位姓黄的女老师。但这一切都是石友三的诡计,一旦他实力雄厚,就马上翻脸,进攻八路军。

1939年下半年,石友三在冀南有了一定的实力后,就接受了蒋介石派来的复兴社骨干分子、黄埔四期的山东人臧元骏担任其第39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兼特别党部书记长,全部撤换了进步的政工人员,并按照蒋介石“同心协力将八路军消灭…”的指令,出动军队残杀八路军的地方工作人员,摧毁抗日民主政权,并主动挑起冲突,进攻八路军。

不料,石友三过高估计了自己部队的实力,多次进攻都被八路军击退。1940年初,石友三见势不好,怕八路军主力部队将其包围歼灭,就向鲁西逃窜,一路上烧杀抢掠,当地老百姓对其恨之入骨,齐心支援八路军将石友三部全部赶出冀南。

石友三其实早与日军有所勾结，一看形势对自己不利，又通过其旧交大汉奸张岚峰，准备与日军达成共同进攻八路军的协议。于是设法见到了日军驻伪军师部的顾问松室孝男。松室要求必须让石友三派全权代表参加会谈。石友三又增派其弟石友信会见了日本驻军司令官佐佐木，双方签定了所谓共同防共协定，主要内容为①互不侵犯；②互通情报；③互相协助。以后，日军以自己兵力单薄，无力控制沦陷区为由，让石友三部进驻山东濮县及河北濮阳一线，与日伪军实行联防，共同对付抗日的八路军。1940年7月，石友三与日伪军勾结，又企图窜回冀南。不料这时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实力更加壮大，不仅石友三没有攻动八路军，反而被八路军将其总部包围于巩庄，后经日军援助才逃脱。

石友三与日军的勾结，不仅不能增加其部队的战斗实力，反而在其内部增加了分歧和意见，闹得人心涣散。其部上层军官，真心跟着石友三投靠日伪的人只是极少数，第39集团军的大多数军官是爱国的，主张坚决抗日到底。如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将军早就坚决反对石与日军明来暗往地勾结，多次好言相劝石友三不要这样自掘坟墓。但石友三竟多次设计暗害高将军，暗中将新八军的动态告诉日军，借日军之手消灭高将军所部，这使新八军的抗战官兵恨死了石友三。

石友三的第39集团军在名义上辖有第69军和新编第8军两个军，而实际控制的只有69军，高树勋将军所统率的新八军只是名义上受其节制。石、高两位本来关系就不十分融洽，有一次，石友三派毕广垣邀请新八军的各位团长吃饭，席中毕对众人说：“石总司令打算到冀南去找鹿钟麟主席，你们军长要是不肯去，诸位怎么样？”各位团长都说：“石总司令到哪里，我们跟到哪里，拥护总司令发展团体事业。”高部的团长们将此情况汇报给高树勋，高将军深为不满，认为石友三要拉垮他的部队，对石倍加警觉。

石友三与日军达成共同防共协定后，按日军旨意开拔到山东濮县、河北濮阳之时，估计到高将军不会与其同流合污，就让日军偷袭大陈楼，使新八军遭受很大损失。1940年6月，第69军和新八军都派部队到后方接运给养，返回途中，石友三部平安无事，而新八军的队伍又遭到日军的截击，一名旅长阵亡，高将军认为此事又是石友三一手造成的，两人的矛盾更加激化。高将军深知石“阎王”心黑手狠，每逢集团军总部开会都让参谋长或师长代理出席，双方互不见面足有半年之久。

石友三自从与日伪军联系紧密以来，处处受敌，内部军心不稳，几次与八路军冲突都吃了大亏，高树勋将军见

其与日寇勾结，也不接受其指挥，日军也因他不宣布自己为伪军部队而不肯全力支持装备。石友三日子越来越难过，于是就传闻出石要公开投降日寇当汉奸的消息，这在重庆引起震动，立即指示臧元骏迅速行动处置石友三。臧元骏立即利用第39集团军广大官兵痛恨投降作汉奸的爱国主义情绪，利用高树勋与石友三、毕广垣与石友三、石友信的矛盾，引出孙良诚诱石友三上了圈套。

孙良诚是西北军的老将，当时任冀察战区游击总指挥，他曾任过高树勋的连长，也当过石友三的长官，是高、石两人都能相信的人。毕广垣、臧元骏摸清石友三处境困难，有与高树勋缓和一下的心思，就劝孙良诚出头邀石友三去见高树勋，以图双方和好。石友三本不想去，但见有孙良诚陪同，又能带着自己的部队护驾，估计高树勋不敢动手，就同意了。

其实，臧元骏、毕广垣私下与高树勋数次会晤，还说：“李福和想当汉奸，就有个部下黄宇宙把他干掉，难道我们这里就没有个黄宇宙？”用激将法来激高树勋将军。当高将军顾虑重庆方面是否同意时，臧元骏又说，卫立煌司令指示我们可相机处理，“中央”方面不必顾忌，还说石友三部的两个师长米文和、张雨亭也表示绝对不随石友三当汉奸，他们都表示一有机会就干掉石友三。这样就坚定了高树勋将军扣压石友三的决心。

1940年12月1日上午，高树勋将军在得知孙良诚、石友三即将来新八军军部所在地柳下屯后，立即命令卫队营长作好准备。当孙、石两人进入会议室后不久，第39集团军政治部主任臧元骏也随后赶来柳下屯，他把高树勋将军请出会议室，小声地激高说：“毕广垣可说过，是西北军的人都怕石友三，你到底敢不敢扣他呢？不扣，我就进去一同玩，要是扣，我就不进去了。”高将军笑着说：“不是早就说妥他到哪里就在哪里扣他吗，扣就扣吧！”臧元骏重重地拍了一下高将军的肩膀说：“好，我就不进去了。”于是高将军转身又走进了会议室，尔后他就命令部下扣压了石友三。

接着，臧元骏认为他负有相机处理石友三的使命，立即决定处决石友三，并很快得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的批准。

石友三被捕后，其弟石友信曾亲自率兵来救，并想勾结日军一同抢回石友三。但其又被毕广垣以召集会议为名，骗至会场暗杀。石部官兵因痛恨投降日军的石友三兄弟，愿意抗日到底，大多数都接受了改编，只有石友信的亲信温大海率一个团投奔了日伪军。

中国的法西斯——康泽

国民党特务枪杀爱国进步人士



立之

三十年代初,有一个英国记者名叫路德维希,他撰写了一本《墨索里尼谈话记》,介绍意大利法西斯头子统驭人民的方法。记者问:“你用什么方法统治人民,能使他们如此狂热的拥戴你?”墨索里尼答:“三种办法,两位老师。办法是:权力、金钱、荣誉;老师是:监狱与饥饿。”这本书使当时是国民党的一个政客着了迷,他苦思冥想,袭取这项原则炮制了一份万言书,上呈给蒋介石。这份奏折名为:《改组国民党的刍议》,建议按意大利和德国的驭民方术,组织秘密的法西斯团体。他建议这个秘密组织就叫:“蓝衣社”,精选忠贞的中青年党员为骨干,仿效德意法西斯的党卫军与褐衫队手法,穿戴特制的蓝布衫裤,于休假日或不定期的在公共场所、车站码头和桥堡广场等地干义务劳动,例如:扶老携幼、代挑重担、打扫卫生、维持秩序,等等。目的是制造舆论,使人民群众对已腐朽的国民党改观,汰除老朽,培育新人,巩固一党专政,重建绝对权威。这篇洋洋洒洒的妙文,很受蒋介石欣赏,不久就召见了这个上奏议的人。此人叫刘建群,原是何应钦从贵州带出来的乡亲,权且在何应钦的身边充当秘书;他长于口辩,是一个典型的摇唇鼓舌,擅生是非,善于钻营的角色。蒋介石召见刘

健群之后,把他的奏本批示给黄埔系秘密小组“革命青年同志会”的一小撮人研究审议,又委派刘健群接替贺衷寒充任了“军委会政治训练处”处长。

开头,黄埔系这一小撮人故步自封,仗恃是天子门生,瞧不起刘健群的政治投机,对刘冷漠地饷以闭门羹。小组的当权者:鄧悌、潘佑强、贺衷寒、萧赞育、邓文仪、桂永清、杜心如、邱开基、郑介民、康泽、周复、滕杰、戴笠等人都是得宠的黄埔生,趾高气扬,不甘受制于一个非黄埔系的官僚政客。值班的潘佑强还面对刘健群说:“校长相信你,我们不相信你。”刘健群摸了一下自己扁平的鼻子,谄媚地说:“你老哥放心,我是来为你们做灶肚子里的烧火丫头的哟。”刘健群的如簧之舌,居然渐次说服了一群莽莽武夫,终于在黄埔系的秘密小组中打开了缺口。原来这个小组,早在广州时就是蒋介石的一件秘密暗器。那时候,左倾的组织“革命军人联合会”与右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互攻,蒋介石以校长名义取缔了左右两派,貌似公正,却暗地里将贺衷寒、潘佑强等人的“孙文主义学会”改组为“革命青年同志会”,潜入地下活动。实质上这就是“效忠校长”的“黄埔同学会”。

蒋介石赞许刘健群的见解,认为比陈立夫还忠诚,而自己的门徒都不中用。于是,一面将刘的《刍议》交付审议,又几次三番地亲自召集贺衷寒等训话,听取意见。几经讨论,最后由贺衷寒与康泽草拟了具体的法西斯组织章程和条例,并由贺衷寒、鄧悌、康泽、滕杰、周复五人组成筹委会。终于在1932年3月在南京励志社,由蒋介石亲自主持成立了法西斯秘密团体“复兴社”,社长就是蒋介石。

法西斯秘密组织的始作俑者虽是刘健群,但蒋介石特别看中康泽的条例规划,因此圈定康泽拟具的命名“复兴社”,而不采用刘健群倡议的“蓝衣社”,也不录取贺衷寒签呈的“力行社”和鄧悌袖呈的“救亡社”。蒋介石又提出四句口号,作为“复兴社”的纲领,它是“驱除倭寇,复兴中华,平均地权,完成革命”。表面上是继承孙中山先生遗志,标榜抗日救国,实质上,隔了不多久于四月初又揭示十二个字,叫做:“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

从此,康泽就不再是一般的吹鼓手,而青云直上成了专业的法西斯细菌的酿造者。由于蒋介石迷信“人相术”,经常仿效曾国藩对部属面相的默察审视,裁断忠奸,他特别对异形面相感兴趣,因此康泽的“豹子头”和戴笠的“马面”以及曾扩情的“猪形”都被器重。

1932年3月正式成立“复兴社”之后,在南京明瓦廊与三道高井之间建立了秘密的社本部。它的东口高悬“军委会政治训练处”大招牌为屏障,西口以“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登记处”作掩护,内里巨大的楼屋,就是中

国法西斯的中枢。

“复兴社”组成后第一件中心工作是搞宣传,其次是开办政训班。这样,“豹子头”康泽就开始崭露头角,以后他就变为十二字诀(安内攘外……)的专家。他从事编织杜造各种培育法西斯细菌的计划,一个一个地都获得蒋介石的批可。

一年后,“政训班”结业,名目上由原属“军委会”改为隶属“中央军校”,蒋介石以校长身份亲临点名讲话,康泽随侍在侧,他又为“校长”多收录了500名门生。

1933年,刘健群率领这500人改编的“华北抗日宣传总队”到了北平。他们虽是打着“抗日”旗号,但却是取缔抗日,刘健群和宪兵第三团配合搞了一次“一二·九惨案”,这是“复兴社”第一次“安内攘外”的实践。

“复兴社”成立之前,康泽就利用一个叫杨周熙的黄埔六期生编写了一本书,书名为:《三民主义的法西斯化》(后来康泽改名为《三民主义的复兴运动》),倡议用希特勒式的仪礼崇拜“领袖”蒋中正。经过大肆宣传形成了一种时髦风尚。“复兴社”成立后,凡集会或谈话,甚至打电话时,只要一提到“领袖”、“委员长”、“蒋中正”、“蒋介石”等名词时,必须肃立和碰响脚跟(原定伸直右臂高呼领袖万岁,后取消)。后来,“复兴社”派出了几批人赴德国、意大利去朝圣取经,学习法西斯蒂秘诀。这时候的康泽俨然是蒋介石的灵魂了。他迈着狗熊般的慢步,昂然地伸直凸出的“豹子头”,睥睨左右,装腔作势地扮演着接班人的样子。

蒋介石采纳“黄埔同学会”负责人萧赞育的意见,批准收容反叛的黄埔学生办一短期训练班。目的是化干戈为玉帛,招降纳叛,促使归顺“校长”,效忠“革命”。这批人中,有曾在改组派扩大会议上为汪精卫摇旗呐喊的跑龙套:杜从戎、徐会之、郭仲容、陈远湘等人;也有投入邓演达第三党的骨干:黄雍、陈烈、韩浚、廖宗泽等人;还有曾是共产党的叛徒:喻庸、余洒度、梁干乔等人总共约60多人,就在明瓦廊三道高井之间邸宅内办了一期秘密的训练班。这个班,也是康泽条陈部署,名义由鄧悌主持,是蒋介石亲临讲话(“授课”)。

按康泽的条陈计划:教育从严,待遇从宽,宽严相济,使受训者感到精神有所归宿、生活止于安定。短期训练班并无教育进度规划,也不外聘专职讲师,秘密训练的行程安排,除了“总理遗教”(讲述孙中山思想体系)、“领袖言行”(吹捧蒋介石英明伟大)、“国际形势”(讲解法西斯轴心国的反共趋势)、“精神讲话”(引论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的历史论证)等课目外,重点是小组讨论。蒋介石特别指定要修学王阳明、曾国藩的著作,必须写心得笔记,在小组讨论会上提讲,并由“校长”亲自审批。这样

严谨的思想箝制直灌法西斯毒素,当然无一例外的都造成法西斯工具。生活待遇比一般公务人员优厚。按黄埔期别分为三级待遇:一期生每月80元,二期生70元,三期以下一律60元。结业后如尚未及分配工作者,仍照支此数发生活费。

办训练班可说是蒋介石的一件法宝,它通过训练、训练、再训练,从中间筛选出干部,集结力量,又精选心腹,散之于天下,届时一呼百诺,气冲斗牛,无敌不克。康泽登堂入室,学到蒋门拳法秘宗,于是成了法西斯细菌的酿造专家。

“特训班”的60多人都属“射带中钩”的管仲,当年是“各为其主”。通过宽严相济的训练,已成了识时务的人,人人立誓为“校长”效忠,并无一个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60多人分发工作,大都由戴笠接收去做了特务资本。这批人果然为“校长”做了许多大事。例如:在陈春霖、余洒度、冷欣等人的秘密活动后,西北军宋哲元和庞炳勋叛离冯玉祥。韩复榘、石友三投降,切断中共代表宣侠父在西北军中的活动,并将冯玉祥宠爱的“吉大胆”(吉鸿昌)置于死地。西北军以耍大刀片称雄,却敌不过法西斯细菌的侵蚀。

“政训班”的500人,在康泽的幕后操纵下,比之“特训班”的60人,更发挥了潜力。特字号的小头目徐远举、龚仙舫,游击司令段海州,朱绍良的金龟婿张宣泽等人,都是康泽的得意门生。

由于叠次的训练班获得了成果,蒋介石对康泽的策划颇为嘉许。于是从1932年至1938年间,康泽秉遵上谕操办各种类型大小训练班,公开的、秘密的、不论是短暂的或较长期的、不论地址在南在北、也不论是什么名目和是谁在主持,康泽自始至终都在幕后提线操纵。其中时间最长的“星子特训班”历时13年,一直到1946年并入中训团为止。

“星子特训班”以设在江西庐山脚下的星子县而得名,这个训练班的“特别”之处,不仅是因其内容五花八门,重要的是与其他各地训练班的等级比拟,它是超群的。以往,任何训练班或军、政、党校,一律由蒋介石兼任校长或主任,唯有“星子特训班”下放由康泽兼主任,可见康泽的圣眷隆厚。1933年7月,蒋介石在江西庐山办“将校军官训练团”,康泽在同一时期,在南昌办“暑期训练班”,与庐山的将校级军官相呼应。“军官训练团”发动了第五次“围剿”,“暑期训练班”结业改编为“军委会别动总队”配合“围剿”,队伍由南昌行军到抚州,由康泽亲自率队,居然走了200里路。

“复兴社”成立之后并未有什么建树,只是在作地下培训(康泽操持)和公开宣传(贺衷寒邓文仪等专办),到

抗日战争爆发,“复兴社”于1938年解体。康泽能收拾残局,他兼任了不少官职,如“军委会政治部二厅厅长”,“三青团中央组织处长”“参谋团政训处长”“峨嵋军官训练团政训组副主任”,“四川国民军训委会主任”“四川保安处政训主任”……等等。

康泽既冠盖群雄深受圣宠,于是萌发了建军思想。他与刘伯龙马维骥等心腹密商,经过反复考虑,将“别动总队”改为正规建制的“警卫军”。理由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反共的别动队已不合要求。其实是仿效德国党卫军,为保卫元首而建立的。康泽的如意算盘没有兑现,反而引出各方反对和抨击。陈诚认为康过于跋扈,于是,调动各方力量削弱康泽,矛盾激化,到1939年,康泽的“警卫军”的肥皂泡终于破灭。

康泽想兼并刘湘的地盘,在四川拓展自己的领土。他一面设立自己的特务机构,利用一个留法学生郑家康(李海风)搞电子武器等等,又收买了刘湘的特工人员徐平,利用黑手党罗楚材搞特务活动。不料事与愿违,刘湘地头蛇兵力雄厚,他先下手为强,派遣特务围攻康泽的汽车,捕捉了康泽的司机和警卫,康泽逃逸到妻兄朱兆南家,仅以身免。事后,康泽怀疑是郑家康泄漏了机密,派人枪杀了郑。但康刘之争康泽是彻底失败了。

“三青团”成立之初,康泽与陈立夫、刘健群三人是最早的奠基人。他是组织处长,有实权。康泽在“三青团”里企图独霸天下,他不理解蒋介石并不是挑选他当接班人。蒋经国才是蒋门嫡传的嫡系,蒋家衣钵当然由蒋经国承继。康泽处心积虑用尽计谋,甚至在江西省的三青团支团部他也密布爪牙,意图把蒋经国架空让小蒋徒负虚名,而康泽操纵实权。蒋经国自然懂得康泽意图。小蒋是子承父志,他轻巧地联合陈诚,一个回合就将康泽击倒了。1946年,康泽的组织处长由蒋经国接任,星子特训班并入中训团,由蒋经国主持。康泽丢失了各种官职,被遣送往美国去了。

1947年7月,这个黄埔第三期只学习3个月的人伍训练生康泽居然正式成了一名反共军第十五绥靖区的司令官。但是光杆司令不到一年又于1948年7月在襄樊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

(责任编辑:刘家驹)

○乔天富

一张经历不平凡的 朱德照片



朱德总司令在机枪训练班上给红军学员们讲话

在我国军史资料中,有一张红军时代的珍贵照片《朱德总司令在机枪训练班上讲话》。它并非出自哪位名记者或摄影家之手,其作者是如今已83岁高龄的红军老战士、原四野副参谋长苏静将军。他说这张照片从拍摄到冲出胶卷,洗出照片历时三年余,并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3年春,第四次反“围剿”时,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消灭了国民党军两个师,缴获了一批他们刚从外国进口的轻机关枪等新式武器,这种轻机关枪红军还不会使用。一军团在江西遂川办了一个机枪训练班,请俘虏的国民党士兵来训练红军。苏静当时任红一军团司令部侦察科员(参谋)。他是1932年从福建龙海参加红军的。此前曾出国到缅甸谋生,并且学

会了照相。他参加红军后成为当时红军中唯一会摄影的人。红军从遂川的天主教堂里弄到了一部120照相机,就归他保管使用。那时胶卷比黄金和人命更珍贵,仅有的一个胶卷又不敢轻易拍,得留着有重大事情时用。机枪训练班开学后,军团首长林彪、聂荣臻告诉苏静:朱德总司令要在训练班上讲话。苏静觉得,这可是件大事情,应该拍摄下来。就趁朱总司令在树林里给学员们讲话时,拍下了当时场景。那时用的是6张一卷的120胶卷。为了节约,只给朱总司令拍了一张,以后又照了一张。从此,这个胶卷就再也没有动过。当时的苏区,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和“围剿”,有时连食盐都没有,胶卷自然是一种“奢侈品”,更没有冲洗胶卷的起码条件,只得把照过的胶

卷带在身边。反“围剿”失败,撤出根据地时,苏静带着这个胶卷踏上了漫漫长征路。1935年1月红军攻占了贵州遵义。苏静在遵义城里找到了照相馆,才冲洗出了胶卷。他本来担心胶卷坏了,没想到冲洗出来后底片效果挺好,但在遵义没能洗出照片。苏静又带着底片继续长征,经历千山万水一直带到陕北,此时已是1935年底。可是陕北仍然无法洗照片。直到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苏静才在距西安不远的陕西三原县洗出了这张照片。此时已是1936年底。一张记载当年红军生活和朱总司令形象的历史照片,从拍摄到洗出照片,历时三年多,更经过了几万里长征,又经历了60年的风雨,一直保存到今天,成了一件极其珍贵的革命文物。

○
刘
益
涛

毛岸英 毛岸青

毛岸龙的辛酸童年

在近年的“毛泽东热”中，寻访披露他的子女轶事，也成一“热”。只是其中有道听途说甚至臆测编造处（如一本关于毛岸龙的书）。本文作者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毛泽东研究者，他对于毛泽东三个儿子的童年史迹作了认真查访考证，本刊特予发表，以澄清历史真相。

——编者

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是毛泽东与杨开慧的三个儿子。长子毛岸英出生于1922年10月24日长沙清水塘，次子毛岸青出生于1923年11月13日长沙东乡板仓，幼子毛岸龙出生于1927年4月4日武汉。毛岸龙出生后第8天，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时期毛泽东、杨开慧带着三个孩子住在武昌都府堤41号，同他们住在一起的还有保姆陈玉英。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分共”叛变后，共产党人全部转入地下。8月7日，毛泽东在汉口秘密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会后第5天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从武汉动身到长沙，准备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此时杨开慧和陈玉英已带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先期到了长沙东乡板仓。毛泽东到达长沙的第二天即到板仓看望妻儿，在那里住了三四天后，由杨开慧陪同从板仓返回长沙城里。8月底，毛泽东离开长沙，前往安源部署秋收起义。杨开慧和毛岸英三兄弟是在1927年8月与毛泽东离别的，谁也没有想到，这次离别竟是毛泽东与杨开慧、毛岸龙的永诀。

杨开慧与毛泽东离别后，带着三个孩子留在板仓坚持地下斗争。保姆陈玉英仍同他们住在一起。1930年秋围攻长沙的工农红军撤退后，长沙反动当局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疯狂的反扑。10月中旬的一天，杨开慧不幸被捕，同时被捕入狱的有毛岸英、陈玉英。杨开慧在狱中坚贞不屈。同年11月14日，杨开慧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英勇就义，时年29岁。母亲的牺牲，在刚满8岁的小岸英心里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杨开慧牺牲后第18天，毛岸英和陈玉英在家乡亲友的保释下出狱。他们先在杨开慧的六舅

向明卿家住了3天。向明卿一家待毛岸英等非常好，毛岸英和母亲在狱中时，向明卿的妻子曾多次去探监送东西。3天后，向明卿送毛岸英等回板仓。毛岸英回到家里，见到外婆、弟弟毛岸青、毛岸龙，还有母亲的伯母。不久，保姆陈玉英离开了板仓，回到自己的老家宁乡。毛岸英三兄弟失去了母亲杨开慧，也不知道父亲毛泽东的下落，便在板仓同外婆杨老太太和母亲的伯母一起生活。

杨母带着毛岸英等三个孩子在板仓生活十分困难，毛岸英三兄弟的安全时刻受到威胁。当时在上海地下党中央机关工作的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知道后^①很不放心。他经请示党组织同意，由他亲自写信给板仓，要板仓的亲属把毛岸英三兄弟送到上海来。

1931年1月，毛泽民的信几经周折，终于转到了板仓杨开慧的亲属手里。毛泽民在信中说，要尽快把岸英等三个孩子按照约定的时间和地点送到上海来，并说过了约定的时间，就千万不要送了。

当时杨开慧的兄嫂杨开智和李崇德在南京做事。1930年12月李崇德为了年终结帐，从南京回到板仓。接到毛泽民的信后，经家人商议，就由李崇德护送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及杨母一起到上海。李崇德为筹措盘缠，打听去上海的路线及沿途有关情况，事先去了趟长沙。李崇德在长沙拜访了杨昌济

①毛泽民知道这件事的经过，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1930冬毛泽东的二弟毛泽覃要到当时党中央所在地上海汇报工作，临走时，毛泽东吩咐他到了上海后要设法把3个孩子带到党中央地下机关。因为当时苏联管应接受一批中国革命烈士的遗孤以及党和红军将领的子女。毛泽覃到上海找到了党中央机关，见到了毛泽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

的老友,明德中学的校长胡子靖,向他借了50块大洋作路费。李崇德回到板仓,便同杨母一起为三个孩子准备了简单的行李物品。为了安全,他们改换了孩子们的真实姓名:毛岸英改为杨永福;毛岸青改为杨永寿;毛岸龙改为杨永泰。还商定了孩子们对大人的称呼:不叫杨母外婆,而叫奶奶;不叫李崇德舅妈,而叫妈妈。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李崇德、杨母带着三个孩子于1931年春节前由板仓起程。走时,由板仓农民纠察队员缪佩秋用手推车推着毛岸英三兄弟,一直送到粤汉铁路边的白水火车站。告别缪佩秋后,李崇德一行上了去汉口的火车。到汉口后,李崇德通过杨开慧在武汉从事革命活动用以作过掩护的一家商号的关系,买了船票,使他们搭上了一艘开往上海的轮船。这一年的春节他们是在途中度过的,春节后才到达上海。

李崇德、杨母护送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到了上海后,即按毛泽民信中说说的接头地点、方法和暗号,找到党的地下联络点辣斐德路(现为复兴中路)天生祥酒店。晚上毛泽民、钱希钧到酒店和杨母、李崇德、毛岸英三兄弟见了面,谈了些情况后,毛泽民把杨母等人安排在泰安旅馆(现为延安路33号)住下。毛泽民回去后即向当时在上海负责地下党中央机关工作的彭述之、周恩来汇报毛泽东的3个孩子已到上海的情况,同时决定将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送到我地下党主办的戈登路大同幼稚园抚养。当时毛岸英8岁多,毛岸青7岁多,毛岸龙还不到4岁。

大同幼稚园的创办人是当时在上海地下党中央机关特科工作的董健吾。他的公开身份是上海圣彼得教堂主持牧师。1929年底上海地下党组织为了解决失散流落在上海的革命子弟的抚养问题,责成互济会在近期开办一个幼稚园。中国互济会负责人之一王弼将具体筹办的任务交给了董健吾。经过两三个月的筹备,幼稚园于1930年3月开办起来了,并取名为大同幼稚园。为安全保密起见,与党有关系的孩子一般不由家属直接送到幼稚园,而是由家属把孩子交给王弼,由他把孩子送进幼稚园。先后被送进大同幼稚园收养的孩子,有彭湃、恽代英、李立三等的子女。幼稚园的保育人员,也多为地下党干部的家属,如李立三、李求实还有董健吾本人的妻子。大同幼稚园开办时设在戈登路和武定路拐角处(现为江宁路441号),但那里环境不太好,房屋朝东,上午东晒,下午西晒,加以附近没有公共花园可供孩子们游玩。所以过了一年的时间,在1931年3、4月间,大同幼稚园迁往南昌路324号一幢三开间的房子里,(现为雁荡路小学校址)。这所住房朝南敞亮,而且位于法国公园(现为复兴公园)后面,孩子们随时可以到那里去游玩。

1931年3月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被送进大同

幼稚园。当时王弼已离开上海赴江西,由谭筱影接替王弼的职务。当时负责管理幼稚园的还是董健吾,保育员主任是原在虹口福民医院当过护士的陈凤仙(又名秦怡君,李求实的妻子)。毛岸英三兄弟入园后不久,同年4月的一天,幼稚园的5位保育员带着19个孩子到法国公园游玩,请园内的照相馆拍一张照片。在这张合影照片上,站在第2排左1位置上的是毛岸英,站在第2排右1、右2位置上的是毛岸青、毛岸龙。当时毛岸英还不到9岁,毛岸青7岁多,毛岸龙刚好4岁。这是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毛岸龙唯一的一张照片。由于陈凤仙当时因事请假没在园中,所以照片上的5位保育员中没有她。

同年5月,董健吾奉周恩来之命去汉口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便辞去大同幼稚园的兼职。这样在董健吾离开上海期间由谭筱影直接负责大同幼稚园的工作。

同年端午节(6月20日)前后,毛泽民、钱希钧要离开上海到苏区去,走之前同岸英等孩子的外婆到法国公园附近看望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因为当时规定一般不让孩子的家属直接到幼稚园去看望孩子,所以只能趁孩子们出来游园的机会同孩子们见面。外婆问了孩子们在幼稚园里生活的情况,毛岸英说,他们每天在园中念书,晚上兄弟3人睡在一起。毛岸英还讲了妈妈杨开慧怎么牺牲的情景,表示以后长大了要给妈妈报仇。孩子们还问叔叔毛泽民,爸爸毛泽东是否也在上海。

毛泽民等与毛岸英三兄弟在法国公园附近见面不久,上海的天气已经炎热起来,约在同年6月底7月初的一天^②夜里,毛岸龙突然生病,发烧腹泻。此时,陈凤仙已销假返园工作,即由陈凤仙把毛岸龙送到附近广慈医院急诊。医生诊断为紧口痢,经抢救医治无效当夜病亡。第二天,由幼稚园负责行政事务工作的姚亚夫买了口棺材,将毛岸龙收殓。毛岸龙时年4岁多。

毛岸龙夭折后,陈凤仙即向谭筱影报告,同时也通知了欧阳新。不久董健吾也由汉口返回上海,欧阳新把毛岸龙病亡的不幸消息转告了董健吾。

1931年4月下旬,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顾顺章长期负责党的保卫工作,对上海地下党中央机关和许多领导人的住址十分熟悉,他的叛变对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安全无疑有极大的危害。董健吾在汉口时,还不清楚顾顺章已经叛变。顾顺章给董健吾买

* (2)关于毛岸龙病亡的时间,还有两种说法:一是4、5月间,二是5月底与6月初。1982年第4期《党史研究》李静峰文持5月底6月初的说法。因为有的当事人回忆当时“上海的天气已经炎热起来,”钱希钧回忆在端午节前后(1931年的端午节是阳历6月20日)曾看望过毛岸英3兄弟,所以笔者认为不可能发生在6月20日以前,故断为在6月底7月初。

了“建国”号轮船票返回上海，因为董健吾临时改乘“洛阳”号轮船返回上海才幸免被捕。董健吾返回上海后才知道顾顺章真的叛变了，按照地下党的指示，暂住在还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杨度家里。所以在董健吾返回上海后，大同幼稚园的工作实际上仍由谭筱影直接负责。

就在这时期，有一天大同幼稚园的保育员桂荷英（又名管荷英）外出后突然失踪，下落不明。谭筱影和欧阳新怀疑有变，为了幼稚园全体革命后代和家属的安全，经过反复考虑于1932年春决定将大同幼稚园解散。园中的孩子全部遣散回家，有的家属来领，有的派人送回家里，有的不能送的临时寄养在可靠的或与党有关系的同志家里。当时欧阳新嘱咐在幼稚园当保育员的董健吾的妻子郑兰芳将毛岸英、毛岸青带回家中寄养。

董健吾在杨度家住了几个月，后因杨度逝世，杨度全家搬到苏州去，不能在杨度家住下去了，只好搬回到当时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霞飞路松柏斋古玩店（现为淮海中路139号洁民饭店）楼上居住。当时在一起生活的除董健吾、郑兰芳外还有郑兰芳的母亲。董健吾的岳母不太愿意照料毛岸英、毛岸青，对看管小孩子的事常有怨言，加上古玩店离嵩山路法国捕房很近，恐被敌探侦知，安全出问题，约半年左右后，欧阳新提出让董健吾将岸英两兄弟送到凤阳路修德里12号楼董健吾的前妻黄慧光处生活，因为那里孩子多，好隐蔽，比较安全。

1932年8月^③，毛岸英、毛岸青被送到修德里12号，开始同董健吾的前妻黄慧光及其子女董载元、董寿琪、董惠芬、董惠芳生活在一起。董健吾的小儿子董寿琪的年龄与毛岸英、毛岸青差不多，所以他们3个小孩经常相处在一起。董健吾送毛岸英、毛岸青到黄慧光处时，只说这是他朋友的两个孩子，一个叫杨永福，一个叫杨永寿，暂时住下以后另有安排。不久董健吾就告诉黄慧光及其子女们，说他们是毛泽东的孩子。黄慧光一家知道毛岸英、毛岸青是毛泽东的孩子后，对岸英、岸青和自己一家的安全非常担心，而岸英、岸青正处在孩童贪玩的时期，又有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怕他们出去和外人接触，引起怀疑和走漏风声，因此黄慧光不仅没有让毛岸英、毛岸青出去上学，而且在以后3年多的时间里，又先后变换过几个住处。

毛岸英、毛岸青随黄慧光一家在修德里住了约一年左右的时间，为安全起见，又搬到成都路三多里1号楼上（原胡希安的家，现为成都北路532弄3号）。在成都路三多里时，当时地下党干部蒲化人（董健吾入党介绍人，也曾一度当过牧师）经常到黄慧光家看

望毛岸英、毛岸青，有时也教他们读书识字。在三多里住了不到一年，毛岸英、毛岸青又随黄慧光一家搬到牯岭路斯盛里（现为牯岭路51弄10号）。这里紧靠马路，岸英、岸青经常出去玩，尤其是岸青喜欢听故事，常到西藏路一带去听说唱，有时忘了吃饭，毛岸英、董寿琪就去找。在斯盛里住的时间比较长，大约有两年左右。毛岸英、毛岸青出国就从这里走的。

毛岸英、毛岸青在董健吾家的生活费用，基本上是由地下党组织提供的。到黄慧光家初期，仍由地下党组织按月提供生活费，董健吾给黄慧光每月20元的生活费，有时还给些补贴。1933年初，上海地下党中央机关转移到江西瑞金，留下的地下党组织又屡遭敌人的破坏，因此有一段时间中断了对毛岸英、毛岸青的生活费供给。董健吾早已辞去牧师职务，已无固定的经济来源，而且又转入地下，对黄慧光家的生活起初还管，后来也无能为力了，甚至去看望毛岸英、毛岸青的时间也少了。当时黄慧光仅是一家庭妇女，她身边已有4个孩子，加上毛岸英、毛岸青两人一共7口人，仅靠她长子董载元的一点微薄工资维持生活，生活困难的处境可想而知了。黄慧光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只好同子女给人家洗衣服、扎纸花，挣点钱弥补生活。在生活窘迫的情况下，黄慧光也分派毛岸英、毛岸青干活，如帮助扎纸花、干些家务活等，对毛岸英、毛岸青难免也有不善待之处。所以在黄慧光家后期一段时间内，毛岸英、毛岸青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他们吃得不好，穿的是破衣服，盖的是破棉絮。有一次，毛岸青还挨了黄慧光一顿打。尽管生活比较困苦，毛岸英、毛岸青在白色恐怖下总算度过来了。他们在董健吾家生活了4年多，一直到出国，中间没有离开过。

为了摆脱危险和困境，董健吾早有心送毛岸英、毛岸青到陕北毛泽东处，或转送出国，只是没有机会。1936年初，董健吾受上海党和宋庆龄之命，以宋庆龄信使的身份到陕北送一封密信。董健吾到西安后见到张学良，借乘张学良的私人座机飞到延安，再转保安。在保安董健吾见到秦邦宪、林伯渠、张云逸等人。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等正率部东征。几天后，董健吾带回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石楼军次写的复信。回到延安董健吾把复信交给张学良，很快他就安全返回上海复命了。董健吾这次陕北之行，不仅为后来周恩来在延安与张学良会谈起到一点穿针引线的作用，而且使中共中央与上海党接上了联系。中共中央即派出冯雪峰到上海。冯雪峰到上海后，先就住在董健吾家里。当时在上海地下党工作的王学文向冯雪峰反映了毛岸英、毛岸青在黄慧光家生活的情况，冯雪峰当即表示要设法把毛岸英、毛岸青送到苏联去。

同年4月，宋庆龄又请董健吾到西安护送美国记

* ③还有一种说法是1932年冬。

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到陕北苏区,这就使得董健吾在1936年上半年第2次赴西安。在西安董健吾以王牧师的身份帮助斯诺和马海德与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保安工作的邓发接上了关系,并由邓发安排斯诺和马海德进入苏区。董健吾在西安时常被张学良邀至家中吃饭、叙谈。有一次,董健吾得知张学良的夫人赵四小姐不慎失手打坏了几件心爱的古玩,心痛得连饭都吃不下。他就通过在西安城里一个过去与上海松柏斋古玩店有交往的朋友,搞到一套24件名贵的明代镀釉彩瓷送给赵四小姐。张学良、赵四小姐见到这套古玩后,咄咄称奇,爱不释手,非以重金买下不可。董健吾对重金坚辞不收。张学良无奈,就问董健吾有什么私人要求帮助解决以当酬谢,董健吾实在拗不过张学良的诚意,便随口说出能否把他家的3个孩子送到苏联去读书,张学良一听,当即表示这件事就包在他身上了。董健吾当时并没有把它当回事,以为随便说说而已,他在西安办完事后就返回上海了。

同年6月,董健吾在上海突然接到张学良的电话,说他这次到上海来除有公事要办外,还要了却一件私事,履行他在西安许下的诺言,并约董健吾第二天上午在沪西郊外哥伦比亚路的一家法国酒店见面。董健吾接到这个电话,既感到意外又感到重要,送毛泽东的两个孩子出国这件事非同小可,不敢擅自决定,于是立即向上海党组织作了汇报,并请示如何处理。第二天,董健吾同刘仲华(当时是董健吾与地下党单线联系人,建国后曾任北京市园林局局长,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前往见张学良。一见面张学良就说,这次是秘密来沪,所以不便约他们在公寓见面。现有他的部下李杜将军(原吉林抗日自卫军司令,共产党员)要途经法国去苏联,乘此机会让他们带3个孩子出国赴苏。并说送3个孩子出国的一切费用他都准备好,要董健吾马上与李杜联系,把孩子们尽快送出去。张学良说完后就匆忙与董健吾、刘仲华离开酒店,登上他的汽车,并由他亲自驾驶,送董健吾二人到复兴公园下车而别。

上海地下党经研究,同意采用这个办法把毛岸英、毛岸青送去苏联。冯雪峰即通知当时在上海赤色工会工作的杨承芳准备出国,一切手续由他办。临出发时冯雪峰才告诉杨承芳,此行的任务是利用李杜将军出国的机会,护送毛泽东的两个孩子取道法国去苏联。董健吾回来后,马上与李杜取得联系,随即和他女儿董惠芳一起将毛岸英、毛岸青、董寿琪送到宝庆路(现为淮海西路宝庆路)9弄3号李杜将军

家里。宋庆龄也知道了这件事。苏联驻华使馆已报苏联外交部,外交部已表示同意。李杜将军这次出国一行共9人。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毛岸英等随李杜一行于1936年6月底,乘法国邮船斯芬克司号从上海出发。他们在海上航行了约一个月,途经香港、西贡、孟买、苏伊士、地中海,于7月底8月初到达法国马赛港。然后改乘火车到达巴黎。到巴黎后,杨承芳等去苏联驻法国领事馆办理签证,苏联官员说,他们早已接到通知,但要等几天才能拿到签证。没想到苏联政府此时对外国侨民到国内来控制得很严,李杜将军等在巴黎等了好几个月还没有消息。他只好找到《救国时报》(当时中共在巴黎出版的一家报纸)编辑部帮助,请他们设法通知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说毛泽东的孩子已到巴黎,请苏联政府早发入境签证。在这几个月中,毛岸英、毛岸青在巴黎一面耐心地等待签证,一面抓紧机会学习外文。后来苏联驻法国领事馆果然发来通知:同意毛岸英、毛岸青入境苏联,并发予签证,但不准董寿琪入境。李杜一行因此时已知国内爆发西安事变,也无心再在国外逗留,所以他们也没有入境苏联。毛岸英、毛岸青被送到苏联领事馆,在那里他们见到前来巴黎亲自接他们去苏联的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康生。康生告诉杨承芳,毛泽东的两个孩子由他负责送到莫斯科,董健吾的孩子让他带回上海。

1936年底1937年初,毛岸英、毛岸青被康生从巴黎接送到苏联莫斯科,随即送进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毛岸英时年14岁多,毛岸青时年13岁多。

(责任编辑 卢弘)

更正

1994年第三期59页国务院副秘书长雍文涛应为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雍文涛。60页孔冉应为孔丹。



崔兰田(右二)与陈素真(左二)、常香玉(左一)、马金凤(右一)在一起交谈

豫剧名旦 崔兰田与陈素真

毕定良 杨奇



陈素真剧照

在豫剧五大名旦中,年纪最大者为陈素真,年纪最轻者是崔兰田。许多读者都知道这两位年愈古稀的老人是同辈豫剧名家,可是,她俩在半个多世纪的艺术生涯中却有着许多相濡以沫、肝胆相照的故事。

1937年,崔兰田在郑州入科学艺时,陈素真已在开封唱红,被誉为“豫剧梅兰芳”。四十年代初她俩曾以师徒相称。

当时,崔兰田是豫西调名艺人周海水门下“十八兰”中的佼佼者。小科班在农村“跑高台”时,她在豫西一带便小有名气。1942年出科后被豫声剧社聘为“台柱”,在洛阳世界舞台“挂头牌”。当时她虽然只有十六岁,但在这座文化古城已是家喻户晓拥有许多观众的红角儿了。那时候,能在洛阳唱响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洛阳一带是豫剧中的豫西调和河南曲剧中的洛阳曲这两大戏曲流派的发展地。崔兰田在洛阳搭班唱戏之前,已有许多著名演员在这里活动。如常香玉、汤兰香、陈素真等。但是,

崔兰田在洛阳舞台上一出现,很快有许多观众迷上了她的戏。作家李

准在一次与崔兰田闲谈中曾对她说：“我在洛阳上中学时看过你的戏，记得那时你又年轻又漂亮唱得又好听，许多人都很迷你的戏。”

的确，在河南的城乡集镇有着许多喜欢崔兰田的“戏迷”。

河南临汝县城关镇一位叫薛心诚的老农民，青年时就喜欢崔兰田的戏，四十年代在洛阳一家杂货行当学徒时在街上买了崔兰田的两个唱本，一本是《二度梅》、一本是《王文玉投亲》。四十多年后，他把这两个唱本送到崔兰田的剧团时，尽管纸质发黄，边角残缺不齐，封面上“河南梆子”“崔兰田”和“洛阳宝华印刷所印”的字样却清楚可见。为了保存这些唱本“文革”中他也是吃尽了苦头。

据崔兰田回忆，当年在洛阳象薛心诚这样的戏迷大有人在。不少大婶大嫂经常去看戏，跟她混熟了，常拉她到家里去吃杂面条、粉浆饭。还有要求与她结拜成干姊妹的。

正当崔兰田在洛阳走红之际，陈素真应河南同乡会的邀请来洛阳为灾民唱义务戏。大名鼎鼎的陈素真在洛阳露演，对初露头角的崔兰田来说，不能说不是个威胁。但是一向谦逊好学的崔兰田对陈的到来不但不反感，反而打心眼儿里高兴。她对陈素真仰慕已久，一直苦于无缘目睹自己崇拜的这位大演员的舞台风采。现在陈素真来到了自己身边，同自己在一个戏班一个舞台上演戏，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看戏学戏的好机会。

崔兰田这个人从小就是个爱看戏的小戏迷。早年在郑州逃荒要饭时，饿着肚子也挡不住她往戏院里跑。没钱买戏票，便弯着腰在戏院门口给人家扫地，以博得守门人的欢心，进去看个“戏尾巴”。搭班唱戏后，天天在台上唱，不但改不掉爱看戏的嗜好，而且兴趣更浓，经常在散戏后，不吃飯先跑到其它戏院去看个“戏尾巴”。陈素真演的“樊戏”本子好，内容新。陈素真的表演细腻，身段优美，使她大开眼界，大长见识。三、四十年代的豫剧，以唱为主，很多优秀的演员都是以唱闻名，身段表演大都比较粗糙，相比之下，陈素真的表演便显得高人一筹、出类拔萃，加上她的唱腔新颖优美，很有大家风范。崔兰田打心眼儿里佩服陈素真，承认人家比自己的水平高。于是她通过朋友“牵线”请陈素真收她为徒。说来也巧，这两位豫剧名旦可以说是天生有缘，崔兰田崇拜陈素真，陈素真也很赏识崔兰田。在陈素真眼里，崔兰田是一位不多见的好演员，难得的人材，尽管那时崔兰田做戏还显得稚嫩，但她那漂亮甜润的嗓音，含蓄大方的表演和俊美出众的扮相，都使陈素真特别欣赏，陈素真称崔兰田为“后起之秀”，她非常

喜欢这位台上唱得好听，台下朴素文静的姑娘。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在那同行是冤家的年代，已挂“头牌”的崔兰田竟会如此虚心地向比自己仅大七、八岁的同行提出拜师学艺的请求。她觉得崔兰田好歹已是红角儿，自己就这么点本事，怎么好意思收她为徒呢？但是她又不忍心拒绝崔兰田这一要求。因为她相信崔兰田的想法是虔诚的。她把崔兰田视为知音姐妹，甘愿将自己的技艺向这位谦逊好学的小妹倾囊相授。在洛阳世界舞台，每当旭日东升或月上树梢的时候，都能看见她俩“趟马”“走边”的身姿。

《三上轿》原本是豫剧中一出老掉牙的戏，常常在演出结束的时候演这出戏，所以叫“送客戏”。陈素真学会这出戏后，经过几年的揣摩，在唱腔、表演和情节上都有了很大的改变和提高，使这出戏旧貌换新颜，很快被广大观众所接受，成了“留客戏”。也是陈素真当时演的很红的一出戏。陈素真看见兰田是那样的勤奋好学，就亲手抄写了自己演出的《三上轿》私房唱本送给兰田。她知道一位演员要想提高自己，除了加强自身的艺术素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自己的新剧目。她把《三上轿》的手抄本送给兰田时，崔兰田捧着那一摞子写满密密麻麻字迹的纸本激动万分。虽然，当时她还识字不多，还有很多的“拦路虎”，可是她已经从字里行间体会到了陈大姐的心意。经过几年的磨练，崔兰田果然没有辜负陈大姐的期望，她通过自己的手、眼、身、法、步和那独具特色的豫西调唱腔，把《三上轿》重新书写在自己的艺术舞台上。她与陈素真的《三上轿》就象一对孪生姐妹，虽然血脉相通，但又各具特色。很快这出戏连她常演的《秦香莲》、《桃花庵》和《卖苗郎》成了观众喜闻乐见的崔派四大悲剧。

崔兰田自从陈素真手里接过《三上轿》的剧本后，就象接到了一根接力棒，一时一刻都不敢放慢脚步。她自己不仅对这出戏的加工、提高倾尽了几十年的心血，把这出戏由陈派的“留客戏”唱成了崔派的代表剧，她还竭尽全力把自己的艺术悉心传给了自己的徒弟。

常言说“海内存知己，患难见真情”，崔兰田与陈素真的真情从一件戏箱上也可窥一斑。

四十年代中期，兰田在西安的豫剧舞台上已经是继陈素真、常香玉之后的大红大紫的名角了，可是，她连一件上好的“行头”都没有。因为当时正在抗战，局势、交通都比较混乱。她想方设法地派人去买却都是空手而归。正在这时候，因生孩子已离开舞台的陈素真听说兰田缺少一堂象样的“箱”，她马上想起了自己那件心爱的黑色女披，那色彩、图案的搭配，针线、做工的精细在当时也是一般人难以问津

的“高档货”。她觉得好马需配好鞍,宝刀应佩好汉,好角儿就应该有一堂好“行头”。象崔兰田这样的大演员就应该更讲究“行头”的质量。当兰田为了“衣箱”无处可买而愁眉不展时,陈素真将自己珍藏的这件上好的“官中箱”送到了兰田家里。她对兰田说:“我现在用不着,你正是用的时候,给你用吧。除非是你,换个人我还真舍不得给她。”

兰田有了这些漂亮的戏箱,象大鹏展开了金色的翅膀翱翔在八百里秦川和中原的大地上。

建国后,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戏曲艺术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面貌。这时候在崔兰田自组的兰光剧社已经成为国营河南安阳市人民豫剧团。在豫剧界她与常香玉、陈素真、马金凤、闫立品被同称谓“五大名旦”,她所领导的剧团被人们称为:崔派艺术剧团。

1956年,河南省首届戏曲观摩汇演在郑州隆重举行。此时已有“豫剧皇后”之称的陈素真在河北邯郸豫剧团,她应邀赴会献演《宇宙锋》,艺压群芳,获得了最高荣誉奖。崔兰田于十几年后重睹陈素真的高超演艺,对自己崇拜的这位良师益友更加钦佩。陈素真的水袖功夫可以说是炉火纯青,兰田深感自己的表演功夫不及陈大姐精深,如有机会她真想再度向陈大姐讨教。但是,当时她身为剧团团长、领衔主演,一年四季在外奔波。从1957年至1962年,她率团四次晋京演出,同时还执行中央规划到上海、南京、天津、武汉、广州等20多个省、市巡回演出。领导工作和演出任务十分繁重。因此,离团投师深造这一美好愿望就无法实现了。她只有把更大的理想寄托在自己的徒弟身上。她要求学生不但要全面继承自己的表演艺术,而且要求学生要博采众长、融汇贯通自成一家,在艺术上要超过老师。

1962年,她带着剧团到邯郸演出。这时,陈素真正在邯郸东风戏校任教。她找到陈大姐求她给自己的大徒弟张宝英说说《宇宙锋》。她知道宝英对崔派艺术的唱、念、做、打已经有了比较扎实的功底,要把她培养成大演员,还需要请更多的“名师”点化。纳百川,才能成大海。所以乘剧团在邯郸演出时,崔兰田把张宝英亲自送到了陈素真的门下。可是,陈素真当时已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身处逆境,对兰田的这一要求既感动又为难。

“我是个右派,在这里没有人找我学东西,你現在是党员,宝英是团员,你们找我学戏,不怕受连累吗?”

听了陈素真这几句话,崔兰田气忿地说:“我不管什么右派不右派的,咱们俩姐妹十几年关系这么好,我清楚你的份量,我只求你把你的艺术传授给宝

英,至于别人说什么我一概不在乎!”

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大家都过着“瓜菜代”的清苦日子。崔兰田明白陈素真在这种环境里生活更是艰苦,就自己掏腰包买了两条高价鲜鱼让宝英给陈素真送去。陈素真看到宝英送来的两条鲜鱼,她那消瘦的脸庞上淌下了两行热泪。她什么话也没有说拉起宝英就来到了她那间潮湿、阴暗的小屋里,把《宇宙锋》里赵艳蓉的一招一式都传给了宝英。

在陈素真的细心教授下,张宝英对陈派的唱腔特色、表演技巧有了较多的掌握,尤其是她塑造的赵艳蓉走的是陈派的路子但无意中又带有鲜明的崔派特点,令陈素真十分满意。

宝英学会《宇宙锋》后,回到团里崔兰田就请团里的主要演员渠永杰(饰赵高)、王香芳(饰秦二世)为她配戏。自己还亲自指挥排练。首场演出后,崔兰田喜出望外地夸宝英是“化学脑子”。逢人就说:“这闺女脑子真灵,不仅水袖舞得好,唱的还满象陈素真。”

剧团回到安阳向领导和观众汇报演出这出戏时,崔兰田特意让剧院在海报上写上“陈素真亲授”五个大字。陈素真自1957年被划为右派后,在她演出时海报上从来不许写她的名字,因此,这五个字的份量就显得非同一般。由此,也可以看出兰田对陈大姐的艺术是多么的敬重,对陈大姐的遭遇也寄予了多么深切的同情。

十年浩劫后,在北京举行的田汉追悼会上,陈素真、崔兰田两位均已容颜改、两鬓白的老姐妹劫后重逢了。她俩一见面,陈素真先打听:“宝英现在还演戏吗?她对你怎样?”当她得知宝英没有脱离舞台,现已是团里的顶梁柱,和兰田的师徒关系一直如母女一般时,那高兴的劲头儿活象又见到了她俩共同哺育的儿女。

1987年6月8日,北京广和剧场。

作为豫剧崔派艺术的优秀传人,张宝英在此举行个人折子戏专场演出,她在展演了崔派名剧《秦香莲·抱琵琶》、《桃花庵·盘姑》和自己独创的剧目《秦香莲后传·哭庙》后,特意展示了陈派名剧《宇宙锋·装疯》的表演艺术,受到了首都戏剧界专家的交口称赞。这位当今豫剧表演艺术家的成功,得益于崔、陈二位豫剧大师的栽培,在豫剧史上堪称一段佳话。

陈素真与崔兰田真挚的友谊也将会作为一笔精神财富留传给后人。



梁帼馨小姐近影

梁帼馨小姐

香港实业界「奇女子」

无论在哪里，只要梁帼馨小姐一出现，便马上会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这或许是由于她在香港持续三十年不衰的知名度，或许是由于她在中东、欧美、东南亚大刀阔斧的经营作风，或许是由于她过人的胆识、谈吐，包括保养得近乎完美的容貌，总之，她或许不因赚钱最多而出名，却在香港这个盛产商业奇才的地方，以丝毫不亚于富可敌国的须眉男子的魅力，成为群星捧月的佼佼者。

梁小姐出生于典型的资产阶级家庭。“连烟灰缸都是古董”的家境，钟鸣鼎食的生活，自幼形成了她不甘人后的性格。在学校，梁帼馨的成绩永远第一，成了不争的事实。一次，一位想煞她威风的老师将主观评判标准的书法成绩定为梁国馨“第二”，撼动了她“第一”的宝座。一怒之下，梁帼馨索性离开

这所学校，以示决不屈服“第二”。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在梁小姐人生足迹所到之处，不知有多少“第一”的纪录，以至于任何步人后尘之事，她不屑于作。

中美建交前夕，第一架涂着五星红旗的商业飞机降落在华盛顿。这是年轻的梁小姐为两国复归于好的“贺礼”；她以2700万美元的巨资，买下装了整整27列火车和一架飞机的中国工艺美术精品，携之飘洋过海，来到美国，举办规模空前的工艺品展销活动。即使在今天，如此规模的民间文化交流活动亦属罕见，更不用说在中美隔绝30年的情况下，以一女子之力，备尝辛劳，可想而知。

紧接着，是她将另一国宝——中国菜引向海外。上海锦江饭店的全套技术设备，第一次以国菜

身份在世界几大城市亮相,在洋人啧啧称羡中,为正宗中国烹饪正了名。这次,梁帼馨在右翼华人势力中,成了众矢之的。又是她第一次在美国举办左派、右派记者都参加的记者招待会,超越政治歧见,晓以民族大义,使“烤鸭”成了联结左右政治势力的纽带。

第一,第一,在梁小姐的生命里充满了“第一流”、“第一次”、“第一个”的字样。80年代初,她第一个组织中国稚嫩的电视工业代表团出国考察,遍访日本、英国、美国、挪威、法国,导致中国引进第一条彩电组装生产线;她又第一个组织国内13家大型轴承厂赴北美考察,第一次将国产轴承销到北美;她第一个以“外来人”的身份邀请全国民航管理局、各大机场、航空公司处级以上干部聚集一堂,召开建国以来由外商主办的“第一次空中交通研讨会”,并在此基础上,为国内17个大中城市机场引进了世界上最先进的通讯、雷达、导航系统,以降价的形式,把其中1600万美元的设备,赠送给中国民航,并于亚运会前夕,为北京机场安装上导航设备。

梁小姐处处争第一,并不是刻意如此,而似乎是命运的安排或召唤。她与大陆做生意,始于改革开放后,百业待兴、万籁未鸣之际。延宕20年、与世界差距越来越大的中国经济,可为之事不胜枚举。她为国际贸易牵线搭桥,是响应邓小平“工贸结合”号召,既引进国内急需设备,又引导国内企业竞争国际舞台;她涉足航空领域,是在能源、交通、通讯诸多薄弱环节中,从最需加强的空中管制入手。因为弹丸之地的香港,尚有一个每隔45秒钟起落一架飞机的启德机场,而诺大的中国,竟无一套可与启德机场相匹敌的设备。“我不能想象一个经济起飞的国家,没有一对灵活高翔的翅膀”,而实际上,中国经济的翅膀上,羽翼未丰之处太多了。所以,她为贫穷三山老区的失学儿童捐钱捐物,组织生产国产动画片,第一个在中国文艺领域进行合资,直至前不久组织“与欧洲同步”的TINATI时装表演,哪一项都是筚路蓝缕、剑及履及。而一旦众人争做此事,“千树万树梨花开”,她便笑入花丛,转做他项,决不专美于前。

照理说,出身富有家庭,其下数家公司的梁帼馨小姐应秉承“唯利是图”的商业基因才对。至少,她的祖父死于中国革命的急风暴雨中,她的家族均不与共产党来往,她对大陆应心存“偏见”才是。恰恰相反,典型的资产阶级的宠儿成了二十多年前即公开支持共产党的惊世骇俗的人物;在1997年临近,以前坚决反共的人士争相“爱国”之际,又是她不断呼

吁抵制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消极腐败现象。

梁小姐特立独行的原因,一是自幼接受父亲的深厚的民族传统教育,二是在大陆白热化的革命时期,亲自在熔炉中找寻过人生的意义。

如果一个人在潜意识中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教养;如果一个人有深厚的人文历史知识,能够从历史的兴衰隆替中搜索时代的脚印;如果一个人又谙熟西方的历史和传统,受到其王室、银行家、董事长阶层的尊重和礼遇,能够以古典语言、十四行诗与上流社会对话,能够住纽约最豪华旅馆的总统套房,从60年代800美元一天住到目前通货膨胀的8000美元一天,在当地被称为神奇的“龙女”,她便不会像患感冒似地“对中华民族和我自己失去九成以上的希望和信仰,”而会以中国人为自豪,因为她便是中国人优于西方人的最好例证。一位美国议员曾对中国驻美大使柴泽民说:“你们中国有梁小姐这样的人,中国怎能不富强呢?”

60年代初,正值青春年华的梁小姐来到大陆,目睹了这里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她身边熟悉的奢侈而空虚的富人的生活道路从此轰毁。两相比较,那种“殚头扶不起,三丈日还高”,整日买衣、打牌、化妆的阔太太,那种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拔一毛有利天下而不为”的精明的商人变得一钱不值。一度,她曾经剪短发、穿解放装,想放弃财产,回国定居,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港台知名人士邵逸夫曾不解:“你怎么那么喜欢共产党?”美国总统肯尼迪的母亲嘲笑她是“理想主义的小疯子”;直至母亲骂她:“穿得破破烂烂就是爱国?你这样谈生意,是有辱国体!”她才热度下降,恢复打扮。不过,最崇尚的还是“忘我、助人、奋斗”——她所找到的共产党的最本质的东西。梁小姐认为,很多“志壮坚信马列”的人不如她对共产主义精神的理解。为了搞懂这门天下至简至难的学问,她曾苦读过四年革命书。

辛弃疾有言:“千年往事已沉沉,闲管兴亡做甚?”与梁小姐的教养不在一个档次甚至一个方位的人难免对她心存疑虑,凡事往歪处想。即使她为国投资,捐赠上百万、上千万,也会有人认为“别有用心”。对此,梁小姐早有领教。对那些不争气的干部和只识小利的合作者,她以一种母亲的胸怀宽容之:“不能因为自己的儿子打劫、吸毒或坐牢,就跟他断绝关系,不爱他甚至不看他们!”“剑气争寒风雪透,直指红云出岫;”“闲管兴亡君知否,此意谁人能得会”,是她不甘雌伏、颇具雄风的词句。熟悉她的一位国

家高级干部感慨地说：“梁小姐，你是真正的爱国……”

梁小姐维系着一个庞大的生意系统。

做为四家跨国公司的董事长、总裁，她设在香港、北京、瑞士、意大利四个办事处的一天费用，即达数万港币。“没有两万元，我是过不了一天的。”她投入的不光是金钱，还有大量的精力。谋划、指导、培养干部、签署合同、撰写文件，使她没有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往往刚想一点自己的事，电话铃又响了……”

近乎战斗的紧张生活，与她的开拓精神、奋斗意志和过人才华相匹配，合成一曲难度极太的生命乐章，主旋律是奋进与燃烧。

拿她最近的一个大手笔，引进“与欧洲同步”的TINATI时装系列来说：

自从张赛通西域、黄道婆纺纱开始，中国在“穿衣”上，就一直走在世界前列。不知怎的，不过百年功夫，在“时装”二字上，让西方占了先着。直至今日，中国的服装工业强大到可使世界上人人有衣穿的程度，可“穿什么”却步人后尘，惭愧到喝人家“肉汤的汤的汤”的程度。

梁小姐本无意搞时装，她认为中国人才济济，时装业翻身有日。但每到欧洲，“MADE IN CHINA”的服装总给她刺激。久而久之，便决计在服装史上改写几页内容。

首先以雄厚的实力买断欧洲一些最有名的设计师的设计，专为中国市场组成以自己英文名字

“TINA”命名的“TINATI”时装系列，每年在国内发布3—4次新款，让国人在最短时间内接触到世界上最流行的新款时装；第二步，在国内成立几个面料、设计、生产“一条龙”的实验室或研究所，拿出能在世界立足的一流产品；最后，将优秀的中国设计师推向欧洲与世界，诞生属于自己民族的世界级大师。

这是一个瑰丽的梦想，是一个经反复测算后能够实现的宏伟工程。于是，去年九月，梁小姐直接指挥、甚至请柬设计都亲自过问的首届“TINATI”时装表演拉开帷幕。欧洲名师的设计，第一次在经月之间来到中国，其中，最先出场的七套红色针织羊毛系列时装，是梁小姐亲自设计的。在与欧洲设计师合作期间，对方对梁小姐娴熟的设计能力、搭配面料和色彩的本领、对东方女性穿着特点的理解和把握赞不绝口，以为她至少学过服装设计专业，岂知这又是一次无师自通。

去年圣诞节前，梁小姐又一次赶赴欧洲，在巴黎和米兰之间穿梭往返。黎明即起，工作到深夜，在巨大的服装和面料仓库里穿梭挑选，与设计师研究流行趋势中得体大方的主流趋势，然后，以上千万元的投入为中国市场订购成衣，为的是将人们的审美情趣和穿着水平提高一步——而这，需要有何等的眼光、魄力和实力，做为炎黄子孙，哪个有这种“闲管兴亡”的雅兴？！

从第一架载满中国工艺品的飞机在华盛顿降落，到第一批欧洲最新款式时装进入中国，她开始了又一次拼搏的旅程。（作者 齐夫）



“TINATI”

时
装
表
演

清末四大奇案之一

——查赈大员李毓昌遇难记

○肖 冰

李毓昌(1772--1809),山东省即墨县即墨城阁里人。少年勤奋好学,聪明过人,品行端正,孝敬长辈,曾以品学兼优闻名乡里。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考中恩科举人,嘉庆十三年考中戊辰科进士,榜下以知县用,分发江宁候补。适逢淮扬水灾,被派往江苏山阳县(今淮安市)查赈,因切中时弊,被贪官设计谋害。此案在当时震惊朝野,直闹到嘉庆皇帝亲自出面才得以了结。案情之奇特,牵扯官员之众多,破案期之长久,均为罕见。

因此,此案被人列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

清嘉庆十三年暮秋。

自夏天黄河决口后,黄水横溢,淮扬各洲县,多沦为水乡泽国。

逃荒的饥民,成群结队,扶老携幼,朝着南归大雁的方向,慢慢地向前走着。

此时,大路上走来了李毓昌以及家丁李祥等四人。他们经过几天几夜的跋涉,终于踏上了受灾之地。妻子林氏临别之言又响在他的耳边:“官人,此去我不能跟在你的身边,你要多加保重,天冷了要早加棉衣。”

其叔李泰清送李毓昌上路时,又再三叮嘱道:“此去为官,要忠正办事,以民为本。”

一天傍晚,李毓昌一行人终于来到了山阳县城。

山阳县坐落在江苏省的北部,地处古黄河的南岸,是一座古城,这里又是淮安府所在。

“老爷,你要到哪儿去呢?”李祥扯住李毓昌的衣袖说,“到官署该朝这边拐呢!”

“不去官署啦!”李毓昌回过头来说,“时候已晚,这城外漕院东首有一座寺院,叫善缘庵,咱就去那儿借宿暂住吧。”

李祥等三人心里不乐,可嘴上又不敢说,只好跟在李毓昌的后边,闷闷不语地朝前走去。

傍晚的时候,从山阳县衙门北的镇淮楼上,传来了几声沉闷的钟声。王仲汉从太师椅上站起来,走

出了客厅,来到宅门外,立在黑暗中眺望着,他在暗暗焦急,被宴请的客人们为什么迟迟未到。这一个月来,他的思绪很乱,神情不安,所有的民事案情统统丢压在一边,他没有心思再去管这些事情,有时候晚上连觉也睡不好,常常做恶梦,每当从梦中被惊醒时,心里更觉空荡和惆怅。他耽心着自己冒吞赈银的事一旦败露……这些日子来,他正为这件事绞尽脑汁,把所有的心血都花费在这上面了,总算没白费油,查赈委员们陆续上了他的金钩。这些查赈委员们,马上就要返回江宁,为他在上司面前善进美言。然而,最使他不放心的是那个李毓昌,与众不同,一踏进山阳地就和自己唱对台戏,离他远远的,够不到,摸不着,要下钩也无处下手。他虽然前些天派人暗暗前往查探,可是到今天还不见回音,这就不能不使他焦心如焚。至于对所派去的暗探包祥,他是放心的,因为包祥原是一个大盗,事发后拘捕归案,抗刑不招。王仲汉见这个人有胆有勇,将来留在身边,对自己必有用处,他便设计开脱了包祥,然后收留在身边为仆。包祥对主子的救命之恩,那更是感恩戴德,决心要效犬马之劳。就这样,包祥成了王仲汉最心腹的人了。

“客人到——”王仲汉还要继续想下去,忽听到县衙大门外差役的高声喊叫,打断了他的思路。

王仲汉只好把心事暂时放下镇静了片刻,整了整衣襟,迎了出去。刚到二门,便和前来的客人相遇了,九名查赈委员,除章家因事未到,其他八个查赈委员全来了。相互寒暄了一阵,便进入了客厅,分宾主坐下后,侍女立即端上当地名点茶馐,还有几十种精美糕点。茶馐是用上白精面粉,拉出象麻线一样细的丝,编制成菊花形等网状图案,在麻油中泡炸而成,质地酥脆,味道香美。茶点过后,摆出了一桌美酒佳肴,酒不必说,光肴就有蟹黄、蟹肉、白鸡、板鸭、火腿、燕窝、溜肉、虾仁、鲍鱼、海参、鱼翅……山珍海味,应有尽有。

王仲汉笨胖的身子立了起来,肚子和双手同时放在桌子上,笑嘻嘻地说:“今晚特为诸位大人饯行,粗茶淡饭,万望海涵。诸位请——”

王仲汉高高举起了酒杯。

正在宾主热闹非凡，互相吹捧，寻欢作乐的时候，包祥来到王仲汉身边轻声说：“老爷，我回来了……”

王仲汉回头一看，又惊又喜。他急忙避开众人的视线，随包祥走到门外面，急不可待地问：“怎么样？”

“老爷，这李毓昌走门穿户，查得特别细，据他的家丁李祥说，这两乡饥户人口，俱已清查造册，半个不差。这样以来，老爷浮开的饥户，不就露了马脚了吗？”

送走了客人，王仲汉回到客厅，见桌子收拾一空，他心烦意乱地在屋子里踱着步子。

王仲汉坐在桌前，沉思良久，提笔给李毓昌写了一封短信：

汉顿首李大人膝下：

足下百赴茅屋，问民疾苦，勤劳甚矣。眼下天寒日短，何不暂旋文驾，寻宾主之欢乎！

王仲汉顿首

X年X月X日

原来李毓昌在山阳县城拜会县令王仲汉的第二天，便动身往十一、十二两乡查赈。他率役赴乡间查核户口并发给赈票，每至一村必亲入民户造册，注明老幼人数，察勘有无漏赈和冒领现象，公正廉明，老幼称颂，当地百姓称之为“李青天”。至十月即复查二乡毕，将所查出的原县令借放赈之机贪赃枉法、克扣赈银之事，具清查造册。

这天，李毓昌刚刚查赈回来，包祥就来到李毓昌面前，从怀里掏出王仲汉的亲笔信。

李毓昌把信接过来，撕开一看，皱了皱眉头，没有做声。他想，眼下淮扬饥民，饿死路边，白骨成堆，王县令竟忍心在这些枯槁的人身上榨油，可见此人心有多狠毒！他正在打算禀报皋台大人，但他转念又想，即使要向上禀报，也要把话说明，明人不做暗事，他也为官，我也为官，背地里偷偷参他一本，这不是暗箭伤人吗？如果借此机会，回县衙当面开导，王县令或许能心回意转，重新作人，也未可知。想到这里，他对包祥说：“你回去禀告王大人，我三两日内事完，定返山阳！”

三天后的下午，王仲汉特意先在自己的书斋里接待了李毓昌。

“想不到王大人还是一个风雅学士哩！”李毓昌落座后，一边朝屋子打量着，一边微笑着说。

“岂敢！岂敢！”王仲汉谦意地说：“听说李大人是文章满腹，才学出众呢！我这不过是圣人面前卖三字经而已。”王仲汉眯缝着眼笑道：“早听说李

大人书法不俗，超人一等！我这书房里倘若能留下李大人的笔迹，那可是锦上添花，万幸之事了。”

李毓昌抓起笔来，边蘸墨边思索，他忽然想起古人的一副对儿，正可表达自己的心思。于是，他落笔生花，以潇洒的笔迹，在白萱纸上，信手写出了这副联：

身后有余忘缩手

眼前无路想回头

天擦黑，李祥几个家丁见李毓昌还没有回寓所，便一齐来到庵门口，站在台阶上向远处张望。忽见一伙差役，抬着漆红的盒子，正拐过青龙桥朝庵子走来。走在前头的包祥张罗着把两个红漆盒子抬进了李毓昌的寓所。

包祥说：“你们先来收下吧，这是我家大老爷送给李大人的一点小意思，二千两纹银，回头你们转给你家老爷就是了。”

李毓昌回来后，走到了桌子旁，刚刚坐下去，忽然看见桌子上端端正正地摆着两个红漆盒子，在昏暗的灯光下，闪闪发亮。他瞧了一会儿，觉着有点纳闷，抬头朝外屋喊道：“李祥！”

李祥闻声走了进来，他偷偷察看着李毓昌的脸色问：“老爷，有何吩咐？”

李毓昌指着盒子问：“这是怎么回事？”

李祥一听松了口气，喜气洋洋地说：“禀老爷，这是山阳县王大老爷特派包祥给老爷送来的礼物。”

“你说什么？”李毓昌吃惊地问。眉头也暗暗皱了起来，眼睛里闪着火光。

“老爷，二千两银子，一盒一千两呐！”李祥走向前来，伸手打开盒子，指着白花花的银子说，“小的们一查点过，分毫不差！”

李毓昌一看，心里完全明白了，他暗暗地骂道：“这个老贼，要硬拉我入伙哩！？”

李祥见李毓昌望着银子不做声，还以为他在观察这银子的成色如何，便伸手拿起一锭银子在手中掂了掂。他跟李毓昌半年了，还从来没有动过荤呢！这会儿二千两到手了，每人还不尝个百儿八十的。想到这里，李祥欢天喜地地掂着银子说：“老爷，全是纯色的官银呢！”

李毓昌指着银子说：“立刻退回去！”

“什么？”三人都以为自己听错了，齐声问道：“老爷，您说什么？”

“马上给山阳县王大人把银子送回去！”李毓昌把眼一瞪，又说了一遍。

李祥并不生气，接着说：“老爷，倘若我们不收这银子，县太爷必疑我们要奏他的本，那时他将恼羞成怒，依仗着人熟地熟，变着法儿整到老爷头上，打虎

不成，反被虎害，这岂不断送了老爷的锦绣前程！”

“他敢把我奈何？”李毓昌不服气地说：

“老爷，这就很难说了。常言道：狗急跳墙，不得不防。”李祥说，“依小的看来，还是把银子收下为好，这是上策；否则，是下策。”

“哼，你出的好主意！”李毓昌冷笑道：“把银子装进腰包，这江南饥民又何处投生呢？”

“老爷，这又是你的疑心了，就凭我们不收这银子，能救了江南饥民不成？”李祥摇头道：“老爷，当今的官场，哪一个做官的不是为钱！一旦乌纱在首，恨不能把所有的钱都聚拢到自己腰包里，恐怕那也还嫌少呢！能有几个象老爷这样清贫的官……”

“大胆奴才！”李毓昌听到这里，竖眉瞪眼地喝道。

“扑通”一声，李祥跪到地上，不住地叩头说：“奴才不敢。小的也是受了主考大人的委托，才跟老爷说了这些话，无非是为老爷好，没有他忌……”

李毓昌气恼地说：“胡说，主考大人绝不会叫你劝我不顾饥民死活，为了自己苟且偷生，干出这种上欺天子，下负万民的丑事！”

李祥看着李毓昌震怒的样子，知道再劝也无益了，他站起来走向前去，狠狠把盒子盖上，恼羞成怒地对顾祥和马连升恶声恶气地说：“抬！”

家丁们被斥走后，李毓昌仍然没有半点睡意。时令既是深冬，无奈夜里从西北又刮来一股寒流，天气异常寒冷。呼呼的西北风，吹得善缘庵院中的松柏树，在黑夜里呜呜作响。李毓昌住的是庵中厢房，再加上门窗多年失修，多处透风。李毓昌冻得全身发抖，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忽然想到需要加棉衣了，他这才转身打开箱子，取出了一件青马褂，这是妻子特意为他缝的，如今他穿在身上，顿觉暖和得多了。见物生情，这时他心中不由涌上一股思乡之情，温暖的故乡，夫妻的恩爱，好象就在眼前。可眼下呢，自己心中纵有千言万语，又对谁去说！临别时叔父的嘱咐又响在耳边：“此去为官，要忠正办事，以民为本……”

李毓昌想到这里，双手合在一起搓了搓，自言自语说：“对！如今千里迢迢来到江南，虽说远离朝廷，远离故乡亲人，但也决不能辜负皇恩和亲人所望。为了江南饥民，就是再大的风险，我要去承担！”说完，他心如火焚，欣然坐到桌旁把油灯挑亮，磨好墨，然后将稿纸取出铺到桌子上，他准备把王仲汉侵吞赈银的事，一五一十向总督大人报告。他怒火中烧，挥笔写道：

山阳冒赈，以利啖毓昌，毓昌不敢受……

写到这里，他突然又把笔搁住了。他认为这样写不妥，没有写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有点突如其

来。他想，应该把自己亲眼所见淮地的灾情，以及饥民延颈待哺的惨状写清；然后再写皇恩浩荡，体恤灾民；进而揭出王仲汉侵吞赈银的可恶……想到这里他感叹道：“无怪乎批师初彭令老大人说，悲愤之极，难出好文！都怪我刚才感情冲动，没有沉下心来好好想一想，就下笔拟文……”说罢，他把这张写了两行字的稿纸撕下来，揉成了纸团，刚要随手扔掉，又觉不妥，万一被哪个家丁拾到传开去，人们讥笑他的文采不说，说不定还会把事情弄坏的。想到这些，他顺手装进了自己马褂里面的贴身口袋里，这才又重新提起笔来。

镇淮楼的钟声敲过了三更，已经是半夜子时了，王仲汉还没有睡觉，他独自留在清冷的客房里。这时，包祥走了进来，王仲汉背身站着没有动，斜视着包祥问：“包祥，你说李毓昌为什么不肯收这银子？”

包祥说：“老爷可也要多加小心，这疯狗咬起人来，可是六亲不认啊！刚才李祥来说，李毓昌告发老爷的禀揭都写好了呢！”

“嗯，看起来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有他无我，有我无他！”王仲汉恶狠狠地说，“一不做，二不休，眼下也只有这一条路了。”

包祥说：“可许李祥等人数百金，令其酒后下毒，然后悬尸于梁，再取其禀揭焚掉。李毓昌又无亲眷在此，谁予作梗？”

王仲汉听罢，捻须沉思道：“好，你想得比我周到。其尸悬于梁，以自缢上报，然后打通知府，断然无事。就不知李祥这些人肯干否？”

包祥胸有成竹地说：“老爷，这你就看我的吧。”

第二天一早，包祥请李祥来到一家酒馆，登上二楼，走进里面紧靠山墙的一间小木板房，面对面在桌旁坐了下来。包祥把一包银子朝桌上一丢，高声喊道：“来酒！”

“咱哥们儿是一家人，别说两家话！”包祥把话扯到正题上，“老弟，我可全是为了你好啊，这可真是个无本万利的买卖，事成之后，我们大老爷答应多付你五百两银子，然后荐你们到别处衙门去当差，从此，你们也就跳出了困境，有了出头之日。”

李祥试探着问：“若事发怎么办？”

包祥说：“有我主这一县之主一定不会连累于你，你怕什么！”

且说李祥别了包祥，正直回到了善缘庵，李毓昌还没有回来，李祥召来顾祥、马连升开门见山地说：“伙计，咱跟着这样的官，早晚得冻饿而死，我想不干了，另去觅跟官……”

顾祥、马连升说：“我们也早有此意，只是不好开口。”

李祥便趁机把谋害主子这件事，一五一十地对他二人说了一遍。

顾祥、马连升虽然平日都惧怕李祥，凡事百依百顺，但对眼下这件人命关天的大事，他们依也不是，不依也不好，一时都没了主意。

“事成后每人分一百两银子，山阳县王大老爷再把我们荐到别处衙门了事。”李祥又催促道，“谁不想干，早放屁！”

乌云笼罩着天空，天色渐渐转暗，闹腾了一天的山阳城，早已安静了下来。

李毓昌过了青龙桥，带着醉态，摸进了善缘庵。闷酒易醉，半点不假。按李毓昌平日的酒量，喝今天这点酒是不该醉的，谁知竟醉了。这几天来，他实在是烦闷极了。就说那份禀揭吧，他仔仔细细地句句琢磨，字字斟酌，生怕有一点地方失真，把王仲汉侵吞赈银的罪扩大或缩小。今天午后，他总算把自己认为满意的禀揭写好了，决意明天一早起行，悄悄到江宁去。但是，此行凶吉如何？他心中无数。他虽然不相信李祥所说的会断送了自己的前程，但也不敢把事情想得那么顺利。淮安知府和山阳县令是至交，两江总督铁保和王仲汉有没有瓜葛呢？他不清楚。

“老爷，你回来了。”李祥在黑影中迎了上来，恭恭敬敬地说。

李毓昌还在想着什么，没有做声，醉醺醺地继续向前走去，正好撞到了山墙上。

“老爷，你喝多了。”李祥上前仔细地搀扶着李毓昌走进了寝室，然后，把他扶到了床上。

“唉！”李毓昌长叹一声，下意识地扬了扬手。

“老爷，你要喝水？”李祥忙又把脸凑上去，关切地问。

李毓昌摇了摇头，紧紧闭上了双眼。

远处，镇淮楼传来了三更的钟声。

室内，李毓昌在床上翻了个身，这时候，他才感到口干舌焦，想到要喝水。于是，他抬起头朝门外喊道：“茶！”

李祥听到李毓昌的喊声，急忙站起来对顾祥、马连升使了眼色，等二人转身离去后，李祥这才推门进了内室，来到李毓昌的床边问：“老爷，你要喝茶？”

“好，我马上给您倒。”李祥说完，回身转到桌旁，从袖筒里摸出一包砒霜，悄悄倒进了茶杯里，然后，又从壶里倒上半杯不热不凉的茶水，双手端着送到了李毓昌的嘴边。

李毓昌望着李祥开口道：“李祥，我们今日五更动身，回江宁去，你们准备收拾一下。”

“老爷，这么早就走？”

“嗯……”李毓昌把有意要避开山阳县令和淮安知府的话咽了下去，话题一转说：“江宁可是个好地方啊！”

李祥也不再问，接着李毓昌的话题说：“老爷，这次到了江宁，可要让小的们开开眼界，好好看看。”

李毓昌点头道：“嗯。这次你们三人跟本官前来山阳查赈，可是吃了不少苦头呀……”

“快别这么说，小的们惹老爷生气。”李祥看看李毓昌并无疑心，这才放了心，指着桌上的茶杯说：“老爷，茶快凉了，您喝茶……”

经李祥这么一提，李毓昌确实感到酒喝得厉害，于是，伸手端起桌上的茶杯，送到嘴边，脸一仰，一饮而尽。然后摸了一下嘴，吐出一口长气说：“好茶！好茶！再来一碗！”

李毓昌又一饮而尽。然后问道：“天什么时候了？”

“老爷，四更多了。”

“好，我们稍睡一会儿吧，别误了赶路。”李毓昌说完和衣又躺下了。

在家人窃窃私语的时候，室内李毓昌忽觉腹痛难忍，他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双手紧紧按住腹部。不但没有止住痛，反而痛得越来越厉害。他实在支持不住了，从床上滚到了地下，又在地上打着滚。这时，他觉得从口里流出来一些东西，带着一股腥臭味，他吃力地挣扎着坐了起来，举起马褂袖子擦了一下，放在眼前一看，啊，是血！顿时血从下巴流到了前胸，他知道不好，神色全变了，声嘶力竭地道：“啊！”

三个家丁闻声闯了进来，站在李毓昌的面前，只见他们脸色极恶，眼露凶光，顾祥的手中还提着一根丝带。李毓昌一看，吃惊地问：“你们要干什么？”

李祥冷笑道：“我们不能服侍老爷了，等到五更天，老爷的魂灵就可以到江宁了。”

顾祥、马连升说：“老爷，这可不能怪我们，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呀！”

李毓昌怒声喝问道：“你们为什么要加害于我？”

李祥道：“老爷，看在主子和奴才的份上，临死我们也叫你心里明白，这是山阳知县王大老爷叫我们这样干的，毒药还是包祥亲自给的呢，是我刚才下在茶里让老爷喝了。没法子，我们当奴才的只能在两个大老爷中选择一个。都怪老爷当初不听我的劝告，才有今日这杀身之祸……”

“狠毒也！”一字一字从李毓昌的牙缝里蹦了出来，“可有谁来替我伸冤雪恨呀……”

“老爷，你死的冤是冤，只是此地怕是没有人能替你伸冤了。”

李毓昌气愤之极，他真想立起身来给李祥几个耳光。然而，他现在已经立不起来了，腹痛如刀刺，脸上渗出豆粒大的汗珠，接二连三地在地上滚着。

“老爷，看在主仆的情份上，还是让你少遭点罪吧！”李祥朝顾祥、马连升招呼道，“来，动手吧！”

顾祥、马连升急忙上前，把丝带套在李毓昌的脖子上，然后，两个人把李毓昌竖起来，举到了高处。李毓昌大睁着带血的眼睛，狂呼道：“大胆奴才！”然而，任李毓昌拳抡脚踢，他俩牢牢抓住，死也不肯放手。

这时，李祥早已把凳子放在桌子上，踏上去把丝带的另一头拴在了梁头上。顾祥、马连升把手一松，李毓昌被悬挂在空中，象根柱子一样，一动也不动了。

李祥翻身把凳子踢倒后，便启开了李毓昌的箱子，翻出了李毓昌写好的最后一份禀折和十几两银子，悄悄揣到了自己怀里。

李祥看看天快亮了，便跑出门去，悲痛地高声呼喊道：“不好了，我家老爷上吊死了！”

李祥来到山阳县衙，先找到了包祥，从怀里掏出李毓昌写的禀折，悄悄递上去说：“包兄，事已照你说的那样办好了。”

包祥接过禀折看了看，装进口袋里说：“好，老爷真能干！”

“还不全是你的计谋。”

“老弟这次为山阳立了一大功，我马上给大老爷传话，叫他升堂。”

“老爷，这是李毓昌写给江宁的禀折。”包祥双手递上说。

“好啊，这杀人如刀的禀折，你终于落到了我的手里！”王仲汉把禀折托在手上仔细看了一遍，冷笑道，“李毓昌啊李毓昌，你这是自己找死，不能怪我。包祥，你到账房从我名下支五百两银子，送给李祥吧。”

多日来不曾升堂的王仲汉，在大堂上坐好后，喝令衙役传李祥上堂。李祥忐忑不安地叩过头，跪在堂下，把早已编好的供词对王仲汉禀道：

“小的回禀：我家老爷数日以来，精神恍惚，言语颠倒，小的劝老爷禀辞回省。老爷正欲起身，不意于昨夜轻生，自缢身死。小的们在隔房住宿，并不知觉。今日天明，见老爷迟迟不起，推门视视才知出事，不胜悲骇交加……”

李祥禀完，王仲汉把书记官呈上的笔录看了一下，随令李祥画了供，着他回善缘庵听候。

事毕，王仲汉起身吩咐道：“搭轿淮安府！”

不一会儿，王仲汉的轿子出了县衙，穿过镇淮

楼，飘飘如仙似地进了淮安府。

淮安知府王毅飞快地把供词看完，沉思了一会儿说：“贤弟，此案必定有诈！”

“何以见得？”

“仅只精神恍惚，怎能构成轻生自缢的根据？”王毅指着供词说，“必提李毓昌的几个家丁严切查办，方能弄个水落石出！”

“大人所见极是。”王仲笑吟吟地说，“只是王兄大祸临头，还蒙在鼓里呢！”

“此话怎讲？”

王仲汉当场拿出已被篡改了的李毓昌那份禀折，请王毅过目。王毅看罢大怒道：“狂徒，连我这四品知府也给告下了！”

“这份禀贴如今幸好落到你我手里，不然……”王仲汉烧掉禀贴说，“王兄，现在有人替你我除害，这岂不是因祸得福吗？”

王毅也是个贪官，和王仲汉臭味相投，此时他心下全明白了，犹豫未决地说：“只是这查赈大员人命关天的大事，岂可马虎……”

“这事只有你知我知，声张出去对你我都没有好处，何不来个顺水推舟！”王仲汉说完，站起来朝门外招了招手。几个差役立刻把两个红漆盒抬了进来。这正是王仲汉原先送给李毓昌的二千两银子，现在原封未动地又抬到了知府大人的面前。

王仲汉微笑着说：“后天是王兄五十大寿，愚弟仅备薄礼一份，万望笑纳。”

“又叫贤弟破费了。”王毅说完，命家丁曹德把银子收了进去。

王仲汉坐在一旁，斜视着曹德把银子挑走，这才站起来说：“李毓昌死案，全靠知府大人了。”

王毅起身道：“好说，好说！”

王毅与王仲汉双双乘轿来到了善缘庵，亲自验尸。

仵作李标上前仔细查验，发现李毓昌嘴边有血迹，大有中毒而死的迹象。他转脸望着立在身后的王毅，欲报又停。这个李标是王毅的心腹，他为人精明，办案一向看王毅的眼色行事。

王毅看看李标的举动，心下明白，连忙对李标递了个眼色，然后把脸转向一边，装作咳嗽，用手帕捂住了嘴。

李标会意，转回脸去，悄悄擦去了李毓昌嘴边的血迹，把受毒而死的实情隐蔽起来，故意望着众人高声报道：“别无他伤，自缢身亡！”

验尸完毕，王毅令李祥、顾祥、马连升换了素服，王仲汉早已差人买来了棺木，棺殓起来，停柩庵中，等候李毓昌的家人前来迎丧。

李祥等几个家丁，又把李毓昌的遗物，统统装进

箱中。李毓昌所穿的马褂也被换下来装了进去。因为马褂是黑的，慌乱中又未仔细查点，所以，谁也没有发现马褂前胸和衣袖上的血迹。

王毅回府后，把李毓昌遇害一案，以自缢身亡上报了事。

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日，也就是即墨城这一年中遇后的一个集日，城里的大街上，购年货的人你拥我挤，十分热闹，鞭炮声也响个不停。

然而，即墨城阁里的李毓昌故居的大门外，今天却完全是另一番情景。李毓昌的灵柩安厝在里面，只等新春过后，葬入李家祖茔。李毓昌的夫人林氏，这位三十几岁的少妇人，头扎孝布，身着孝服，还守在丈夫的灵前。她嗓子早已哭哑了，全身瘫痪无力，站也站不起来了，雪白的孝服，滚得满是泥土。五岁的幼女，穿着不合体的白大褂，偎在娘的身边，有气无力地哭喊着，在这时候，谁也顾不上这个可怜的孩子了。

不知又过了多少时候，走上来两个妇女，架起了林氏，脚不着地地拖进了屋里，安放在正间的蒲团上，让她伏在箱子上歇一会儿。

她跪在地上，强忍着悲痛，把箱子打开了，她幻想着丈夫临终前会留下什么信物。她一样一样仔细查看起来。这些丈夫的常用之物每一件她都了如指掌。那一捆线装书，伴丈夫度过多少个春夏秋冬，多少个不眠之夜；这一方巴掌大的砚台，曾吃过多少黑墨，凹下去多少？林氏端详了一会儿，又下意识地提起一件马褂。看着看着，她的眼泪又扑簌扑簌地流了下来。这是她在丈夫赴京赶考前，用了三个夜晚，在油灯下一针针一线线特地缝制的，这是她的精心之作，也是丈夫最珍爱的衣物。她把马褂紧紧地抱在怀里。突然，她在马褂的前胸发现了一片模糊的血迹。她大吃一惊，急忙抹干了眼泪，瞪大眼睛仔细一看，马褂的袖子上也有血。她惊疑地又把马褂翻看几遍，一眼看见了那个别人不易发现的贴身小口袋，这是她特意为丈夫缝上的，以备盛装紧要的物件。她伸手在里边摸了摸，摸出了一个小纸团，于是，她放下马褂，展开纸团一看，原来一张残稿，上面写着：

山阳冒赈，以利啖毓昌，毓昌不敢受……

林氏看罢这张残稿，全身都颤抖起来，自言自语哭喊道：“夫君，你死得冤啊！”

她虽然不知道这个山阳冒赈的人是谁，也不知道利以何物，更不会知道“不敢受”之后又怎么样了。但看看这张残稿，再看看这件血衣，她怀疑丈夫的死，其中定有隐情。可是，眼下该怎么办呢？凭着这一纸残稿和血衣，就能够找到凶手吗？

正在这时，李泰清推门走了进来。

林氏流着泪把马褂和残稿捧给叔父过目。李泰清看罢血衣，又看残稿，不禁皱眉沉思起来。

林氏瞅着李泰清问：“叔叔，自缢之人，怎会留下血迹呢？”

李泰清捧着残稿说：“看起来，这张残稿里面也有大文章呀！”

“叔叔，全靠您拿主意了。”

“侄媳，事情一定会弄个水落石出的！”

李泰清原先存在脑子里的疑团，现在在物证面前，清楚得多了，他在思索着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就在当天晚上，李泰清把家族中的老人请到家里，商议要偷偷开棺验尸。家族们觉着事到如今，也只好这么办了。

第二天一早，停在灵棚的棺木被打开了。只见李毓昌面涂石灰，看不见脸色，掀开衣服一看，腹部全部呈青黑色，分明是中毒而死，并非什么自缢身亡。

“先别急！”李泰清劝阻家人道，“前些日子听说毓昌的批师初彭令从京回家探亲，初大人是京官，曾做过吏部、刑部侍郎，我悄悄到莱阳去求见他，说明事情的原委，定会有章程的。”

初彭令自乾隆时在朝做官，学识渊博，文不加点，为人正直，敢进谏言，风采振一时，累迁兵部侍郎。嘉庆登极之后，也视之为掌上明珠。四年出为云南巡抚，六年调工部侍郎，不久又调户部，九年擢迁内阁学士，最后做到兵部尚书。后来不知犯下什么过错，回乡服阙……李泰清原打算进京去找初彭令，为毓昌侄儿伸冤，如今见他一身布衣，口上不说，心里已冷了一半。

原来，十几天前，初彭令已接诏回京，皇上知他赤心为国，一向实政清操，敢于弹劾奸臣，不欲因言事加重谴，这才复而起用。正在他准备动身进京的时候，传来了李毓昌自缢山阳的噩耗。在多年的交往中，他对李毓昌的人格、脾气是一清二楚的，他断定不在什么棘手的事情面前，李毓昌断然不会自杀。为了把事情弄清楚，他决定推迟几日再进京。

李泰清把详情讲述了一遍，初彭令听罢拍案大怒道：“果不出我所料，贪官如此猖獗，国朝中兴何望！”

“全靠老恩师作主！”

“此案关系重大，加之当今官场腐败，官官相护。”初彭令捻须沉吟道，“此冤欲白，非直接进京告到都察院不可！”

李泰清面有难色地说：“如今老恩师还乡，京都举目无亲，只怕此冤难白啊！”

“无妨，我为你草状一纸，你连同血衣、残稿，还

有王仲汉送的那二百两纹银，一并呈都察院衙门即可。”初彭令没有把皇上重新起用之事明说。

说完，初彭令取来文房四宝，疾书状纸一张，递到了李泰清手中。

李泰清仔细看了一眼说：“老恩师状纸虽佳，只怕没有接状人啊！”

“放心，当今江南灾区，贪赃成风，皇上已有所闻。圣上图治，急切不知从何下手，若从此案开刀，也未可知啊！”初彭令又暗示道，“我明天就要动身进京，你可在新春之后抵京，住进朝阳客店，那时我再指派人和你接头，想来雪冤指日可望。”

初彭令又扯住他嘱咐道：“此案如若追究起来，必定要验尸为证。眼下天冷，你回去后，连夜在院中挖一坑，把灵柩悄悄掩藏好，上复沙子，以防歹人盗尸焚骨，没有凭证啊。”

数日后，李家的大门外突然来了个陌生货郎，自称江南灾情惨重，特到山东来跑个小小本生意糊口。说来奇怪，这个货郎与一般买卖人不同，货色极少，质量又极劣，当然无人肯买。而货郎全不以此为忧，并不热心去招揽，却漫无边际地和人们拉着闲话，象谁家的孩子中了功名，那个年轻的小媳妇死了丈夫，谁家有人在江南做官……

这个买卖人是谁呢？

不是别人，正是王仲汉的家丁包祥，他是特奉主子之命，赶来即墨盗焚李毓昌尸骨的。

经过几日的暗访、密查，得知李毓昌的灵柩已经下窖，但不知窖在何处，无法盗焚。包祥暗暗惊奇道：“此着厉害，看来李家必定有高明之人在暗中指点，恐怕事情要坏……”

嘉庆十四年的新春正月，李泰清来到京都已经三天了，遵照初彭令的嘱咐，他住进了朝阳客店。

一天，李泰清正站在客店朝外观景，忽然有人在他后边扯了他一把。

李泰清回头一看，扯他的人正是初彭令派去请过他的那位家丁。李泰清惊喜出望外地迎上去说：“哎呀，可把你盼来了！”

家丁说：“我家老爷早知道你已经到了，因为天天不是会客，就是赴宴，一直没有找到个合适的时机，直等到今天才有机会。你带上东西跟我走，看我眼色行事。”

他们来到尚书老爷的宅前，见迎面来了两乘轿子，李泰清便跪地喊冤。

轿内坐的是都察院左都御史特克慎。他是满人，年龄比初彭令小几岁，为人骄横，性情暴躁，他听说有人拦轿喊冤，就在轿内粗声粗气地道：“问问他有什么冤！”

特克慎接过状纸一看，立即被状纸上那苍劲有力的字迹吸引住了。

“小的武生李泰清，山东随州府即墨县人氏。胞侄李毓昌中戊辰科进士。榜下以知县即用，分发江宁府候补。当与长随李祥等同往，并无亲丁跟随。去冬腊月初六日晚，在山阳县善缘庵自缢身亡。山阳知县亦称自缢，当同署府宪王验明，换衣棺殓。领柩归里，山阳县送路费银二百两。归里后查看侄生前所穿皮袄马褂，胸前两袖，均有血迹，内兜存残稿一纸。开棺看验，见侄面涂石灰，心坎腹脐皆青黑。用银簪入口探视，银簪青黑，用皂角水洗至再三，其色不变。可见侄系中毒将死，复行吊挂，假作自缢。身侄初受国恩，竭力查赈，被逆仆谋杀，天理何在？恳恩提究。”

被禀长随李祥、顾祥、马连升。

附上血衣二件、银簪一支、纹银二百两、残稿一纸”。

特克慎看罢，心里暗暗骂道：“狗娘养的，我今天是来喝酒的，不是来办案子！”想到这里，他把状纸一举，就要往轿外扔。

这时，后边那乘轿子也早已把轿帘打开，从里面走出一个年迈大臣，正是初彭令。自他进京朝拜皇上后，当即起用为安徽巡抚，为了李毓昌这桩案子，他假借在京访友为名，耽搁几日再动身出任。恰好今日尚书大人庆寿，他特约左都御史一道前来，事前让家丁暗告李泰清，前来轿前递状。他知左都御史不会轻易接状，这才走到御史轿前问：“大人，何人轿前告状？”

特克慎见问，随即走出轿子，将状纸顺手递给初彭令说：“噢，对了，这个告状人还是大人的同乡呢！”

初彭令接过自己写的状纸，假意读毕道：“彼莱州府人，我登州府人，非同乡矣！”

特克慎说：“见笑了，依大人之见，这状当接不当接呢？”

“自缢之人，两手垂下，何能举袖拭血？实是可疑！”初彭令把状纸重新递回特克慎手中正色道。“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呀！如若告到别的衙门，大人当可拒之，可眼下他恰恰是告到了大人的都察院，可谓巧矣！依鄙人看来，还是接状为好……”

特克慎想了想说：“好，就依初大人之见，接状！”

这天清晨，王仲汉正独自在后堂闷坐，忽听衙役在门外高声喊道：“知府老爷驾到！”

王毅急走进来，气急败坏地说：“王县令，看来我这个堂堂知府要坏在你的手里了！”

这当头一棒，打得王仲汉懵头转向，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惶恐地望着王毅试探着问：“大人，此话怎讲？”

“你自己去看吧！”王毅从怀里掏出一纸，摔到地上说：“这是朋友连夜从江宁偷偷抄来的。”

王仲汉不知上面抄写的是什么，急忙弯腰从地上拣了起来，举到眼前一看，不由地惊瘫在太师椅上，一句话也说不出。原来，他手上捧的是抄写的皇帝圣旨：

“李毓昌人命一案，疑窦甚多，著铁保查明具奏，钦此。

敕旨山东巡抚吉纶，派委明干大员，赴即墨提李毓昌尸棺，粘贴封条，沿路小心押解赴省，评加检验具奏。钦此。

委员咨查江苏省原报案卷，并提李祥、顾祥、马连升等到案，交刑部审讯。钦此。”

王毅见王仲汉默默不语，怒斥道：“都看见了吧，铁保大人的书函也无济于事，李毓昌的案子还是闹到皇上那儿去了。又要查案卷，又要验尸，看来不会有好结果。”

王仲汉说：“王大人，话虽这么说，可事情是咱两个人办的，没有你知府大人签发，李毓昌自缢身亡怎么能报上去？再说，银子也不是我一个人装进了腰包，这你心里明白！”

王毅道：“哼！‘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那千把两银子算得了什么！”

王仲汉冷笑道：“银子倒不算什么，可上面怪罪下来，问大人一个贪赃枉法也是有的。”

“大人，如今是一根绳上拴着俩蚂蚱，谁也跑不了！”王仲汉索性站起来走近王毅一步说，“仁兄，依愚弟之见，咱也不能坐等祸来，束手就擒！”

王毅的腔调柔和了许多，无可奈何地说：“一次次地失算，眼下到了这一地步，还有什么办法？”

王仲汉机密地说：“眼下愚弟倒有一法，倘若李毓昌的尸骨检验无毒，受毒而死就没有凭据，那样一来，朝廷就无法下手。”

“大白天说梦话，明明是受毒而死，怎会无毒！”王毅一听直摇头。“这我自有办法。”王仲汉附在王毅耳边，小声叽咕了一会儿。

“不过，那些检验大员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王毅想了想说，“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快着人去办吧！”

号称泉城的济南府，春天照例多风，整日刮得尘土飞扬，天昏地暗。

疾风中，只见一队长长的人马，护着李毓昌的灵柩，浩浩荡荡地进了济南府，然后穿过街心，向城南

鱼贯而去。李毓昌的妻子林氏以及胞侄，围坐在灵车上。

校场的一角早已用芦席搭起了一个临时棚子，作为验尸之用。

一字长凳上，以朱锡爵为首，坐满了检验大员。自上而下排去，有济南府知府徐日簪、武定府知府金国保、登州府知府石俊、历城县知县王嵩、德州知州周履端、阳谷县知县王吉、嘉祥县知县周以勋等。李泰清及李毓昌胞侄在另一条凳上坐下，共同开棺验尸。只见尸身未全腐，是毒是缢却无从辩认。朱锡爵随令仵作将尸抬出，如法蒸验。

各位大员及李毓昌的亲人，目不转睛地望着几位仵作忙乱了老半天，这才把蒸过的尸骨一一取出，摆在各位大员对面的一条长凳上。只见尸骨皆白，并没有半点受毒症状，官员们面面相觑，不置可否。

李泰清一看，感到事情有些蹊跷，毓昌侄明明是受毒而死，为什么蒸骨偏偏无毒，难道侄儿毓昌的冤案，就这样不了了之吗？想到这里，他悲痛难忍，咕咚一声，双膝跪在尸骨和各位大员跟前，嚎啕大哭，要求重检。

仵作们一听要重检，当然谁也不敢违抗，各自又一声不响地忙活起来。但是，这一次和上一次不一样，朱锡爵十分留心观察各个环节，生怕有人从中捣鬼。他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布政，多年来，经他亲自检验过的尸骨很少有什么差错。他想，如果重检无毒状，那就果真不是受毒而死了。

正想到这里，只见一个仵作捧水进来，从他身边走过。老谋深算的朱锡爵忽然意识到，如法蒸验，用水最关紧要，如果水不清净，容易出错，这一关节万万大意不得。只见他高大的身躯从凳上立起来，招手让捧水的仵作停步，走向前指着钵中的水问：“这是用的何处之水？”

仵作没想到布政大人会突然拦住他问起水来，以为自己露了马脚，顿时慌了神，心砰砰跳了起来。他极力镇静了一下，这才捧水施礼道：“老爷，听说这济南府有七十二泉，遍地是泉水，这是什么泉的水，小的可说不出名堂来……”

朱锡爵眼盯着这个五十多岁的仵作问：“你来济南府多少年了？”

“回禀老爷，小的到此还不足一年。”

“原先在哪个府衙干事？”

“江……宁。”

这个仵作也算机灵，他怕引起怀疑，有意隐去山阳不说，而回禀江宁。

朱锡爵盯着仵作，见他表面装作平静，内心却透露出惊慌之状，这就越发使朱锡爵起了疑心。他回身从桌上拿起一只喝水的杯子，把里面的水往地上一泼，便向钵中伸去，仵作顿时明白了布政大人的举

动，他惊出了一身冷汗，忙急中生智的把双手一松，陶钵便落在了地上！砸了个粉碎，水很快便渗进了久旱的土地里。

朱锡爵早就防备了这一手，因此，当杯子向钵中伸出时，动作是闪电般地迅速，等到钵子落地，早有半杯水舀进了他的杯子。他不动声色地冷笑了两声，道：“怎么，惊慌失措啦？”

朱锡爵没等件作回答，把杯举到唇边，喝了一口水，含在嘴里咕嘟了一阵子，然后又把水吐在地上，这才逼近件作厉声道：“我一眼就看出你这里面有鬼！”

件作吓得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朱锡爵没有再理会他，转回身来把杯子递到了济南府知府徐日簪手中说：“都尝尝看。”

徐日簪喝了一口含在嘴里，然后又向下传给了别的官员。就这样一个挨一个把杯子传到最后，每人都尝了一口，杯中的水也正好尝完了。各位大员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惊奇地说道：“想不到竟有这种事！”

济南府知府徐日簪气愤地说：“这个大胆的畜牲，竟敢偷用盐水，不能饶他！”

各大员齐声赞同道：“不能饶他！”

朱锡爵这才慢慢转过身来，对左右护兵道：“拿了！”

朱锡爵怒斥件作：“你为何要暗用盐水验骨？”

件作被捆绑着，跪在地上叩头求饶说：“大人饶命，都怪小人心粗，事前没有品尝，不知此水是咸的……”

“胡说，你竟敢不从实招来！”朱锡爵一扬手道：“打，往死里打！”

几十棍子下去，这个件作就吃不消了，哭喊道：“小的要命，愿讲实情，愿讲……”

“讲！”

“不干小人的事，都是山阳县令王仲汉派家丁指派小人这样干的……”件作不得不把实情一一招认了。

朱锡爵和各位官员，重新来到了验尸棚。他吩咐护兵监督件作，前去取趵突泉之水复验。

检验结果，李毓昌顶心骨、脑门骨俱有散漫青色，左右腮夹骨俱微有青色，胸前龟子骨上截里面微青色一点，心坎骨系黄白色，两肩两肋骨俱微青色。据验，系受毒后缢死。

朱锡爵依上述检验结果，一一开列清单，摺奏皇上。

嘉庆皇帝阅案后，大为恼火，特下谕旨：

“昨江苏省王仲汉解到，当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连日熬讯。据王仲汉供认，向李毓昌商量虚增户口不允，欲行禀揭，因而谋害。又质李毓昌之家人，

供亦相符。殊堪骇异，江南竟有如此奇案，督抚大员毫无觉察，联知人不明，误用汝辈，诚联之咎。不知汝等尚有何颜上事天子，下对万民！地方偶遇偏灾，国家不惜帑金，原以救济穷黎。承办各员，自应激发天良，尽心经理，实惠及民，方不负朕母使一夫失所之意。乃迹来肖州县多有捏开假冒，私肥己囊。其查赈委员，贪图分润者，即与之通同作弊，是直向垂毙之饥民，夺其口食，已属毫无人心。不意山阳查办赈务因委员秉扶公正，不肯扶同，畏其禀揭，竟敢谋命灭口，实为从来未有之事……试思职官身死不明，显有疑窦，该地方官尚相率朦混，不为究办，若无告穷民，衔冤负屈，又岂肯尽心推鞠为之伸理。其草菅人命之事，不知凡几矣。外省官官相护，系向来陋习。今官员内有相残之事，不知究结，可见相护者，乃狼狈为奸耳！正直之员，邪佞岂肯庇护，唯有倾陷矣。着将申转李毓昌自缢身死一案各职名，查明参奏。俟奏到时候，朕降旨亦不必部议。钦此！”

军机大臣会同刑部连日审讯，在铁的事实面前，各犯不得不一一招供。

案情既白，与此案有关的官员及各犯均得到了应有的惩办：两江总督铁保与此案有牵连，革职，发往乌鲁木齐效力。巡抚汪日章老而无能，革职回籍。江宁布政使杨护，对王仲汉冒领赈银，竟未查出，查赈大员被人毒害，又不能访出究办，部议革职，留河工效力。按察使胡克家于此等重案，并不详细指驳，反复推求，草率从事，也革职，留河工效力。八名查赈委员（章家璘除外）伙同舞弊，均有分得银两，革职，追回赃银，各据银两数目不同，杖若干并处以流放。

要犯王仲汉侵吞银二万三千两，抄家立斩。知府王穀贪赃赎法，立绞。包祥、李祥、顾祥、马连升均受极刑，凌迟处死。皇上又特降旨，着李祥从京解押山东即墨，在李毓昌灵柩前挖心祭灵。

案犯惩处完毕，嘉庆皇帝又下了一道谕旨：“李毓昌委查山阳赈务，居心公正，立品端方，惨遭毒毙，情殊可悯，特恩赏李毓昌知府衔，应照四品官例给予全葬银二百两；其继子李希佐并著加恩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继绍书香，以示奖忠之意；赏给叔翁武生李泰清武举。御制悯忠诗一首，著交吉纶，俟诗碑亭光竣，镌刻碑石，以悯忠良钦此！”

不久，依照皇帝的圣旨，在即墨城西北三里地的李家莹李毓昌墓前，建起了一座御制诗碑亭。

（责编 雪舟子）



○辛
建

清末爱国爱民三壮士

一、邓世昌

邓世昌，生于1849年，广东省番禺县人，1867年考入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历任“海东云”、“振威”、“飞霆”、“致远”等舰管带。1888年，晋升总兵。邓世昌素怀忠义爱国之心，嫉恶如仇。中日甲午海战时，他多次表示要与日军决一死战的决心，以此来激励部下，深为将士敬重。1894年9月17日，中国北洋舰队在黄海大东沟遭到庞大的日本舰队的突然袭击，他率领“致远”号巡洋舰奋勇冲锋，力战敌寇，与诸舰互相配合，重创日舰“比睿”、“赤城”、“西京丸”三舰。当“致远”舰代替“定远”舰挂起北洋水师“旗舰”标志后，日舰“吉野”号发疯似地直冲而来。激战一个多小时后，“致远”舰弹痕累累、千疮百孔，船体严重倾斜，邓世昌右腿也被击伤，鲜血直流。邓世昌平生最心爱的两只军犬“阿雪”和“阿花”此时也在“致远”舰上，它们多情地跑来舔着邓世昌的伤口。邓世昌两眼凝视着这“情同手足”的义犬，解下战袍上的两颗玉玲瓏，系在

“阿雪”和“阿花”的脖子上。随后，他一跃而起，对全体将士慷慨宣誓：“吾辈从军卫国，暂与‘致远’共存亡！”一声令下，“全速向吉野撞去！”在追击时，“致远”舰又突然被鱼雷击中，邓世昌同全舰的250余名将士被掀入海中。这时，两条军犬向邓世昌游过来，咬住邓世昌的发髻，将他托出水面。“吉野”号见“致远”要与它同归于尽，已逃跑。一艘第三国的船只救起了邓世昌与这两条义犬。

邓世昌上船后，得知250多名将士已大部分壮烈牺牲（27人生还）。他乘人不备，大叫一声：“大丈夫为国而死，死得其所。”跳进了茫茫大海的惊涛骇浪之中。“阿雪”、“阿花”不见了主人邓世昌，半跪着大呼大叫，也双双跳进大海，壮烈牺牲。

二、谭嗣同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废除了大部分新政，并大肆逮捕维新志士。康有为、梁启超流亡国外，参与变法的谭嗣同拒绝了日本大使馆的援救，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于是，慷慨赴难，决心用自己的牺牲去唤醒国人。9月24日，即在北京浏阳会馆他的住所内从容被捕。9月28日，史称“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慷慨就义了。在被押赴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刑场之前，谭嗣同随手从地上捡起一块煤炭，在牢狱墙壁上写了一首绝句：

“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这首诗的第一句，引用了东汉故事：东部督邮张俭揭发宦官侯览残害百姓，罪大恶极。侯览怀恨在心，罗织罪名，反诬张俭有罪。张俭被迫逃亡，途中遇到任何人家，都能进门避难，主人也愿意冒着风险来掩护他，说明了人心所向。第二句写东汉郎中杜根，反对外戚专权，上书要求邓太后归政。太后大怒，下诏要把杜根装进口袋摔死。执法人因为同情杜根，在施刑时，并未用刀。太后派人监督，杜根装死3天，后来躲进一家酒店暂充佣人，直到太后的党羽被诛杀后，才昭雪复官。第三句表明他和维新党人推行变法，不畏强暴，宁死不屈，大义凛然的崇高气节。第四句是指康有为与他自己，即所谓“去”“留”。政变前夕，康有为预知消息，遂潜逃出京；政变时，他拒绝出奔，准备牺牲，在劝梁启超出走时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所以这句话

的意思是说，去者和留者都是顶天立地、光明磊落的。

据目睹谭嗣同就义的人回忆说：“我站在王麻子刀剪店的屋顶上，那里黑压压挤满了许多看热闹的人，脸上露出非常凄惨的颜色。头一刀是康广仁……轮到第五刀，天哪！才轮到我们的谭先生的头上。前清杀官员的刀和杀平民的刀不同，官越大刀越钝。那天用的刀叫什么“大将军”，一刀飞去，鲜血汩汩然冒出，脑袋还装在颈脖子上哩。这不叫砍头叫锯头，锯头比砍头的痛苦是要添上几十倍的。面对这痛入骨髓的惨状，第五个受刑的谭先生却一直是若无其事的样子。”

临终，谭嗣同还说：“有人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时年33岁。

三、徐锡麟

徐锡麟，1904年在上海参加光复会。1907年同秋瑾准备在浙、皖两省起义。7月6日，在安

庆枪杀恩铭，率巡警学堂学生攻占军械所，经过4小时的激战后失败，尔后被捕。

当天晚上，安庆天空阴云密布，古老的青石板小街上，一队凶恶的清兵在前面鸣锣开道。几名提着鬼头刀的刽子手，押着一个五花大绑，脑后插着标牌的中年汉子，这就是徐锡麟。在他身后跟着4名青年，也被五花大绑，脑后插着标牌。一路上，徐锡麟时而怒目大呼：“恩铭死了！恩铭被我打死了！……打倒清政府！”时而仰天狂笑：“死而无憾了！……”当他们进入刑场时，瞬间，雷电交加，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场面异常悲壮激昂。徐锡麟回头看看几名青年，大声疾呼：“学生们均不知情，你们杀我，剥我两手两足，将我全身砍碎均可，但不能枉杀学生啊！……”监斩官见状，急急下令：“开斩——。”徐锡麟就义后，刽子手们将他剖腹挖出了心肝！



爱国三壮士

故事套着故事，情在大陆；
悲歌连着悲歌，错当属谁？

一位台湾老兵回乡探亲记

张家林

早上，接到大哥从香港来的电话，说他将乘晚班飞机抵达南京，我把这个喜讯告诉正在上班的妻，又到单位借了辆桑塔纳。

赶到机场，月亮出来了。我把牌子高高举起，一位头发花白，身材削瘦的男人从门里挤出，刚挤上通道，好几双手同时向他伸出去，争着为他拿包。他摆脱他们的纠缠，奋不顾身地往前挤，冲出包围圈后，向两边瞅瞅，当他目光接触到我手中的牌子时，目不转睛地盯住我，犹犹豫豫地问：

“那是俺二弟吗？”

正宗的乡音啊，没错，我脑海里浮现出大哥寄来的相片，就是他！我扑上去，紧扯着他的手，大哥颤抖着嘴唇，咕嘟了半天，回头把一个漂亮女人介绍给我：“二弟，这是你嫂子。”

一股淡淡的香水味直往鼻里钻。

我和大哥是去年开始通信的，从未听他说过什么嫂子，背着月光看不清嫂子的脸，但我感觉到这是个颇有姿色的女人。我真为哥哥高兴。

车启动后，大哥首先问起



少小离家老大白 任继明 摄

了母亲,我说她还在老家。其实母亲已经过世了,为了不使他难过,我们一直瞒着他。他又问起了父亲,我说:“老人家天天想你,都快想疯了。”

“他还在无为?”

“在我那儿住了两个月,没等到你,又回皖东老家了!”

大哥把手在膝盖上重重地一拍:“明天就去老家。”

“经过夫子庙吗?”嫂子问小司机,声音很低,我却听见了,抢着说:“不经过。有事吗。”

“一位朋友托我问问,随便问问。”嫂子掠掠在耳边的头发,显得漫不经心。

车到无为,一家都在候着。

吃了饭,妻打开靠里间的房门,灯一拉,满屋生辉,迎门半截柜上,神气活现地蹲着一台彩电,一束蜡制的茶花在花瓶里怒放着。一部国际直拨猩红电话卧在组合柜上,一位台湾女歌星手捏话筒站在挂历上唱着一支无声的歌。猩红的地毯,淡绿的窗帘,天花板上吊着数不清的小灯泡放射出十二彩光,四壁壁灯闪闪灭灭,一切都在静静地等待着两位来自远方的贵客。

“说是大陆穷,蛮好的么!”嫂子坏顾屋里的摆设,发出感叹,大哥马上附和:“确实蛮好。”

妻悄声对我说:“你大哥是不合格的丈夫。”“何以见得。”“我注意了,刚才吃饭,你嫂子不吃甲鱼,他偏要往人家碗里送。连自己老婆口味都不晓得,还算丈夫呀。还不

是跟你一样,成天在外鬼混。”

“去你的!”

门拉开一道缝,大哥问女儿,洗澡间在哪。女儿说:“只有厕所,没有洗澡间。”大哥回身跟嫂子汇报,没听见嫂子的反映,倒听见大哥那怯生生的声音:“真对不起……”门没关严,我听得真切。真为他脸红,堂堂男子汉跟老婆说这种话。

正说着,大哥又钻了回来,回头把门轻轻带上,妻以为他需要什么,大哥吞吞吐吐地说:“我想今晚跟二弟睡,好好聊聊。”

妻说:“有多少话,明天不能说?”

“难得回来一趟,满肚子话一年半载也说不尽。”

等一家人睡下,大哥才把门栓上,瞅着我问:“跟我在一块睡,你可怕怕?”

“怕什么?”

他脱下衣裤,我这才发现他的左腿是假的,这我不吃惊,他来信时说过,那是在金门海面上被炮击时留下的纪念。

“疼吗?”我问。

“刚装的时候疼,现在好了,磨出了老茧,不痛了,只是天阴时还有点不自在。”他裂开嘴,嘿嘿地笑,“这也方便,等于带上了气象台。”

我俩挤在一张小床上,满以为他真有几箩话要说,谁知刚刚躺一会儿,他便呼呼地进入了梦乡。一定来大陆之前,激动得几天几夜没有合眼,太疲劳了,让他睡吧。

公共汽车行驶在一望无垠的大平原。车子进入阜阳地区。阜阳是皖北的边城,密

如蛛网的脚手架,高低错落的楼群,红红绿绿的广告,一切正在开始。

满耳的乡音,连接不断的小吃摊点,使大哥激动不已,喃喃自语:“回来了,我回来了!”

迎面摊子上坐着一把特制的大壶,怕冷似地被厚厚的棉絮包裹着。

“油茶。”大哥眸子一闪。

这种味道极鲜的风味小吃,融花生、芝麻、粉丝、黄豆为一炉;每次回乡,我都要美美喝上三碗。离乡四十多年的大哥竟一直惦记着它。

要不是陪大哥来,我怎么也想不到,安徽的一个不大的城市竟有一百元一夜的房间。席梦思、沙发、彩电、空调,一应俱全。一踩上地毯,嫂子变得亢奋起来,一头扎进洗澡间,自来水哗哗淌。看来她已把自己泡上。我迟疑片刻,转身欲走,大哥叫住我:

“你住哪?”

“对面。”

洗了脚,刚要上床,有个人推开门:

“张先生,有人找。”

一个人影站在门口,裂着嘴笑眯眯我,是大哥!

我心里一热:“你怎么晓得我住这……”

“明天就要见到父亲了,睡不着,还想聊聊。”

等他躺下,我起了个头:“你来这儿,嫂子没意见?”

“她睡了。”

拉灭了灯,他开始聊。从二十岁当兵,说到糊里糊涂跟一群国民党散兵开赴黄埔江边,一船到台湾;从金門受训

当水兵讲到对亲人的思念……

“想家呵，半夜里，有时突然惊醒，好象看见父亲站在床边瞅我，吓得我起一身鸡皮疙瘩……”

四周一片寂静，窗外的墙根下，秋虫在低声吟唱，伴着大哥诉着一腔苦水。借着对面窗口的灯光，我看见大哥的眼里闪着泪光。

“别说了。”我想把大哥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打断了他，又回到嫂子专题上：“大哥，我总觉得你和嫂子的关系，”正想说，“不太正常。”觉得不妥，舌头一转，成了：“太好了。”

“当然罗，她不吃甲鱼，你一个劲地往她碗里丢，买项链，你俩争着付钱，一家人这么客气，不好吗？”

“好，好，确实好。”大哥的脸腾地红了，吱吱唔唔。我趁热打铁：“你们成家几年了？怎么象刚谈恋爱似的？”

大哥无路可退，沉默了好半晌，终于老实对我说：“二弟，既然你看出来了，我也不瞒你了，你嫂子，是我租的。”

如果不是躺在床上，我会惊奇得跳起来，这简直是海外奇谈。

大哥说，在台湾有成千上万个老兵，扛了大半辈子枪，到头来仅领到糊口的饭钱，哪还能娶上老婆，象他这样半条命的人就更别指望成家了，本来，他只想客死他乡算了，谁料到竟盼来允许他们回家探亲的这一天，大哥欣喜若狂，拖着一条腿四处找活干，进山帮农人拔草，到煤气公司打戳子，沿街箍木盆。省吃俭用，

连烟都舍不得抽，想攒点钱回大陆探亲。但又怕形影孤单给亲人增加痛苦。正犯愁，见街头一幅租新娘的广告，专门为象大哥这样的独身老兵服务。

“她家还有什么人？”

“不清楚，地址保密。她说她叫云霞，估计也是假的。我们在台湾就订了合同，租她二十天，路费，吃住，全由我包，回去结帐。”

大哥好象有些得意，我却为他羞愧，不好意思看他，把脸转向窗外，大哥以为我在心疼那几个钱，开导我：“有什么法子呢？父亲苦了一辈子，盼一辈子，我要赤条条回来，老实的父亲不一头撞死才怪哩。我是花钱买得老人笑哟。”

他斜靠在床帮上，默默无语，昏黄的灯光斜照着他。我原以为大哥生活在人间天堂，没想到他竟如此孤独、悲凉，原以为他有数十万台币的积蓄，没想到竟这样的寒怆。而这些，从未在信中吐露半句，却把巨大的悲痛深埋在心中。

“我们已经讲好了，在乡下那几晚住一块，有几晚算几晚。”顿了一下，他央求我，“二弟，见到父亲，千万要帮我演好这出戏，不能露馅。”

大哥的眼望着窗外，象在寻找小时候捉鱼的河沟，牧羊的草地。

汽车在小石桥边停下了，一群穿红着绿的娃娃蝴蝶般地从小屋里飞出，骨碌着一双双惊奇的眼直往车里眺。

桥上站着驼背三弟。认出是我便朝汽车一拐一拐地

跑来。

听父亲说过，大哥上学时候老是欺侮三弟，就是因为他是驼子。路上，大哥还提及此事，仍感到自责。

嫂子象打量外星人一样瞅着三弟，那神色显然是对我家族的蔑视。她欠了欠身子，很有礼貌地说：“对不起。来麻烦你们了！”

头回见面，我对嫂子这种语调，这种动作，感动得眼圈发热，而现在，却分明看到一个憋脚的演员，在干巴巴地念台词。

正说着，父亲被簇拥着出现在门口。几个月不见，父亲显得苍老了许多，两肩下垂，面颊消瘦，一双失神的眼睛朝这边望着。

大哥叫了一声，扑上去，紧紧搂住父亲的双肩。

父亲左手拉着大哥，右手不停地在他的面颊上抚摸，接着再摸胳膊和手，嘴唇不停地抖动。

“魂，可是家勇的魂回来了？”

“爹，我是家勇哪！”

“到底回来罗，到底回来罗。”

泪水爬满父亲苍老的面颊。

当父亲的目光越过大哥的肩膀看见我身后的女人时，浑浊的目光突然象闪电似地一亮。

大哥这才意识到嫂子的存在；把她叫到父亲跟前：“爹，这是你的儿媳云霞。”

父亲不知所措了，分明想笑，但眼睛却定定地瞅着这描着眉，打着口红的女人。

“你妈，要能撑到今天就

好了……”父亲忽然冒出一句。

“母亲呢？她怎么啦？”大哥眼珠发直。

父亲抽泣得说不出话来。

我这才神色惶然地告诉大哥：“一直没敢告诉你，母亲半年前就去世了，她是喊着你的小名，捧着你的相片走的……”

大哥受到第二次感情波涛的冲击，半天才冲着我

说：“二弟，为什么瞒着我？”

吃饭的时候，刚端起碗，父亲不知上哪去了，只听见他的小屋里传出咕冬声，我走过去，见他把床挪到一边，弯着腰用镢头刨土，细小的灰粒在一束光柱里飞舞。刨了一会，蹲下身在泥土里掏，竟掏出一个黑黝黝的罐子，罐口用油布扎得严严实实，他用袖子拂去上面的浮土，捧到亮处，小心翼翼地

将油布打开，伸出一只布满青筋的手，摸索了半天，取出两只黑圈圈，憨笑着：“还在。”

父亲撩起衣襟，蘸着口水

把两只圈圈擦了擦，竟被擦得绿晶晶，亮闪闪的。一副漂亮的手镯。

大哥七岁时，母亲就给他订了一门亲，这镯子是留给未过门的媳妇的见面礼。大哥一走，渺无音讯，手镯也深埋地下，母亲临终闭眼还说：“谁也不给，留给大媳妇。”

“来，戴上试试。”父亲颤

抖地捧着镯子，望着嫂子。嫂子拿眼瞟瞟大哥，那神情分明在问：“能戴吗？”“戴戴看。”大哥把手镯递给嫂子。

镯子套在那双藕白粉嫩

的手腕上，一只金灿灿的戒指发出刺眼的光；大哥用手摸摸镯子，说是真玉，这一副在台湾少说得十万块。

东西村，前后村来了不少男女老少，屋里挤不下，溢到院子里，板凳不够，蹲到墙根下，一个脸膛方正的汉子隔着人墙吼：“老大，可认得俺啦？”跳进来伸手扳住大哥的双肩。大哥眯眼看看，摇摇头，那汉子说：“俺是铁头，忘啦，那年发水，咱俩下河捉鱼……”

嫂子完全进入角色，每来一位客人，父亲先介绍：“这是你叔。”“那是婶子。”嫂子只管点头，其实一个也没往心里进。搬凳子，倒茶，递烟……

东村的沈老伯是父亲的老朋友，进门就把眼珠子拴在大嫂脸上：“啧啧，你瞧老大家的，多嫩生，多排场。”回头瞅瞅大哥：“你是咋找的？”

大哥心虚，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她嫂子多大啦？”沈老伯咨询开始。

“四十二。”

“哟，象是二十多岁的大闺女哩。”沈老伯瞅瞅我，“比老二家的还嫩生。”

“中看，中看，”沈老伯踱过来，背着手象检阅仪仗队似地，看了阵问父亲：“可放鞭炮？”

“放，放，”父亲应着，“还放电影。”

浓厚的乡音，不知嫂子可懂，只是望望这张脸，瞅瞅那张嘴，闷声坐着，偶尔淡淡一笑。

有人问他有几个孩子，是男是女。

嫂子说：“一个男孩子。”“侄子叫啥？”

“成龙。”嫂子说。

父亲板着指头一算：“岔了岔了，该是‘银’子辈。”当场指示，要大哥回去给儿更名，“啥都能放开，这辈份万万乱不得！”

夜里，我跟父亲睡牛屋，他不停地打嗝，说这半年胃老不舒坦，问他为啥不上我那儿查查，他说怕给我增加负担；这回可以去了，大哥出钱。

我脸对着墙卷曲着身子，听着父亲的叨叨，心里却想着大哥。这一夜，他是怎样度过的？

大哥事后告诉我，那天等我们都睡了，嫂子“嘎叭”拴上了门。“噗”的一声把灯吹灭了。

大哥坐在床沿上，摸了摸薄薄的被子说：“就一床，不好睡。”

“将就点吧。”嫂子捉住大哥的手，“我不能对不起你。”

大哥的脑袋轰了一声，涨得比斗还大，还空。在他发愣的霎间，嫂子将胳膊搭在他的肩上；温暖，柔软的感觉告诉他，嫂子已把衣裳脱了。要是倒回三十年，他也许会猛扑上去，紧紧地搂住这黑暗中的女人，而现在，他已年过花甲，兴奋，激动，狂热早已不属于他。他只觉得一股热乎乎的东西在面颊上爬，爬到嘴里，咸丝丝的，那是自己的眼泪。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时候，自己竟如此伤感。

嫂子用手掌轻轻地为他拭去泪水。大哥不愿脱衣服，想到自己是一条腿的废人，用

胳膊死死护着衣襟不放。

大哥用尽力气挣扎着下了床，从床下摸出一张小方凳说：“我就坐这里，你睡吧。”

大哥等自己恢复了平静，轻声问：

“你家在台湾哪里？”

“台北桃园。”

“桃园什么地方。”

“平镇乡。”

“平镇？我有个朋友。”

“叫什么？”

“能兵，余能兵。”

嫂子的心象被钢针猛扎一下，陡然一惊，那正是他丈夫的名字，不会吧，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她极力掩饰着内心的惶恐，问大哥：“你们在哪认识的？”

“在金门当水兵的时候。”

他是和余能兵一道护送一个从美国培训回来的特工回大陆潜伏的。

在离金门不远的海面上，遭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击，炮弹落在小艇四周，激起冲天水柱。

那时，他年轻，凭一身好水性牵着艇上腾翻空；隐约，能兵在哪儿叫他，他刚张口，只觉得自己身体内发出一串断裂的脆响，顿时失去了知觉。

几天后，他在医院醒来，才知道弹片使他失去了一条腿，是能兵用救生圈把他送上了绿州。

后来，他听说，能兵退役后在台东的码头上干装卸，他去找他，没找到，有人说能兵把老板的女儿拐跑了，可能在桃园。他去桃园，又扑了空。

黑暗中，传来嫂子的嚤嚤

的哭声。

“你怎么啦？”大哥把一只手伸过去。

嫂子一把抱着大哥的手，泣不成声地说，她就是能兵的妻子，那个鱼行老板的千金。

大哥一阵晕眩，他决不相信这是真的。

嫂子取下挂在脖子上的项链，上面坠着一块心一样的妆饰品，里面有个男人的相片，大哥打着打火机，果真是能兵，他的心格登一下。

“能兵，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

嫂子把湿漉漉的手掌合在大哥的嘴上。

等我起来，太阳已挂在树梢上了。大哥站在霞光里刷牙。父亲问嫂子呢，大哥说还在床上。父亲吩咐叫嫂子起来吃早饭，好去给母亲上坟。

“你妈走时老念着大媳妇，让她去看看，你妈也会闭眼的。”

正谈着，嫂子已出现在门口，眼里布满了血丝，深塌的眼窝，象两个黑沉沉的坑。

坟园在离村不远的荒坡上，宛如馒头的坟丘中间，稀稀拉拉地立着几株松树，附近有条水沟，沟边有一片灌木丛，团团黑色的鸟窝，有几只老鸦缩着脖子站在坟上朝我们这边叫。

父亲指着坡底的一座土坟给大哥看，大哥还没到跟前，叫一声“娘！”卜通跪倒了，“来迟了，来迟了！”泪水刷刷往外淌。

嫂子跟着跪倒，两眼定定地望着坟头，忽然往后一仰，竟晕死过去。

大哥象钉打的楞鸡一样

木呆呆地跪在那儿，泪水凝固在面颊上，直到父亲吼着问：“家勇，俺媳妇是啥毛病！”大哥象从梦中惊醒，嗫嚅着谁也听不清的话。

嫂子的牙齿咬得咯吱响，卷曲的右手指指衣袋，我以为里面有急救药品，将手伸进去，摸出一张纸条：

“象征性癫痫，切人中、鱼腰。”

嫂子舒了口气，慢慢地苏醒，眯着两眼望着天边的乌云，望着四周一张张黝黑的面孔，痴迷的目光定在大哥脸上：“能，能兵……”

当时我不知能兵是谁，大哥说他在台湾起的别名。

父亲问大哥：“这是咋弄的？家勇，咋不给她治治？”

大哥搓着手，连连喏喏：“治，治。”

父亲愣愣地瞅了许久，站到母亲坟前，暗哑着嗓子说：

“家勇他娘，我晓得你在显灵，显啥呢？儿子回来看你，还带回来个忒好的媳妇，你把她吓成这样。家勇娘，你这是弄啥呢？你！”

回到家，我感到很累。刚想坐下歇歇，三弟站在牛屋门口叫我：“二哥，你来一下，爹在等你。”

天阴沉沉的，牛屋里光线更暗，父亲铁青着脸坐在一堆牛草上。三弟指指门，没等我坐下，便问：“嫂子究竟有啥毛病？”

“不晓得。”我看出三弟的疑心，再看父亲的表情，估计他俩交换过看法了，便替大哥掩饰：“有病不要紧。不是说到无为市查查吗。爹也去，一起查。”

三弟把咬在嘴里的一截草梗往外一吐：

“我看，这里有名堂。”

他说他这几天一直叫三弟媳妇盯着大嫂，注意观察她的一举一动，下午，大嫂上厕所，弟媳妇陪着，两人说起了大哥那条腿，弟媳妇叹了口气：

“也不知俺哥的腿咋样了？”

“腿？”嫂子发怵。

弟媳妇也一愣，这么大的事，她不知道。

嫂子毕竟是训练过的，马上随机应变：“差不多好了，全好了。”

“好了？”弟媳妇不明白一条断腿怎么会好。

嫂子自作聪明地解释一番：“象大哥那种风湿性关节炎，台湾不少老兵都有，好治。”

弟媳妇直纳闷，一个结婚十来年的女人，竟不知道自己丈夫是一条腿的残疾人。她在地头找到三弟，把这件事一说，三弟简直惊呆了。夫妻俩坐在地头做了种种设想，也想不出个头绪。三弟又说给父亲听，父亲眨巴着眼，不知想什么。

“那，嫂子昏倒在坟地里，大哥咋连她得的啥病都不知道？嗯。”三弟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我的脸，“我问了后庄老医生，人家说那种病少说有十年了。老夫老妻，能不知道？”

我还想替大哥解释，父亲把手一挥：

“去，叫你大哥来。”

医院要父亲做胃镜，方可确诊。

做胃镜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

我把大哥叫到门外，问是不是请嫂子来陪陪。做胃镜前，父亲还在惦记着嫂子的病情，如果她站在父亲面前，那怕一会儿，也许能为老人减轻些痛苦。

大哥沉吟片刻，缓缓地说：“我说过了，她不会来的。”

“我再去叫她。”

我跟妻说起父亲被那根软皮管折磨的惨状，妻很焦急：“要不要我去。”我说：“你在家做饭，最好请嫂子……”嫂子木然地摇摇头，说了句什么没听清，意思是说坐长途车，身体到现在没有恢复，她不愿去。

嫂子两眼木然地瞅着我：“我不能去医院，怕晕倒，真的。”

我抑制着满肚子火，寻找着即刺激又不失身份的语言，但一句也找不出，想起她在墓地里要死不活的样子，我手一挥：“不去算。”抽身欲走，她叫住我：“二弟……”

“到医院问问你哥，我的返台证件在哪？”

我这才注意到，房里的床上，柜子上摊着翻开的大包小包。我扶着门柜，问：“不多住几天。”

嫂子半天才吐出一句：“我，还是不去好。”

经切片检验，确诊父亲患了胃癌。

听到这个消息，大哥象挨了一榔头，立在走廊上半天没动。我把他拉到长椅子上坐下，他把那条假腿笔直不打弯地伸到我面前，我感觉到那条

腿在打颤颤。

“她愿来吗？”

我把脸转向一边，装作没听见。

大哥说：“我说她不会来的。”

我腾地站起：“再去叫她，不来不行。”

“你就是给她叩头她也不会来的。”

“给她加钱，来一趟一百美元。”

“屁用。她母亲也是患的胃癌……在医院，老人要吃元宵，她上街去买，等回到病房，老人家已咽了气，她扑在床前，昏死过去……打那起，就得了这种病，一遇刺激就犯……”

“你怎么知道的？”

“那天从墓地回来她对我说的，还说她最怕触景生情，看到坟，就想到自己母亲。她说她对不起我，订合同时，也没有讲清楚……”

走廊很深很暗，夕阳把最后的光和热从走廊尽头的窗口斜射出来，怪可怜地摊在水泥地上，斑斑点点，就象一块块发黄的金币。我眯眼望着，忽然，金币碎了，消失了，两只穿高跟鞋的脚从“金币”上踏过；我抬起头，见一个瘦弱的身影正一步步朝这边走，在一位穿白大褂的护士面前停了一会，问了句什么，继续往这边移动，象一幅剪纸，边上蹑着一层浅浅的光亮。是嫂子。

她披着一件翻领束腰的风衣朝我这边走来。到了跟前，大家才有所觉察，慌忙站起：“怎么不在家歇歇？”

我瞥了嫂子一眼：“人家

是来取返台证的。”

“在高低柜第三个抽斗里。”

“不，不，”嫂子的脸微微发红，“我是来看父亲，听说他老人家……”

父亲躺在病房里，微闭着眼。

“爹，云霞来看你来了。”大哥俯身说。

父亲吃力地把脖子扭过来，两眼骤然一亮。

“爹……”

嫂子的声音柔柔的，我听得一清二楚。她凝眸注视着父亲，眼圈里红红的，是同情？是悲哀？还是想到自己的母亲？我把一张方凳塞到她的身后。

她扶着床帮慢慢坐下了，胸脯起伏了一阵，渐渐缓过气来，翕动着嘴唇：“爹，保重……”

父亲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久久凝视着嫂子，饱含深情的眼睛里，竟溢出一片温柔的光。

父亲从被子里举出那只满是皱纹的开裂的手，这是怎样的一双手啊：十根指头握不拢，伸不直。

嫂子的手没递过来，大哥却把手伸了过去，紧攥着父亲的手，侧着脸聆听着父亲那从喉咙里发出的声音。

“在外，好好过……老了，回家乡；这里，东西便宜。鸡，一块八……”核桃皮似的脸皱成一团，似乎想笑，但终究没笑出来，眼角却挤出清亮的泪珠。

空气浑浊，不能久留。我劝嫂子赶快离开。

大哥在门口说，他决定多住些日子，等父亲手术后再走。那一夜，我和大哥一起陪着父亲，他把一切告诉了我。第二天晌午，女儿跑来说嫂子不见了。我飞快赶回去，见床头柜上嫂子的蛇皮包不见了。我问刚下班的妻，她说不知道，想了想，说起她昨夜陪嫂子睡觉的情景，半夜里，听见嫂子在呜咽，一摸，枕头湿得透透的。不等妻问，嫂子说她梦见了她的儿子阿飞，临分手时，阿飞抱着她的腿，不放她走，她哄了他，说妈妈要上大陆看奶奶，认好路再来接阿飞。阿飞还是不肯放手。她买了只大熊猫往阿飞怀里一丢，头也不回地上了计程车。透过车后的玻璃，她看见阿飞张着手朝她乱划，声音一点听不见。

她说阿飞在叫她，她要回去。

我心里乱糟糟的，浑身象有一团蚂蚁在爬，说不出有多难受。一扭脸，我发现被子下露出一只信封，旁边的蓝手帕里，包着那副绿晶晶的手镯。

信是写给大哥的。我在医院楼下把信交给大哥，他表情木然，慢慢把信展开：

家男：

真对不起，我不辞而别了。能兵在台等我，约好后天在桃园机场见面，还有阿飞，我想他。……我这样做是没办法，是为能兵集攒路费，好让他明年也回大陆跟亲人团聚。……我提早一天走，想到南京夫子庙打听打听，他家有什么人……结

帐时，你把这一天扣了，还有在乡下的几晚，不能让你付……

一种毫无准备的感情潮水涌上来，涌上来。大哥眼圈红润了……

欢迎订阅《党员文摘》

《党员文摘》是由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主办的、全国公开发行的综合类文摘月刊。《党员文摘》博采众长，雅俗共赏，能满足不同层次的读者需求，党内外读者皆宜。

《党员文摘》为16开本月刊，国内统一刊号：CN—1117/D，从1994年起每月订价1元，全年12元。

《党员文摘》由中共重庆市委当代党员杂志社自办发行。省外读者或订数较多的单位，可直接将订刊款邮汇或信汇至中共重庆市委当代党员杂志社出版发行部。

地址：重庆市中区枣子岗
垭村1号

电话：364393 352616

邮编：630015

开户银行：重庆市工商银行上
清寺分理处

帐号：217——14434364

陈独秀诗

任建树 靳树鹏 李岳山评注

存歿六绝句

(1911)

伯先京口夸醇酒，孟侠龙眠有老亲；
仗剑远游五岭外，碎身直蹈虎狼秦。
(存为丹徒赵伯先，歿为桐城吴孟侠。)

何郎弱冠称神勇，章子当年有令名；
白骨可曾归闽海，文章今已动英京。
(存为长沙章行严，歿为福州何梅士。)

央公说法通新旧，汪叟剧谭骋古今；
人世莫尊小乘佛，论才恻惜老成心。
(存为寿春孙少侯，歿为徽郡汪仲尹。)

老赞一腔都是血，熊侯垂死爱谭兵；
蜀丁未辟蚕丛路，淮上哀吟草木声。
(存为霍丘郑赞丞，歿为正阳熊子政。)

谷子生前为诤友，彤侯别后老诗魂；
冢中傲骨成枯骨，衣上啼痕杂酒痕。
(存为歙县江彤侯，歿为绩溪章谷士。)

曼殊善画工虚写，循叔耽玄有异闻；
南国投荒期皓首，东风吹泪落孤坟。
(存为广州曼上人，歿为同邑葛循叔。)

* [伯先]又名赵声(1881—1911)，近代主革命家。江苏丹徒(今镇江市)人，同盟会重要领导人之一。1911年4月，与黄兴领导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呕血病逝于香港。

[孟侠]近代民主革命烈士吴越(1878—1905)，字孟侠，安徽桐城人。1905年9月24日在北京正阳门火车站谋炸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而壮烈牺牲。“碎身直蹈虎狼秦”即指正阳门暴烈事。

[龙眠]山名，在安徽桐城西北，与舒城、六安接界。以山中有二龙井，故名曰龙眠。此以龙眠代指安徽桐城。

[何郎]即何梅士，与陈独秀交谊颇深，1904年

因脚气病死于东京。

[章子]即章士钊(1882—1973)，字行严，号秋桐，又号孤桐，湖南长沙人。

[令名]美名。

[央公]即孙少侯(1873—1924)，名毓筠，别号央(音快)公，安徽寿春人，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后，任安徽第一任都督。后于1915年与杨度等组织筹安会，任副会长，公开鼓吹帝制。1924年病歿于河南开封。

[剧谭]流畅的谈吐，引伸为畅谈。

[入世]谓投身于社会，关心世事。

[小乘]佛家派别之一。

[老赞]郑赞丞(?—1914)安徽霍丘人，民主革命志士。曾与陈独秀、柏文蔚等发起组织青年励志学会，办藏书楼，组织演说会。1907年后对江皖粤革命势力的联合颇多贡献。辛亥后曾任安徽内务司长。1914年歿于东京。

[熊侯]熊子政，安徽正阳关人。

[蚕丛]指蜀地。李白《送友人入蜀》：“且说蚕丛路，崎岖不易行。”

[谷士]章谷士，安徽绩溪人。毕业于南京路矿学堂，与鲁迅同学，又是陈独秀办《安徽俗话报》时“朝夕晤谈的好友。”

[彤侯]江彤侯，名江纬，号一木，安徽歙县人，是陈独秀1906年秋任教于芜湖皖江中学时的好友。民国成立后，任安徽教育司长，二次革命失败遭通缉。

[衣上啼痕杂酒痕]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何处不销魂。以身合是诗人来？细雨骑驴入剑门。”将其首句改一字，化用贴切。

[曼殊]苏曼殊。祖籍广东香山县，1884年生于日本横滨，后在广州为僧，善诗画，1918年死于上海。

[循叔]葛循叔，安徽怀宁人。

[投荒]贬谪、流放到荒远之地。这里指1904年夏，苏曼殊效法唐高僧玄奘，只身步行跋涉，历时一年，经越南、老挝、缅甸等国，到泰国曼谷，再赴印度朝圣的事。此行至锡兰，因故返国，原拟计划未全部实现。

这首《存歿六绝句》陈独秀作于居杭期间。当

他回顾自己的革命历程时,十分怀念那些曾与自己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世事沧桑、人生难料。他们有幸有殁。于是,对存者的缅思,对死者的怀念,乃化作澎湃的诗情。

每首绝句,以奇数二句怀念一友,以偶数二句歌颂一友,言辞简约,音律和谐。诗人在这里所歌赞的不仅是自己的挚友而兼战友,而且都是“有道德,有诚意,有牺牲精神,由纯粹之爱国心而主张革命”的仁人志士。这六首曾在革命者中广为流布。直到五十年代,有一次章士钊见到周恩来时,因“偶及小事”,周恩来对它仍能背诵,一字不误。

告少年(1939)

太空晴无际,昼见非真形。
众星点缀之,相远难为明。
光形无所丽,虚白不相生。
半日见光彩,我居近日星。
西海生智者,厚生多发明。
摄彼阴阳气,建此不夜城。
局此小宇内,人力终难经。
吾身诚渺小,傲然长百灵。
食以保躯体,色以延群生。
逐此以自足,何以异群生。
相役复相斫,事惯无人惊。
伯强今昼出,拍手市上行。
旁行越邻国,势若吞舟鲸。
食人及其类,勋旧一朝烹。
高居万民上,万民齐屏营。
有口不得言,伏地传其声。
是非旦暮变,黑白任其情。
云雨翻覆手,信义鸿毛轻。
黄金握在手,利剑腰间鸣。
二者唯君择,逆死顺则生。
为恶恐不足,惑众美其名。
举世附和者,人头而畜鸣。
忍此以终古,人生昼且冥。
古人言性恶,今人言竞争。
强弱判荣辱,自古相吞并。
天道顺自然,人治求均衡。
旷观伊古来,美恶常相倾。
人中有鸾凤,众愚顽不灵。
哲人间世出,吐辞律以诚。

忤众非所忌,坎坷终其生。
千金市骏骨,遗言觉斯民。
善非恶之敌,事倍功半成。
毋轻涓涓水,积之江河盈。
亦有星星火,燎原势竟成。
作歌告少年,努力与天争。

作者原注:[伯强]古传说中的大疫厉鬼也,以此喻斯大林。近日悲愤作此歌,知己者,可予一观。

[告少年]何之渝致胡适信称:“这首诗,是陈仲甫先生在四川江津鹤山坪听见史大林和希特勒签订了‘德苏协定’的消息,那正是一个无月的黑夜,他‘有感而作’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于1939年8月23日,可知此诗约作于1939年8月底或9月初。

[西海]指西方世界。

[厚生]使人民生活丰厚富足。

[屏营]惶惧的样子。

[千金市骏骨]比喻招揽人才的迫切。战国时期燕昭王的谋臣郭隗曾用马为喻劝燕昭王广招贤才,说古代有位君王悬赏千金买千里马。三年后,得一死马,以五百金买下马骨。于是,不一年又得到三匹千里马。此处诗人以骏骨自喻。

这首五言古诗计350言,是陈独秀晚年诗作中最长的一首。诗人以睿智深邃的辩思阐明自己的一生见解:人生于浩茫的宇宙空间,虽然囿居狭窄,躯体渺小,却是百灵之长,应该有所作为,决不能满足于食色保命延种,混同群生。近而指出人类相役相残的阶级斗争是必然现象,而强权政治专制制度尤其不能容忍,因为人类不能永远生活在黑暗中。这里,诗人对强权政治的种种表现做了细致入微的刻画与诛讨。其情感之愤懑,言辞之激烈,态度之峻苛,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绝决地步。最后,他指出善恶的斗争,古今一以贯之,呼唤少年们毋轻涓涓水,毋弃星星火,要奋勇斗争。

赠刘海杰联(1935)

行无愧忤心常坦;
身处艰难气若虹。

刘海粟先生称:1932年10月,陈独秀被捕,关押

在国民党南京监狱中。1935年秋,我刚从欧洲回来,见到蔡元培、杨杏佛。他们想去监狱看望陈独秀,但又不便去,就跟我谈,你是无党无派,你去吧!我是通过段锡朋的关系去的。见到陈,紧握他的手,说:“你伟大!”他说:“你伟大,敢画模特儿,和封建势力斗。”还大声抗议,说:“蒋介石要我反省,他倒要反省。”陈在狱中没有郁郁不乐,很自然,有气派。我说到我在法国开画展的情况,他听了很高兴。我们谈话约一个小时,门口站着特务。临别时,我请他题字留念。他写了这幅对子。在十年浩劫中,我把它辗转藏匿,才得以保存了下来。(1985年10月2日,任建树访问刘海粟于上海衡山饭店时的谈话记录)

这幅对联,真实表现了陈独秀虽身陷囹圄,却胸怀坦荡、情绪昂扬的风骨。它是一幅自画相,画出了诗人、革命者的自信、自尊和自重,令人崇敬激赏。

寒夜醉成

孤桑好勇独撑风,乱叶颠狂舞太空。
寒幸万家蚕缩茧,暖偷一室雀趋丛。
纵横谈以忘形健,衰飒心因得句雄。
自得酒兵鏖百战,醉乡老子是元戊。

[衰飒]枯萎、衰落。

[元戊]主帅。

这首七言律诗,首联以孤桑自喻,说自己在大风中沐寒搏击。颔联写寒潮使万家瑟缩,只有自家温馨照暖吸引宾朋知友来聚。颈联写大家纵谈畅叙,无所顾忌,吟哦咏诵,巧构诗章,得句雄奇,适以宽慰衰飒的心绪。尾联写醇酒自醉,依旧心雄万夫。这首《寒夜醉成》是抒愤之作,表现了诗人在黑暗反动的重压之下,在贫困蹇滞之中傲然挺立、纵横恣慨、诗酒自慰的心态。

(责任编辑:刘家驹)

编后记:

陈独秀的诗,上继诗骚的优良传统。又不为传统所囿,新意纷陈,具有近现代诗的一流品格。任建树、靳树鹏、李岳山三同志对陈独秀素有研究,著述甚丰,他们编注的《陈独秀诗集》,亦是历经十多年艰辛的搜集,遍访陈健在的朋旧,或已谢世的故人的晚辈,并查阅了大量有关史料,对诗的真伪做了严肃认真的考订,所收陈诗之全在海内外还是首次。此书将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寒夜醉成]是陈独秀晚年诗作,写于流寓四川江津时期。

[孤桑]特立的桑树。此为诗人自喻。



陈独秀(左)与彭述之(右)在上海

鄂、湘、黔即景

诗十二首

(1993年11月27日)

三峡工程

一
两岸石如壁，
一水走千里。
拦腰断大江，
工程世界稀。

二
平湖随坝起，
水阔养鲟鱼。
安土不虑灾，
城乡遍光辉。

三
壮哉三峡人，
必成志已立。
恩泽惠百代，
功绩万年垂。

巴东县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土家喜建吊角楼，
傍水依山三五户；
住地嵯峨相去远，
巧对山歌互问候。



建始县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深山峻岭多奇花，
土家么妹尽人夸。
自择夫婿结同心，
良辰山行到婆家。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十周年庆典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一日)

○布 赫

人涌疑山动，
车行如水流。
高阁旌旗展，
街头立彩楼。
银鹏掠空过，
仙女天际游。
十年容颜改，
欢笑遍恩洲。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篝火晚会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四日)

一进苗寨暖如春，
敬酒献歌情至诚。
篝火旺时鼓舞起，
笑掷草标娱来宾。

湘泉酒厂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五日)

龙凤汲水日夜忙，
厂家满院醇醪香。
休怪“酒鬼”取名怪，
饮者知味竞来尝。

吉 首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五日)

登上一心阁，
尽览吉首城。
山间甘桔黄，
松枝鸟声频。
江边冬菜绿，
水流发清音。
婷婷姊妹山，
高耸入云层。
矮寨路蜿蜒，
行车在半空。
湘地景如画，
游人任哦吟。

长沙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七日)

苍松翠柏拥岳麓，
湘水环抱桔子洲。
三楚自古多名士，
谁人能及毛与刘。

贵州安顺王若飞 同志故居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壮志补瓯解民悬，
塞北江南历艰险。
身陷狴犴伸大义，^①
浩气凌空昭人间。

蜡染厂

琼笔绘就人间美，
褐络经染胜罗绮。
星娥不及山乡妹，^②
窈窕回宫弃素机。

黄果树瀑布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珠帘百丈天际垂。
清水碧地见行鱼。
危岭雪崩滚滚下，
浪非柔云任自飞。

龙宫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结伴过瑶池，
登舟游龙宫。^③
泉水泠泠下，
灯火相映红。
瞬间观万象，
须臾贤千景。
溶洞神秀聚，
惊叹造化功。

①狴犴指牢狱

②星娥指织女

③旅游点

贵州
李元奇 摄



艾黎与洪湖

○黎 白

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和社会活动家路易·艾黎已经离开我们几年了。

我知道路易·艾黎很早，但和他见面并且在一起生活工作了一个短暂时期，却是在1963年，地点是鱼米之乡的洪湖县。艾黎对洪湖很熟悉，早在1932年，他就到过洪湖。他很喜欢吃洪湖人做的小蛋糕，也很喜欢吃洪湖的鲜鱼和青头野鸭糯米粥。

1959年到1962年，我奉命参加了由贺龙元帅主持的《红二方面军战史编委会》，我写了三年战史，但缺少湘鄂西革命地区的生活，虽然编史时期到湘鄂西十几个县去进行过史实收集，调查老同志等等，但还属走马观花，对进行文学创作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我主动要求去洪湖县参加“四清”，因为洪湖县是当年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地区。所以，我想在那里生活几个月。这次，我请求贺龙元帅给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写了一封信，由省委给我一个在洪湖县有职务的工作，以便于以当事人资格去生活。我就是这样以洪湖县委常委兼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名义进入了洪湖。

我在洪湖投入工作不久，路易·艾黎从北京来到洪湖。他那时是以作家身份来的。县委决定要我陪他在洪湖的访问。于是，我从县委宿舍搬到县招待所，住在艾黎的隔壁，每天与他相伴而行，同桌而餐。他那时已是满头白发，但脸色红润，带了一部小型打字机，白天访问，晚上就传出来他不停的打字声。有时，他冲出房门，手里拿着几张稿纸，敲开我的门，兴奋地说：“来，听听，我写的诗！”他用英文，我听不大懂，他只能

用生硬的中国话来朗诵。说实话，他那不怎样的中国话使诗减色不少。不过，他那十分激动、十分兴奋的诗人气质却又使诗增色不少。他朗诵完，坐在我面前，手按着我的膝盖，两眼盯着我，十分认真地要我提提意见。他把我当成朋友和同行，我却自知在诗的方面造诣很差，特别是艾黎喜欢写惠特曼式的十四行诗，我更是生疏。也只好十分用心地谈一点点感想，或一个字两个字的改动。艾黎总是十分高兴，当场修改。如果我听了之后仅仅是称道一番，他就立刻脸色阴沉，拿着手稿离开，直到第二天吃早饭，他的脸色也变不过来。他就是这样一位天真、诚挚、孩子般的老头子。

艾黎年纪虽大，身体却好，精力更充沛。几天来，我陪他参观了烈士塔，革命纪念馆、到了当年洪湖苏区的许多水乡村镇，也为他从县里拿来许多革命历史资料。他白天访问、参观、拍照，晚上写作、看资料。不大亮的电灯光一直到夜十一点全县城熄灭，他又点上了蜡烛或油灯，每天几乎工作到天亮，却又起得很早，还是那样精神十足。吃早点的时候，他不大动专门为他准备的牛奶、面包、果酱，却几乎是一口一个吃小蛋糕、酱青头野鸭糯米粥。在餐桌上，他是极为健谈的。他说三十年代，他做为国际救济协会的成员到过几次洪湖。在上海，他得到宋庆龄和中共中央的要求，在救援洪湖大水灾的难民时，尽力设法抢救在洪湖苏区失败时被打散了的红军和苏区干部。艾黎没有辜负中共中央和宋庆龄的希望，他救援出来许多苏区和红军的干部战士，又把他们交给中央，使他们继续投入战斗。他讲到洪湖水灾的悲惨景

象，也讲到敌人是如何残酷杀害红军干部战士和大批伤员的，也为当时中央“左”倾路线的肃反而误杀大批同志感到深深悲痛和惋惜。他讲这些往事时，是以一位亲人口气谈的，使我深深感觉到那时革命斗争每一个胜利，就是他的胜利，每一个失败，就是他的失败。他的身心是与中国革命患难与共的。他知道我编过三年红二方面军战史之后，几乎每天要我向他谈谈编史和当时斗争历史。又几乎每次听我谈过，就感慨地说，无论如何要写出来，对世界都是有益的。他还说，这些年来，他平均每年写一本介绍中国的书在外国出版，他说，除了皮肤之外，他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为了证明他的结论，他居然向我说了一阵子陕北话，听起来，比他讲普通话地道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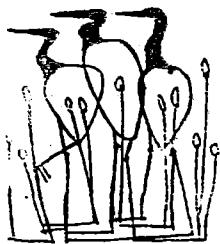
我在洪湖陪伴艾黎只有短短的几天。比起我在洪湖参加“四清”一共七八个月的时间来，是十分短暂的，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怀念。

最后，不得不写几句令人不愉快的尾声。我从洪湖回到北京，我所在单位突然接到了洪湖县个别人控告我的信，信中列举了二十一条罪状。后来，经过总政、湖北省委纪委、荆州地委纪委、洪

湖县纪委四级调查，终于作出控告都不属实，我是无辜的组织结论。我知道我在洪湖是带职的，也管了一些棘手的事，也得罪过洪湖及其上级的个别领导人。但，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有这样一份控告，更是捏造事实的控告。我很为伤感，有时认为下去深入生活还不如当客人为佳，真正带职真刀真枪地干，要想不得罪人是绝无可能的。想归想，我终于没有改变带职生活的决心，也为此而又吃过几次苦头。这是题外话了。我想讲的是控告信中有一条是关于我和艾黎的。大意是：县委要我陪艾黎，我却说：我为什么陪他，他是作家，我也是作家。这真是荒唐之极了。我是高高兴兴去陪艾黎的，我是愉快服从县委决定的，在陪艾黎那一段短暂的日子里，我与艾黎相处极好，不仅是奉命工作，而且是做为革命晚辈和朋友与艾黎相处的。这是当时的事实。而我素来的为人，又怎么可能说出这种无聊的话呢？尽管这一条控告份量并不很重，就算讲过，充其量也只是狂傲而已。却写得很伤人，很伤害人的感情。哎，一个很不当的尾声。



郁达夫与曾朴 谈赛金花



○ 俞小红

1930年，郁达夫居住在上海静安寺嘉禾里的一弄堂内。一个初冬晚上，诗人邵洵美来到达夫家，说曾朴约达夫去法租界寓所聚谈。邵是达夫的密友，在上海开了金屋书店，与曾朴父子开设的真善美书店常有来往。

吃过晚饭，郁达夫乘上邵洵美的私人包车，一路直奔马斯南路的曾朴寓所。曾朴热情地请邵、郁两人到楼上的书房叙谈。曾朴很健谈，记性也好。讲到《孽海花》中的人物，曾朴兴致愈浓，不觉说出了少年时候的一段浪漫经历。当年，曾朴赴北京应顺天乡试，住常昭会馆，恰巧对门胡同住一女子叫林杏春，长得楚楚动人。曾朴不禁被林女的红颜美目所沉醉，爱心萌发，竟无心读书求考了。此时的曾朴，正是个十六七岁的美少年。一个青春美少年，一个豆蔻娇女郎，两情依依隔窗相望，不知不觉坠入爱河。父亲曾之撰得知此情十分焦急，严令曾朴速速南归。碍于慈亲之情，少年曾朴含泪告别林杏春，心头却永远留下一段遗憾。后来，他把这缕刻骨铭心的恋情，写出长篇小说《恋》。

谈兴延续到午夜，郁达夫好奇地问，外间传说赛金花与曾朴有过爱情关系，因为赛金花没有嫁给曾朴而嫁给了苏州状元洪钧，所以长篇小说《孽海花》有影射赛洪之事。

曾朴笑了，豁达坦率地说：这是坊间巷的传闻。洪钧是我先父曾之撰的义兄，同时又为我闺师的老师。情谊属于“太老爷”一辈，赛金花我也称之“小太师母”。况且，从年龄上来说，赛金花即傅彩云，

嫁给洪钧时已16岁，我仅13岁，如何会与她发生爱情的事？

接着，曾朴谈到了陈季同将军，谈到钱牧斋与柳如是白发红颜的故事，谈到了红豆山庄与绛云楼……三人谈天说地，直至夜半过后，方走下厢楼。郁达夫在以后的文章中写道：“……先生那一种对于无论哪一件事情的丰富的知识与判断，真教人听一辈子也不会听厌，我们在那一天晚上，简直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窗外的寒风，忘记了各人还想去干的事情，一直坐到了夜半……”郁达夫是新文学的闯将，旧礼教的叛逆者，他的著作《沉沦》、《南迁》、《银灰色的死》、《茫茫夜》、《茑萝行》等，都是世人皆赞的伟大作品。而作为一个富有个性的作家，郁达夫却深深惊诧曾朴无与伦比的人格力量，他感慨地说过：“曾先生所特有的一种爱娇，是当人在他面前谈起他自己的译著的时候的那一脸欢笑。脸上的线条，当他微笑的时候，表现得十分的温和，十分的柔热。使在他面前的人，都能够从他的笑里，感受一种说不出的象春风似的抚慰……”

五年之后，中国新旧文学交替时代的先驱者曾朴不幸病逝于常熟，时年64岁。隔了一年，赛金花逝世。经后人考证，赛金花死时为72岁，实长曾朴7岁，两人恋爱公案纯属于虚乌有。郁达夫的命运也很悲惨，他亡命南洋，1945年被日本宪兵杀害于苏门答腊的荒野之中，时年49岁。

(责任编辑：仲文)

醒集

张恪智 著

作者

张恪智



●名人与505●



○于浩成

(著名法学家
作家、诗人)

505神功元气袋 虽小作用大

于浩成：著名法学家、作家、诗人

我是一个接近古稀的人，总的说来，我的健康情况还算可以，乐天知命，平时读读书、散散步、跑跑旧书摊。但是毕竟年纪大了，各种疾病找上门来，如失眠、健

忘、胸闷、通脉活血欠佳、心脏健康情况亦不佳等等。这些都是老年性疾病，虽然并不很严重，但也应该引起重视。我常常在电视、报刊上看到有关“505”神功元气袋的宣传广告，心里总是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今年年初，一位好友给我送来了一个“505神功元气袋”，说让我试试，反正没有什么副作用。几个月过去了，没有想到，这小小的元气袋居然真的发生了神功作用。我自觉胸闷明显好转，通脉活血也好得多了，虽然仍有不可抗拒的老年性健忘现象，但是觉睡得好好地，失眠现象明显减少，心脏的不适感也明显消失。

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很有聪明才智的优秀民族。中华医药源远流长，从神农氏尝百草之后，几千年来，我国优秀的医学家层出不穷，如华佗、李时珍、张仲景、孙思邈，……总结和发扬我国优秀的医学传统，十分必要，也是我们炎黄子孙应尽的义务。我十分高兴地看到，世界发明家奖获得者来辉武先生已经作出了尝试，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我表示衷心钦佩。

提个小小的建议，使用“505”神功元气袋的人体型很不相同，对我这样体胖的人来说，腰带似乎稍显短了些。虽然用的是松紧带，但仍嫌不够。是否可设计一种备用的带子。我的意见，仅供参考。

欢迎邮购505神功系列医药保健品

神功元气袋 (普通型)

功能与主治：健脾益肾、调整气血、通经活络、平衡阴阳，用于脾肾两虚、气血不足、阴阳失调所致的胃脘痛、慢性胃炎、腹胀、腹泻、中老年虚劳、阳痿、腰肌劳损及妇女月经不调、痛经、带下等病症。长期使用，可增强体质，改善微循环，提高机体免疫功能，无毒副作用。每个邮购价：82.50元

神功元气袋 (儿童型)

功能与主治：健脾益肾、益气养血、消食化积、平衡阴阳，用于小儿消化不良、食欲不振、腹痛、腹泻、遗尿等症。长期使用可增强体质，提高机体免疫功能，无毒副作用。每个邮购价：82.50元

神功药枕

主要功能：滋养精、气、神、平衡阴阳、扶正祛邪、清肝明目、醒脑开窍、益智安神、芳香避秽、清热解毒、通脉活血等。
保健治疗：神经衰弱、头晕头疼、健忘失眠、胸闷心悸、咳嗽气喘、咽喉肿痛、伤风感冒及高血压病、脑血管病、颈椎病引起的诸症。每个邮购价：82.50元

神功健美纹胸

主要功能：滋养精、气、神、平衡阴阳、扶正祛邪、祛风散寒、舒经通络、活血伸筋、益肾温经、健脾和胃、清热解毒、益气养血、丰乳防萎。
保健预防：乳腺增生、乳腺炎、乳房无名肿块、乳房发育不良。并对预防肿瘤癌变、缓解或治疗月经病、带下病、妊娠病、产后病等妇科杂病起到重要的作用。每个邮购价：82.50元

受厂家委托，北京紫金台经济文化发展公司向广大患者代邮购上述保健品。请大家汇款时注明品名及数量。

汇款地址：北京市文津街7号北图分馆内6号楼

郭玉华(收)

邮编：100802

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藏

1949-1954

炎黄春秋



林彪（中）、罗荣桓（右）、
刘亚楼（左）在前线指挥作战

陈老总和小藏胞的故事

李立三是南昌起义的倡导者和重要领导者之一

清末四大奇案之一

——查赈大员李毓昌被害记

一个台湾老兵回乡探亲记

ISSN 1003-1170



定价: 3.20元